

情系黄埔

- 42 结缘抗日战场 情传两家后人 / 郑学富
47 寻找飘荡的忠魂(下) / 陈永新

人物

人物春秋

- 53 帅才骁将黄公略(下) / 陈宇

编读往来

- 60 编读往来

黄埔人生

- 61 记百岁抗战老兵——江国珍 / 傅再纯
64 国难跨马杀敌寇
——记黄埔骑兵薛维轩 / 崔瀚鹏 蒲元

我的黄埔前辈

- 69 那个夜晚,父亲在柳河车站所经历的…… / 余良模
70 我和我的百岁父亲 / 蒋光璞

历史

口述历史

- 73 激情岁月
——忆“战千四团” / 王建

黄埔研究

- 77 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上) / 杨守礼 黄胜利

黄埔收藏

- 85 漫话陆军兽医学校 / 单补生

黄埔日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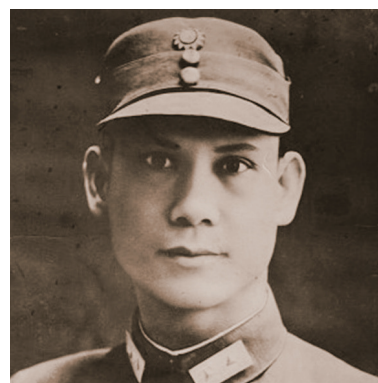
- 93 1926年4月4日,黄绍竑应邓演达之邀到黄埔军校参观 / 贾晓明



双月刊 单月1日出版
2021年 第2期 总第197期



2 抗疫中的黄埔人



42 结缘抗日战场 情传两家后人



61 记百岁抗战老兵——江国珍

扫码下载
《黄埔》杂志 APP



Android ios

抗疫中的 黄埔人





2020年的新年钟声似乎还在耳边回荡,2021年已经迈着大步向我们走来。回顾2020年如白驹过隙般逝去的365天,全因一场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这印记中有恐慌,有不安,但更多的却是举国上下、齐心共抗疫情带给人们的震撼与感动!

在这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没有旁观者。不论是冲在抗疫第一线与死神抢人的医护工作者,还是奋战在后方坚守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普通工作者,每一个人的力量汇聚在一起,成为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就像黑夜中的火焰,给人们带来了温暖与光明还有信心。

在2021年新年来临之际,我们以“抗疫中的黄埔人”为主题,来记录各省区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的事迹。这些事迹中可能没有惊心动魄,有的只是平凡岗位上的点点滴滴,但也是举国同心、共克时艰的一份力量。为了阻止疫情扩散,各省区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积极响应号召,放弃春节休假返回工作岗位,听从调配下沉到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量体温、查证件、验身份,开展疫情宣传……日日夜夜坚守在防疫一线。看似简单的

工作,做起来却并不轻松,甚至困难重重。春节期间,天气寒冷,几个小时值守下来,即便是两层羽绒服也难抗严寒。与寒冷相比,更难的是人们的不理解、不配合。但他们本着为人民服好务的宗旨和坚决当好百姓健康“守门人”的决心,坚持了下来,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为抗疫工作做着贡献。

在各省区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感召和引导下,黄埔后代亲属也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之中。他们中有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有守护生命的人民警察;有冲锋在前的社区工作者;有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他们有的立足自身岗位,牢筑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有的利用社会关系,募集善款、筹集医疗物资,支援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祖辈、父辈在革命年代铸就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为国家独立做出了不朽功绩;而他们则通过一次疫情阻击战对黄埔精神做了最好的当代阐释。在和平年代他们继续发扬着黄埔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着力量。

一场疫情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是不畏生死、逆行而上;什么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这场抗疫之战中,每一个人贡献的每一份力量都值得被铭记。



守望相助 携手同心战疫情

——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抗疫记

庚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人们平静的生活，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察浙江时提出的“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定位，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决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牢抓实，依托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密切与海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属的互动，及时把中央和浙江抗击疫情的信息传出去，把大家同心携手战疫情的信息汇集起来，助力祖国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发挥作用中展现担当

疫情发生后，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党支部立即行动起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组织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专题学习、通报，通过微信工作群、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等方式，把党中央、省委下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文件精神、疫情信息传递出去，同时把问题收集上来。返岗上班后，省同学会党支部第一时间组织全体党员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积极为抗击疫情捐款捐物，为坚守一线的广大医护人员和防疫工作者送去温暖、奉献爱心，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充分展现新时代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良好风貌。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阶段，选派1名骨干党员参加省委有关部门组织的“助企抗疫情、联企复生产”专项行动，另外1名同志参加海外华侨疫情防控专班工作。此外，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党支部结合省委“三服务”工作要求，助力浙江黄埔亲属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分别认领企业，人人都当“联企服务员”，与企业建立起“点对点”联系，了解、掌握企业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尽力帮助协调解决。

同时，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发挥自身作用，做好疫情防控宣传。一方面利用微信公众号

做《守望相助 同心援手战疫情》《黄埔亲属徐杭生作诗致敬逆行者》《黄埔亲属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等系列综合报道，讲述海外浙籍华人华侨积极支援侨居国抗击当地疫情的动人故事等。另一方面引导海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属坚定原则立场，勇敢发声，传播中国政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心和信心，对有损国家利益的言论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抵制。

在守望相助中彰显力量

国内疫情突发阶段，在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号召和倡议下，海内外黄埔亲属、浙籍港澳台海外华人华侨纷纷捐款捐物。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具有防护功能的口罩、消毒水、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瞬间变成了国内最紧俏的商品。杭州市富阳区第九届政协委员、区黄埔亲属联谊会会长李朝阳了解后，通过多方协调、筹备，将筹集购买的防疫物资无偿捐赠给当地医院和社区。据不完全统计，共收到捐赠资金和各类物资共计价值



防疫健康包。

约1632.33万元，其中捐赠口罩232.12万个、手套21万双、防护服9511件、护目镜6120副和防护帽15000个。

2020年2月下旬，疫情拉响全球警报，根据中央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统一部署，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利用电话、微信等方式向港澳台海外浙籍有关人士通报国内疫情情况和防控政策，发出慰问信，表达感谢和问候，提醒防控注意事项。及时掌握海外疫情信息，协助做好海外侨胞回国服务工作。开展“同心战疫共渡难关——向港澳台海外浙籍人士、全省黄埔同学寄送防疫健康包”活动。

在不断创新中凸显优势

受疫情防控形势常态化影响，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多年来打造的“浙台基层交流周”“浙籍海外统促会中青年骨干研修班”等品牌活动无法正常开展。



/ 李朝阳(左二)向富阳区金秋社区捐赠口罩和食品。

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围绕如何让对台交流“不断流”开展头脑风暴，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经过精心设计，我们对几个品牌活动做了大胆创新，使浙台两地青年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实现在线“零距离”交流。如：2020年10月11日，举办的“声动浙江，音乐由我开始——第八届浙台基层交流周”活动，以开启“云上视频互动、线下音乐沙龙”的方式，回顾历年交流交往，以乐会友，传递在浙台商、台青中秋思念，表达两岸同胞共创共享美好未来的愿景；12月5日，举办的“创业创新浙台同心——2020浙台青年电商直播体验营”活动，从时下两岸青年

最感兴趣的“电商直播”热门话题出发，以新媒体为介，使浙台青年成为共同创业、打拼的好朋友、好伙伴。

2020年一年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2021年，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弘扬、自觉践行伟大抗疫精神，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决心，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汇聚磅礴力量。

(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守土有责 黄埔有担当

——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抗疫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有关要求，团结带领全省广大黄埔同学和黄埔亲属，立足本职岗位，强化自身防护，积极配合所在村（居）做好防控工作，以实际行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020年1月24日，山东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机制，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防控措施。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立即向全省黄埔同学和黄埔亲属发布倡议书，号召大家讲政治、顾大局，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做好权威信息的宣传解读，引领身边群众不信谣、不传谣，带头参与社区各项防控工作，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鼓励有条件的黄埔同学亲属积极献计出力。例如，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亲友联谊会副会长刘锡潜带领山东禹王集团向武汉15家重点医院捐赠了价值100万余元的蛋白质粉，向山东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的家庭捐赠了价值43万元的生活物资。



省同学会工作人员参加邹城市中心店镇尚寨村疫情防控工作。

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全体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的要求，出门戴口罩，勤洗手，不外出旅行，不参加聚会。自觉抵制捕食、贩卖、购买野生动物，发现违法行为及时举报。避免与来自疫情严重地区或路过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员密切接触。严格落实零报告制度，安排专人负责每日定时报告情况。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按规定到岗值

班，按时上下班。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关于结合“双报到”工作组织开展“助力社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安排，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全体党员到济南市市中区杆石桥街道德胜社区参加志愿服务，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做好疫情防控值守工作。

2020年3月以来，按照统一部署，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连续选派4名同志参加了3期“进企业、




/ 山东禹王集团向武汉 15 家重点医院捐赠蛋白质粉。



/ 山东禹王集团旗下制药公司全力加大口罩生产。

进项目、进乡村、进社区”攻坚行动。每期两个月，先后赴济宁市邹城市、滨州市沾化区、威海市环翠区和济南市长清区，聚焦制约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难点、痛点、堵点，充分发挥资源

优势，积极帮助联系服务单位办实事解难题；深入项目现场实地查看督导，详细掌握项目建设真实进展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做好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回头看”整改督导工作，

帮助当地解决具体问题，完成好村庄分类处置和过渡房整改两项重点工作，坚定不移地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我们在行动

——河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抗疫记

2020年初，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并肩作战，共同谱写了共克时艰的辉煌战歌。

疫情期间，河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批示精神，严格落实上级部门的要求，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做好机关工作人员及退休人员疫情摸底排查工作、嘱咐大家做好自我防护，确保“人人都健康”；电话询问黄埔同学的身体状况，嘱咐黄埔同学家人做好防护措施；通过“黄埔之家”微信群发出倡议，动员省内黄埔同学及黄埔亲属后代以疫情防控为重，统一思想共识，坚定必胜信念，不传谣，不信谣，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同时，每天利用各种通讯渠道转发官方权威信息；组织大家及时了解疫情防控形势，学习有关政策和防控知识。根据上级部门的统一安排，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党支部全体党员下沉社区，参加办公区值班值守和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并自愿捐款助力疫情防控工作。大家




/ 河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慰问一线交警。

在疫情防控和本职岗位上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为党徽添彩。

广大黄埔后代继承先辈优良传统，心系国家，积极主动投身抗疫一线，以实际行动弘扬黄埔精神。黄埔后代张杰积极参加省民盟开展的“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书画家在行动”活动，通过创作书画作品，宣传防护知识，讴歌战斗在疫区前线的最美中国人；汪之渊创作诗歌，颂扬抗击疫情前线的白衣战士，为他们鼓劲加油；王麟一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沉到社区防控一线，顶风冒雪，卡点值守，为疫情防控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王道亮积极参加值班值守，全力统筹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



/ 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右)在值守。

作，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公职人员的责任与担当！

(河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携手共战疫情 彰显黄埔作为

——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抗疫记

2020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举国上下的鼎力驰援下，武汉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从1月24日武汉封城，到3月18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清零，4月8日武汉重启，4月26日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清零，每一次的胜利成果，都是包括900万武汉人民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戮力同心奋斗得来的，其中也凝聚着我们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广大黄埔同学、黄埔亲属、机关工作人员的辛勤汗水。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一段承受磨难、并肩战斗的日子。

高举战疫之旗，团结引领全省黄埔军校同学及亲属参与疫情防控战争

春节前夕，疫情悄然来袭。我会按照湖北省省委的统一部署，第一时间对党员进行疫情防控工作动员，多名党员干部（含退休干部）主动取消外出或行程。1月23日起，严格落实防疫值班制度，合力构筑疫情防控“最后一米”防线。

1月24日，秘书长伍启华代表我会通过微信群向全省黄埔

同学及亲属发出疫情防控倡议，“湖北黄埔”微信公众号也第一时间转发上级部门的《疫情防控倡议书》。疫情期间，我会通过在线方式，组织亲属工作委员会和联络工作委员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张定宇同志等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多次召开“学习强国”在线视频会议，组织大家学习上级精神、分析疫情形势、研究部署工作。我会领导老当益壮、身先士卒。副会长黄忠汉心系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从来不用微信的他，努力学习微信使用方法并加入微信群，在线对全省黄埔同学和亲属表达慰问，创作诗词《病毒无情人有情》为大家鼓舞斗志，提振信心。副会长卢鹤、黄忠汉首先站出来向组织捐款，希望能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防控疫情做贡献。

我会和亲属工作委员会同全省黄埔同学及黄埔亲属保持密切联系，向工作在抗疫前线的黄埔亲属表达敬意和关怀，希望他们保重身体、早日凯旋；向患病的黄埔亲属表达慰问和鼓励，希望他们战胜病毒、早日康

复；对独居的黄埔同学专门委托相关单位上门看望，叮嘱他们做好居家防护，并协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彭国军家中突遇变故，我会积极联系社区和民政部门协助处理其家中事务，并一直跟踪关注其生活。在社区疫情防控形势缓解后，我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看望，并送去防护用品、慰问品。周林法因疫情致家中生活困难，我会襄阳联络组及时到其家中进行慰问，组织襄阳黄埔同学亲属发起爱心捐助，缓解了他家的燃眉之急。

在我会带领下，全省黄埔同学和黄埔亲属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奋战在抗疫前线的黄埔亲属，用“逆行而上、守土尽责”的行动，书写着黄埔精神的时代篇章。卢纲发挥政协委员和媒体人作用，积极向有关方面建言献策，并发起“春节在家读好书”活动。李承时走进武汉电视台直播节目，向市民宣讲防疫知识。孙振亚、李学锋、孔胜林等作诗、撰文、创作书法作品，为大家鼓劲、为战疫助威。余熙利用公共外交资源，为湖北战疫争取国际声援。陆跃锋在加



拿大筹措多批抗疫物资驰援湖北。张琴，是武汉协和医院最早参与新冠肺炎救治的医护人员之一，一直坚守在重症监护病房，参与救治了大批新冠患者，展现了“最美逆行者”的英姿。同时，其身为警察的丈夫也战斗在抗疫一线，他们只能把年仅2岁的孩子托付给外地的老人。熊毅明，从事检验检疫工作，在执行病毒消杀、人员排查任务中不幸感染新冠病毒，经住院治疗后，隔离期刚满又立即奔赴社区防控一线，继续加入疫情阻击战……一时间，城市和乡村的医护、公安民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等群体中，都有

黄埔人战疫的身影，都有黄埔人的抗疫故事。3月中旬，我们通过微信在线征集黄埔亲属战疫事迹，用“湖北黄埔”微信公众号推出“荆楚战疫最美黄埔同学亲属”系列报道，宣传了60多位黄埔亲属的事迹。最近，许多志愿者收到了社区、单位的“感谢信”、荣誉证书、表扬信。其实，被宣传报道的只是一部分黄埔亲属，还有更多的黄埔亲属默默奋战在抗击疫情的各条战线上，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奉献着智慧和力量。他们用实际行动弘扬和践行黄埔精神，展现新时代黄埔人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共赴国难的爱国情怀。

搭建爱心之桥，积极协助爱心组织及人士为疫情防控捐款捐物

1月24日，我会联络工作委员会委员、武汉协和医院曾天舒主任第一个向我们转发了协和医院抗疫物资告急、求助爱心捐赠的信息。黄埔亲属和同学会工作人员立即行动起来，通过微信等渠道，不断向外界传递相关信息，迅速得到有关组织和爱心人士的关注和响应，汇聚起了八方驰援的爱心力量。

远在加拿大的我会顾问陆跃锋，带领加拿大湖北商会迅速行动，积极动员组织商会会员、公益团体、教会教友、华人



华侨捐款捐物，紧急驰援湖北。从1月底至3月12日，他们将12批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发往湖北武汉、十堰等地30多家医院、慈善机构、隔离点等，共计口罩、手套、头罩、隔离服等各类医用物资152774件，价值88万余元人民币。摩洛哥、坦桑尼亚、瑞士等地的华人华侨纷纷捐献爱心物资给湖北省慈善总会和武汉协和医院。在我会亲属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欧阳光琼、联络工作委员会委员曾天舒的协调下，香港的李龙生联系电白旅港同乡会分三批向武汉市协和医院、汉口医院、武昌医院捐赠脉搏血氧仪

1500台。远在波兰的徐欢、闫敏夫妇向疫情严重的孝感市孝南区捐献医用口罩500只。台湾华夏创意文化交流协会和其中的湖北籍成员，募集资金辗转欧洲购买防护用品，历经波折因交通梗阻无法成行。最后，在我会的协助下，通过湖北省慈善总会终将5万元爱心善款捐给孝感市孝南区。兆泰集团董事长穆麒茹女士捐赠2万只口罩，大力支援了奋战在一线的下沉干部。

江苏省黄埔亲属联谊会捐赠了200条医用毛毯，运抵黄石市中心医院和黄石市煤炭矿务局职工医院。上海市黄埔军校同

学会捐款，用以慰问战斗在抗疫一线的湖北省黄埔亲属中的医务工作者。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捐赠了1.5吨消毒液、3000套医用隔离服、4万双医用手套，总价值人民币58万多元。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杨震环个人还捐赠了100件防护服。宁夏贺兰县中医院向张家湾社区及孝感市抗疫一线人员捐赠防疫香囊3500个。

我会工作人员在接受和协调分配爱心捐赠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黄埔一家、四海同心的真挚情谊，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对抗疫必胜的信心。

筑牢防控之墙，机关工作人员主动下沉基层一线贡献力量

2月初，疫情防控形势进一步严峻。在湖北省委的号召下，居家隔离的我会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向居住地所在社区电话报到。2月中旬，全市开展疫情大排查，我会才彦、陈文、张炜、韩凌、周游、熊安6名工作人员正式下沉所在社区参加防疫抗疫工作。

水果湖张家湾社区是才彦下沉的社区。这是一个占地0.35平方公里，拥有3206户10592人口的老旧半开放式小区，情况复杂，防控难度大。才彦以每天4小时，2万步的频率对社区进行巡查，已经算不清有多少次走遍了社区的角角落落。巡查过程中，她是困难群众的热心帮扶者、矛盾纠纷的化解者，是疑难问题的调查员、信息沟通的联络员、岗位值守的保障员。除了巡查工作，才彦还加入社区党员突击队，担任楼栋长。搬运捐赠物资、卸运爱心菜、分发代买团购物资都是她工作的内容。她曾忍着腰腿的疼痛搬运分发了6网格1000多人的爱心菜，被人称为“女汉子”；10余次背起40斤重的消杀桶消毒杀菌。这种拼劲让很多人不相信她居然是一位60后。疫情发生后，省内防疫物资短缺，才彦立即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出了湖北告急、急需援助的信息。由她联系

的来自兄弟省市、台湾、香港及海外的捐赠达10批次。因为抗疫成绩突出，她两次被张家湾社区党委和省委组织部、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张家湾社区抗疫工作队评选为“先进党员志愿者”。更值得称赞的是，抗疫期间，她一家三口都战斗在社区抗疫一线，被“湖北机关党建网”称为“最美抗疫家庭”。

张炜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向社区报到，协助社区建起党员志愿者微信群，主动联系居住在社区的省市机关干部党员加入防控工作。同时，协助社区发出招募志愿者倡议，发动更多的党员群众站出来为防控工作助力。社区、工作队联合党支部成立后，他担任支委兼联络员，协调本社区50多名就近下沉干部及居民志愿者，与省市区三个对口支援单位并肩战“疫”。他每天对接社区受领工作任务、制定工作计划、协调落实人员，做好工作记录，保证了卡口值守和外出采购、团购分发等工作的有序开展。疫情排查中，他主动上门摸清电话和微信联系不上的居民家庭情况，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卡口值守时，他第一个站出来承担通宵值守任务。为了保障居民生活，张炜建议社区在线对7个小区1600多户居民开展生活需求摸底调研，并为此项工作提供指导。为解决微信接龙统计数据不便的

问题，他利用网上问卷平台设计了团购数据采集程序，在全社区推广使用，保证了社区团购工作高效开展。此外，张炜还主动配合社区工作，先后起草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招募倡议书、零星团购管理规定、社区民警抗疫先进事迹等多份材料。

洪山区珞南街风光苑社区里，陈文主动请缨，承担起其中2个单元50户居民的上门排查和汇总核对任务。作为社区一线的生力军，他外出采购、分拣物资、送菜上门，及时了解社区居民生活需求，为社区居民组织团购，主动帮助居民解决买菜、买药等实际困难，对口承担了几名孤寡老人的生活保障，为他们全方位做好服务。他还主动配合社区当好“宣传员”，协助社区悬挂宣传标语，向居民传递疫情信息，宣传防疫知识和防控政策，耐心细致地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问题。

韩凌是2019年底转业安置的一名退伍军人。接到下沉社区的通知后，她将家中体弱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交托给丈夫，来到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道火箭军社区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在这里，有年龄偏大不便集中隔离的疑似病人，有对疫情心怀恐惧、不敢出门的恐慌群众，有对社区工作不满意、希望外出采购的固执老人，还有子女不在身

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独居老人……韩凌始终没有怨言，一丝不苟地配合社区要求做好各项抗疫防疫工作。火箭军社区是部队营区，值守期间，韩凌发现有一位老年居民时常前往社区值守点求助防疫物资。仔细了解得知，老人的儿子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家中只有老两口和尚在读小学的孙女。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老人没有加入社区网格，一切信息都靠每天来社区或向邻居打听。韩凌马上意识到，这不仅是防疫信息统计和物资保障的盲区，也给老人增加了外出感染的风险。她马上多方打听，与老人的儿子取得联系，让他加入网格，同时确定一位就近的同事负责他们的保障联系事宜，提醒网格员关注这个特殊的家庭。

2月5日，周游开启了一段社区“逆行”之旅。在社区工作的日子里，他当好抗疫宣传员，以文为援，给一线战士们鼓劲、加油，共撰写抗疫文章7篇。当好社区保卫员，坚守小区“咽喉”，核查人员出入、摸排体温测量，及时做好报备；参与信息采集，摸清抗疫风险，切实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人。当好爱心传递员，参与卸货分装、配送蔬菜、为老年人群代开药品等工作；在社区值守中为居民讲解政策，给居民排忧解难，赢得居民点头称赞。

熊安报到的社区是武昌区

公安厅社区。由于妻子在汉阳区五瑞里社区和单位两头跑，根本顾及不了家人。家里照顾老人和小孩的重任落在熊安的肩上。他统筹协调好家庭生活、机关工作和防疫工作。公安厅社区不但确诊病例较多，所居住的楼栋还有死亡病例。他克服心理上的压力，在充分做好个人防护的基础上，参与社区拉网式大排查，逐人逐户敲门测量体温，对146户500余人的健康情况进行核查登记，对离家外出人员逐一电话询问。他上门为500余户居民送生活物资、药品和快递，还多次亲自赴定点药店为重症患者购药，到超市为居民选购生活物资。主动参与爱心物资的搬运、分发等工作。熊安同志用心、用情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认可。3月1日刊发的省公安厅行政处报告中，专门对熊安同志参与社区工作进行了通报表扬，其工作成绩还得到了湖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的充分肯定。

解封后的武汉，正逐渐恢复往日生机。我会下沉党员干部已全部完成社区防控任务回到工作岗位。为了纪念这段特殊的日子，我会举办了湖北省黄埔亲属在线合唱抗疫歌曲《中国武汉武汉中国》的活动。活动通知发出后，各地黄埔亲属积极响应、报名参加。在艺术团老师和工



/ 在线合唱。

作人员的指导和协助下，大家刻苦练习、认真录制，提交了自己最满意的成果。5月9日，我会通过“湖北黄埔”微信公众号推出湖北省黄埔亲属在线合唱抗疫歌曲《中国武汉武汉中国》的视频，来自武汉、襄阳、宜昌等地的22名年龄跨度从20岁到70岁的黄埔亲属用饱含深情的歌声，抒发对英雄的武汉、英雄的人民的赞誉，表达了湖北黄埔人重整行装、振作前行的决心。

国之有难，黄埔人从来就不是旁观者。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会紧密团结全省黄埔同学和亲属，用坚守和担当展现了黄埔人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质”。黄埔精神因爱国而生，经历了这场生与死的淬炼后必将更加熠熠生辉。

（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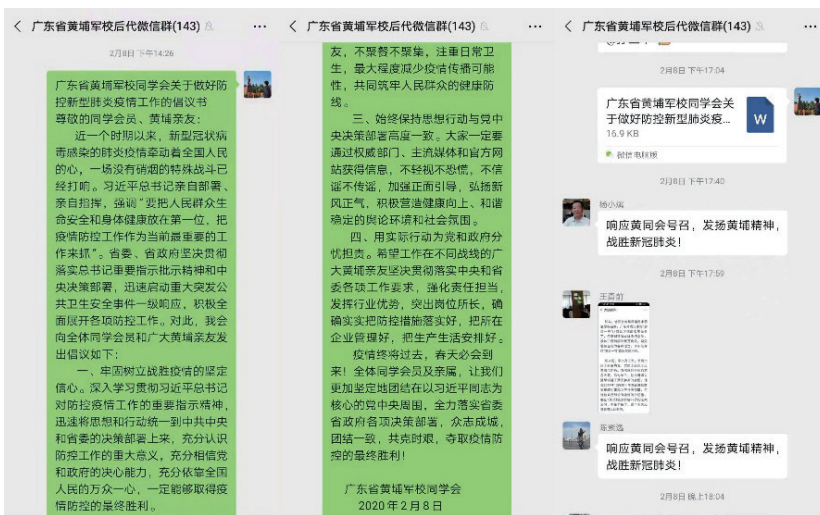
援前线同心战疫 守阵地爱岗尽职

——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抗疫记

2020庚子年，从一场疫情开始。作为17年前抗击非典的前沿阵地，广东省在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率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构筑防护体系。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要求，积极配合战疫工作，巩固广东大后方，同时为武汉主战场提供强有力的支援。

2020年2月8日，根据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通过微信向全省黄埔同学和亲属发出《关于做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倡议书》，号召全省黄埔同学和亲属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统一抗击疫情的思想、配合防控疫情的工作、支援阻击疫情的行动，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精诚团结，主动参与，共同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阻击战。2月12日，省同学会全体工作人员响应号召，参加“援助湖北抗疫爱心捐款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倡议得到广大黄埔同学和亲属的积极响应，部分亲属甚至



/ 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发出的抗击疫情倡议书。

已经提前行动，参与到驰援武汉抗疫的行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60多名粤籍黄埔亲属参与到湖北抗疫和当地的疫情防控中，他们或投身防控一线、或组织捐款筹物、或坚守工作岗位、或有序复工复课，各自以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阻击战贡献力量。

2月3日，住在深圳的深圳市民革党员乔茵（黄埔8期生乔光锐长孙女）意外收到武汉市青山区商务局刘凯微信留言，请求她协助寻找防疫物资。乔茵从刘凯匆忙的留言和焦急的语音中意

识到问题的紧迫，此后，为武汉市青山区寻找防疫物资成了她春节期间最重要的事情。

正月十五之前，全国很多企业尚未复工，哪里能找到防疫物资呢？按照青山区商务局提供的物资清单，乔茵开始两手准备，一方面发动自己民革支部的党员参与，另一方面从自己的朋友、老师、海外同学、人大代表群里寻找物资线索，同时也有序地启动了善款筹集。很快，首批防疫物资被锁定。2月11日，民革支部党员捐款采购的972支速干消毒液，被火速送往武汉市



/ 2月20日, 武汉科技大学天佑医院接受捐赠物资。



/ 耿嘉陵(右)在南沙社区参与防控工作。

青山区防控指挥部统筹下的武汉市第九医院。参与这次驰援武汉捐赠行动的24人中, 有9位是常年居住在深圳的黄埔同学亲属。大家就这样用自己的爱心, 开启了驰援湖北武汉疫区的大门, 亲爱精诚, 践行当下。

为更好地协助武汉市青山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寻找急缺的防护物资, 乔茵、谢群、张晓敏、张谷乡、曹甘莎、王骁、胡锐颖等7位黄埔亲属组建了工作小组, 建立了“采购、筛选、对接、签约、运输等一条龙”工作机制, 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物资捐赠和采购组织工作, 寻找防疫物资的渠道从国内扩大到南非、挪威、马来西亚及加拿大。2月20日, 在他们的组织下, 由澳门黄埔亲友社团筹款采购的防疫物资送达武汉天佑医院。2月21

日, 他们协助青山区新冠肺炎防疫指挥部采购了1000套防护服。在他们的带动下, 又有19位黄埔亲属和6位爱心人士加入到他们的爱心驰援队伍中。

2月中下旬, 疫区“一罩难求”的现象尤为突出。许多爱心团体面临“有钱无货, 等米下锅”的局面, 但湖北武汉疫区医院急需可以进入红区的医用防护口罩。乔茵等黄埔亲属紧急启动备用方案, 对接了3个海外华人华侨团体, 同时协调深圳海关, 制定海外捐赠物资进关简易流程, 随时应对采购需要。2月28日, 在多方协助下, 他们锁定加拿大华人社团杜女士提供的N95口罩渠道, 以非常合理的价格购买了5160只美国明尼苏达州产的3M-N95-1860防护口罩。3月10日, 这批可以进红区、用于重症

监护病房抢救生命的医用防护级别的口罩, 以最快速度被运抵武汉10家医院。据统计, 自2月9日疫情发生至3月10日, 乔茵等26位黄埔亲属组织经办和协助发往湖北省或武汉市(含区属)的防护服共5600套、医用防护口罩共26560只、医用消毒液共1072支, 惠及医院达25所。

黄埔16期辘重科耿荫龙之子耿嘉陵, 是一名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疫情阻击战打响之后, 看到许多社区党员主动参与防控工作, 冲锋在前, 他深受感动, 主动报名加入了防疫志愿者队伍。由于疫情来得突然, 各条战线上的工作都极度繁忙, 根本抽不出人对志愿者进行培训。上岗执勤后, 耿嘉陵边学边干。

作为一名退休人员, 一天的值勤工作量对耿嘉陵的体力和精力是不小的考验。“值勤一天会觉得比较累。好在来的人基本都很配合, 自觉登记并配合测量体温, 走时有人还会说一



/ 小学一年级学生录制的为武汉加油短视频走红网络。



/ 青青幼儿园开展线上教学。

句‘辛苦了’，让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说，“同时，我心里清楚，比起战斗在抗击疫情前线的白衣天使、公安干警、社区工作人员们来说，我这算不了什么，他们更危险，更辛苦。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作为一名党员志愿者应该冲在前面，支持社区工作，尽微薄之力，发挥特长，服务社会，践行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黄海峰（黄埔4期生曾希圣孙女婿）是广州市3所民办中小学校的校董。17年前的春天，正值他在广州筹办第一所小学的关键时刻，“非典”突然爆发并蔓延，他和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圆满完成任务。这一次，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和学校的老师们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早在广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之初，他就开始为他那几千名学生的学业担忧起来。

1月25日（正月初二），黄海

峰召开视频会议研究部署校园防控工作。1月30日，他组建了集团疫情防控应急小组，并担任组长，全面统筹开展校园疫情防控、防疫物资保障、在线教学、疫情信息收集发布、应急沟通机制和应急情况处理等事项。在他的带动下，学校各部门负责人全部放弃春节休假，按照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全力以赴地部署和完善所在校区的人员排查、制定《校园防疫指导手册》、建立应急预案、采购防疫物资等工作。

接到“停课不停学”的通知后，黄海峰开始着手统筹各学校制定网络教学计划，开展网络教学相关软硬件备课工作，启动线上教学。最终确定了线上融合线下、五育并举的成长课程体系，确保学生有计划、有步骤、分环节地接受任课教师远程教学、辅导答疑、作业布置等教学内容，最大程度地回应和服务学生、家长的需求。3月初，随着一段由该校一年级学生录制的

为武汉加油的英文短视频在网络走红，获百万点击量，黄海峰所倡导的“线上融合线下、五育并举”的成长课程体系开始广受关注，登上了多家媒体的网站和公众号平台。

在广州从事民办教育的贺青（黄埔1期生贺衷寒曾侄孙女）同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自教育部发出“停课不停学”的通知后，她就带领公司旗下管理的民办幼儿园的行政管理层，马不停蹄地部署疫情期间的工作规划。幼儿线上课程，对她的公司以及所有的任课老师来说，都是一个未曾触及过的领域。他们一起连续奋战数个昼夜，召开数十次行政会议，修改教案十几次，最终制定出一整套线上幼儿教育方案，并于2月14日正式推行。

疫情期间，类似的事例还有许多。广大在粤黄埔同学和亲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大家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黄埔情聚天涯 抗疫再谱华章

——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抗疫记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疫情就是命令，很快，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坚决贯彻落实海南省委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部署，及时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在抗疫工作中彰显了特殊优势，为抗疫工作获得阶段性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0年1月下旬，海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关于抗疫工作的意见、指示、批示精神下达后，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时间组织学习，同时部署会机关抗疫工作。1月27日，向港澳台和海外琼籍社团发出《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海南海外联谊会）关于动员港澳台和海外琼籍社团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募捐的倡议书》，得到港澳台和海外乡亲的积极响应。针对抗疫工作中各兄弟单位分头干效率低的局面，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提出建议在本系统成立抗击疫



/ 王美珍秘书长(右四)在海外医疗物资接收现场。



/ 王美珍(前排左一)率队了解侨企复产复工情况。

情统筹协调办公室，建议被采纳实施后促进了抗疫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从1月下旬至2月底，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参与统筹协调工作的同志不分节假日，不顾个人安危，一呼即应，往返于美兰国际机场国际货运中心和省红十字会，亲临一线做好防护物

资的交接工作，保证海外乡亲捐赠的医疗物资以最快速度发放到抗疫前线。当了解到海南省中医院驰援武汉的医疗队防护物资极度匮乏，便及时向统筹协调汇报情况，并共同努力协调海外社团资助，使省中医院得到了日本、美国琼籍社团的捐赠，解了燃眉之急。同时及时宣传报道


海外海南乡亲捐赠情况，如黄埔二代邢增仪发动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抗疫、黄埔后代韩民兴带领公司员工抗疫的感人故事。

3月初，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及时向在抗疫中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港澳台、海外琼籍乡发出感谢信。在国内疫情向好、境外疫情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保持和港澳台、海外琼籍乡亲的密切联系和沟通，帮助海外乡亲抗疫。3月21日，按照省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部署，及时做好有关清明祭扫的疏导和注意事项提示工作。引导广大琼籍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妥善安排返乡事宜，积极配合我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3月下旬至5月上旬，在统筹协调办的统一部署下，多次派员深入口罩生产厂家，和省统

筹办的同志一起采购口罩，并将口罩邮寄到海外琼籍社团，支持海外琼籍乡亲抗疫。据统计，支援海外琼籍社团的口罩达76万多个，医用手套30万只。

2020年3月以来，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贯彻落实海南省委关于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部署，先后走访调研了黄埔后代韩民兴的物业管理公司、美籍华人许志明参股创办的海口市三角梅共享农庄、日本侨领符明潮投资开办的粟之树糕点店、张跃光创办的海南金畅国际物流中心，了解复工复产情况，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如许志明先生管理的三角梅共享农庄，受疫情影响，没有客源。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帮助农庄宣传扩大知名度，发放农庄

入场券，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前往参观、消费。组织黄埔后代到农庄开展联谊交流活动，把常规工作和支持复工复产紧密结合，以实际行动支持侨企恢复活力。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主动对标海南省委关于要全力应对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三个大考”，做好答卷。一是引导、激发民间力量打造全国首个兼有黄埔历史文化收藏、交流联谊阵地功能作用的“黄埔之家”；二是拍摄黄埔精神宣传纪实片《海南黄埔生 碧血丹心情》《铁血烟云跌宕人生——琼籍黄埔军校同学二三事》，引起海内外关注和热议。 

黄埔后代韩民兴抗疫记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黄埔后代、海南民兴物业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民兴带着工作团队，日夜奋战在服务小区群众的抗疫第一线。复工潮到来后，他更加忙碌了，带领公司员工开足马力加油干，为小区业主们复工复产提供后勤保障。不管多苦多累，韩民兴总是笑着说：“比起

黄埔先辈流血牺牲，我们黄埔后人流点汗吃点苦不算什么。”

韩民兴出身于黄埔将门之家，祖父韩鹏如是琼籍爱国抗日将军，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参加过东征北伐、淞沪会战和东北抗日，荣获上海抗日流血为国纪念章及民族英雄称号；祖母黄瑞珍是随军医生，在昆仑关大

捷等战役中，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堪称女中豪杰；父亲韩荣光，黄埔军校15期毕业，参加了台儿庄等抗日战役，是中国人缅远征军的一员，曾在战场上拼死抢回军旗，由于作战英勇，多次受到嘉奖。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一家人反对内战，毅然解甲归田，回到了海南文昌老家。

韩民兴从小受到先辈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的影响，始终坚定一个信念：黄埔前辈是英雄，黄埔后代当好汉，要为国家、民族和社会做贡献。在这次全国上下齐心抗疫的特殊战役中，他秉承黄埔精神，积极作为，用实际行动告慰黄埔先辈。

海南民兴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对象遍及全省，业务重点在海口、儋州、文昌和屯昌等市县，管理的项目多，规模广，覆盖人口的流动性大。如儋州市水岸名都小区，一期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由30栋高层组成，小区住户达上千户，居住的北方“候鸟”老人较多，管理难度非常大。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海南民兴物业管理公司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全体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公司8名党员全部放弃春节假期，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请缨排查小区从外省回来的业主和在外省读书回来的学生，做到每日进行跟踪，随时掌握情况。在小区重要路口、人员密集场所张贴警示标语，悬挂防疫横幅，让小区业主充分认识到病毒的危害性和疫情的严重性，从而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及时组织力量对小区生产、生活区域进行全方位高频次消毒，尤其对车库、电梯、楼道、垃圾站、下水道等重点部位进



/海南民兴物业管理公司保安为小区人员测量体温。

行全面消毒消杀。后来，为了更有效地防控疫情，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由公司党员和公司领导带头履行党员职责和岗位职责，建立模范岗位，实行24小时轮流值班制，完成对进入小区人员测量体温，排查小区车辆，监督进出人员必须配带口罩等一系列工作。与此同时，公司党员及员工主动在业主群、朋友圈发出温馨提示，提醒业主减少外出，做好防护措施，还帮助有需要的业主代买米油肉菜等生活用品和药品，让业主感到省心、暖心、安心。在他们的精心防控下，小区没有出现一起确诊病例。

为打赢这场“战役”，韩民

兴和他的团队既当守门员、服务员、宣传员，又当排查员、辅导员、采购员。韩民兴说：“疫情期间我们每天工作量比平日增加好几倍，还要面对一些业主的不理解、不配合甚至谩骂，虽然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成功击退了疫魔，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复工复产季。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将继续筑牢防疫堡垒，守护平安家园，为复工复产做出应有贡献。”为此，儋州市电视台还专门宣传报道了韩民兴管理团队的事迹。📌

（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凝心聚力战疫情 贵州黄埔勇担当

——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抗疫记

“姬老，你好。我是同学会的小夏，最近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你晓得不？最近有没有去过武汉或者其他地方……”

“曾先生，您好。我是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目前国内疫情情况紧急，急需医药物资……”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排查，关心关爱黄埔同学身体健康，多方筹措物资驰援湖北抗疫，助力复工复产。

迅速响应 全员行动显担当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

1月24日，贵州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1月26日，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启动疫情防控专项排查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迅速响应。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提前返岗，实行轮流坐班制度，全员24小时待命。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时上报疫情动态；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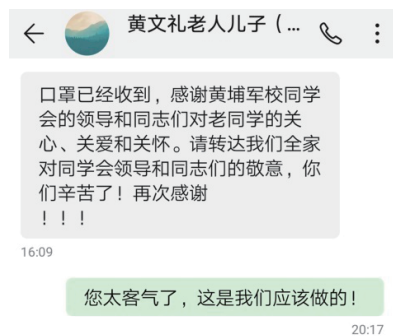
/ 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抗疫调研座谈会。

展全省黄埔同学及亲属新冠肺炎疫情专项排查，电话询问身体状况、是否前往重点疫区，提醒黄埔同学及亲属做好个人防护，疫情期间尽量不出门，注意发热咳嗽等状况；及时掌握全省黄埔同学及亲属身体健康动态；多方协调采购口罩等防疫物资；为黄埔同学及共同生活的亲属寄送口罩；为全体退休干部职工送去口罩并表达关心和慰问……

一项项具体工作一一落实，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7名在职工作人员全部积极投入疫情防控的战斗中。

“全省所有健在黄埔同学

疫情防控信息排查持续零报告。”这个平均年龄97岁的特殊群体的疫情防控成为重中之重，



/ 黄埔同学亲属收到口罩后表示感谢（部分截图）。

所幸长时间的摸排、回访得到的是令人欣慰的数据。

“口罩已经收到，感谢贵州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领导和同志们对老同学的关心、关爱和关怀……”黄埔同学亲属纷纷发来感谢信息。

在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全省黄埔同学及机关退休干部都在最紧要的关头，收到了同学会送来的口罩。

“黄埔老人们的防护有了保障，我们就放心了。”这是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心愿。

多方聚力 筹集款物战疫情

疫情爆发后，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时刻关注疫情防控形势的进展，并向港澳台、海外的部分华人华侨发出倡议。

2020年2月1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收到了一笔500万元的捐款，指定用于钟南山院士团队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科研工作。这是当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收到的最大单笔个人捐赠。与捐款一同收到的还有从巴西购买的391万余个医用外科一次性口罩。

这批款物的捐赠人叫曾志标，他是2019年成立的菲律宾贵州商会副会长。疫情爆发后，他时刻关注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发动海外爱国力量，筹集资

金物资驰援国内。

2月19日，曾志标分两批向福建、湖北疫区捐赠负压救护车。首批价值168万元，第二批价值128.4万元。2月23日，曾志标又从日本购买3000套杜邦防护服用于疫区一线防护工作，价值人民币181.12万元。

后来，因世界疫情形势日趋严峻，国外物资无法运抵国内，曾志标又向贵州捐款100万元，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此外，曾志标还向给予我国支援的一些国家——俄罗斯、塞尔维亚、菲律宾、伊朗、约旦、阿联酋、埃及等国捐建了智能防疫工作站，捐赠防疫物资。

据不完全统计，曾志标个人仅向国内捐赠款物就达2200多万元人民币。对此，曾志标先生说：“这不是做慈善，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担当。”

在这场战“疫”中，像曾志标一样关心、关注国内疫情的港澳台、海外贵州籍华侨华人还有很多。大家纷纷捐款捐物，共计捐赠物资及善款折合人民币3300万余元。

黔鄂黄埔一家亲 驰援湖北显真情

2020年2月28日，在与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伍启华电话联系中得知，因物资奇缺，他们下沉社区的工作人员个

人安全防护面临严峻挑战。

“我们想办法，如果能筹集到物资，我个人先捐赠100套防护服支援湖北同仁。”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杨震环焦急地说。第二天，通过多方努力，杨震环以个人名义捐赠的100套防护服直接从厂家发往湖北武汉。

3月2日，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会议，研究曾志标捐赠贵州的100万元善款的紧急使用事宜。当时，求购物资成了最大的难题。为此，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向省内医疗卫生用品生产企业发出采购信息和爱心倡议。贵州省女企业家协会两位女企业家得知情况后，伸出援手，安排企业加班加点赶制防护用品，第一时间备齐所需物资。接下来，为了保证物资质量以及顺利送达湖北武汉，审批、资质审查、采购、交付红十字会二次收检、协调运输……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对每一个环节都认真把关。

3月8日凌晨1点，满载着海外同胞爱心和兄弟黄埔军校同学会情谊、总价值人民币58.557万元的抗疫物资运抵武汉。

此外，菲律宾贵州商会积极发动捐款活动，所获捐款124万菲律宾比索（折合人民币17万元）全部捐赠给武汉慈善基金会。



/ 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为黄埔同学姬文超(右)送口罩。 / 杨震环(右三)向赫章县铁匠乡卫生院捐赠抗疫物资。

“在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关键时刻，感谢你们伸出援手，向我省捐赠了58万多元的防疫物资，为湖北抗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你们的爱心之举，充分体现了黄埔组织、统促组织同呼吸、共命运的感人情怀……”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发来的感谢信里溢满了黔鄂两地的黄埔真情。

精准发力 助力复工复学

“秘书长，我们乡、村物资严重缺乏，医院连酒精都快断了，现在只有少量的用于病人。连驻村干部都没有口罩了，下村组工作，干部群众安全得不到保障，希望同学会帮忙解决一些实际困难。”2020年2月6日，被派驻贵州省赫章县铁匠乡共同村的第一书记李健打来电话

求援。收到信息后，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机关干部犯了难，资金从哪来？关键物资哪里找？怎么运送？“办法总比困难多。”秘书长杨震环说，“困难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村里面的同志面临的困难更多，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哪怕只能采购到10个口罩，也要首先保障他们。大家要发动黄埔亲属、爱心企业行动起来，一个一个地解决。”几经周折，在爱心企业的关心和支持下，物资顺利筹集到位。2月19日，省同学会工作人员将医用消毒液和400斤酒精送到赫章县铁匠乡卫生院，同时为驻村工作队员送去100个医用口罩。

2月底，贵州在全国率先决定复学并公布复学时间。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决定将曾志标

捐赠的剩余款项专项用于采购物资，助力省内复工复学。

3月10日，首批捐赠物资送到了贵州省首批复学示范学校贵阳一中。随后，还向贵阳市十八中、贵阳市环西小学等学校捐赠了酒精。先后用于复工复学的捐赠物资总价值41.443万元。

如今，南国贵州高原的筑城贵阳已是一片生机盎然，人群熙来攘往，经济持续发展，城乡面貌持续更新……回望过去那段艰辛而难忘的岁月：7个人的亲身抗疫行动，近3300多万元抗疫款物的筹集、分发。数字背后，凝结了广大贵州籍爱国人士对祖国的深情厚爱，也彰显了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的担当与作为……

（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杨晓海供稿）

最美逆行家庭

——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黄埔后代抗疫记

2020年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中华大地，并迅速扩散蔓延。一时间，武汉告急、湖北告急、全国告急，广大民众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迅速作出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科学抗疫防疫的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并在第一时间向全党、全军、全国医务工作者、全国公安民警发出了“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战疫“集结令”。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全党、全军、全国医务工作者、公安民警等闻令而动，逆向而行，冲在了抗击疫情的最前沿，成为了新时代最美逆行者。在这些令人敬佩的最美逆行者行列中，有两抹颜色格外亮眼，一抹是医白色，一抹是警察蓝。云南省昆明市黄埔后代亲属中，就有一个拥有这两种颜色的医警家庭。医白色是妻子代月娇，云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中医医院老年病一病区护士长；警察蓝是丈夫宋榕龙，



代月娇凯旋归来，一家人合影。

其祖父宋亚麟早年毕业于著名的美国教会大学——金陵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宋榕龙时任昆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七大队三中队党支部书记、中队长，年初选调支队政治处工作。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集结令”第一声号角响起的时候，夫妻二人舍小家，为大家，并肩携手，逆行而上，根据各自的任务职责，共同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

一线，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朴实感人的时代强音。

“有时感觉特别孤独，因为你们就在我身边，却不能相聚。但我也并不孤独，因为你们就在我身边”

这是代月娇在援助湖北的战地日记中写给白衣战友们一段感人至深的话语。因为在疫区的医务人员都属于高危人群，为避免交叉感染，如无工作需要，她们彼此之间都刻意保持

着距离。2020年1月26日，主动请战的代月娇被医院紧急召回。1月27日，经层层选拔和组织选派，代月娇作为国家第三批、云南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出发赴鄂，去执行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按照国家抗疫指挥部和医疗队的统一部署，代月娇所在的医疗队进驻湖北咸宁通城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一病区开展工作。代月娇负责为患者输液、发放药物、做雾化、中药熏蒸等工作。风险最大的是静脉、动脉采血以及咽拭子标本的采集工作，特别是咽拭子采样核酸检测，这是患者确诊和确认痊愈时必经的步骤。代月娇和同事们需要对患者咽喉部及双侧颞弓的分泌物进行采样，这时患者要摘下口罩，采样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刺激到咽喉部位，部分患者会咳嗽、犯呕，这意味着代月娇和同事们在采集过程中要与别人避之不及的新冠病毒“面对面”。

在疫区病房里，代月娇和队友们冒着感染的极端风险，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视患者为亲人，把荆楚当故乡，顽强拼搏，日夜奋战。以“白衣战士”的仁心仁术和责任担当，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强意志和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筑



代月娇参加云南援助湖北医疗队。

起了生命防线、贡献了专业力量。她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和成人尿不湿，悉心医护着每一位感染患者，进入感染病区前她们不敢也不能多吃、多喝，因为她们必须把紧缺的防护服使用到极致。她们的面庞被口罩和护目镜勒出深痕，面颊被酒精刺激得通红。她们说，我们都看到了彼此人生中最“丑”的样子。在疫区病房里，代月娇和队友们相互鼓劲加油，相互在对方的防护服上写下名字。她们说那不是名字，那是作为一名护士的责任与担当。截至

2020年2月28日，全国感染新冠病毒的治愈人数为36162人，其中湖北26403人，咸宁市644人。这些数字的背后，有代月娇和战友们昼夜不停的付出。

“小家的困难，在大家面前必须让步”

这是宋榕龙对同事说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宋榕龙时任昆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七大队三中队党支部书记、中队长，年初选调支队政治处负责支队宣传舆论引导等方面的工作，同时继续履行党支部书记职责。1月27日，春节调休的宋榕龙送别援鄂的妻子代月娇后，立即返回工作岗位投入抗疫工作，上小学的孩子则“托管”在岳父岳母家中。抗疫期间，宋榕龙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党支部书记和基层领导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一方面，团结带领支委班子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强化战时支部建设，向中队全体党员民警发出了战时动员令，通过医警家庭多倍付出的强大示范作用，引领广大民警和辅警队员全力投入抗疫斗争。另一方面，第一时间组织搜集整理抗疫音频内容，通过特警支队广播系统在营区内进行每日3个时段的循环播放；第一时间通过电子屏编发抗疫宣

传标语；第一时间组织发放公安民警抗疫工作手册，在支队内部营造浓厚的抗疫防疫氛围。同时，建立特警支队抗击疫情战时宣传引导工作体系，出台战时宣传细化工作方案，组织采写“党旗飘扬，疫情在前，特警不退”“昆明特警疫情防控应急分队举行战地生日会”等大量反映一线警力抗疫防疫的文章。这些文章经内部宣传平台和社会媒体采用后，在警队内部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强信心、聚警心、鼓斗志、暖人心的重要作用，为特警支队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昆明城市保卫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你们是新时代最美的逆行者”

这是网友在看到媒体报道代月娇、宋榕龙医警家庭抗疫事迹后诸多留言中的一条。逆行的人，不是不知危险与艰难，而是坚守信念与责任。代月娇、宋榕龙夫妻携手、齐心抗疫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其中一篇题为《是什么让一个昆明特警接通了1700公里外的电话？——平常，你担心我多点；现在，我担心你多点》的报道浏览量达86.5万，网友点赞1.8万余次，褒扬评论百余条。

疫情防控是一面镜子，疫情防控是一场大考。在这场严



在云南省庆祝第三届“中国医师节”活动上，代月娇作为代表发言。

峻的抗疫斗争中，黄埔后代亲属宋榕龙与代月娇既是相互支撑，携手前行的亲人，也是并肩战斗，齐心抗疫的战友。他们并非生来就身怀绝技，只是普通的血肉之躯；他们也并非无牵无挂，同样是为人子女、做人父母，也有挚爱亲朋。他们并非无所畏惧，而是心怀畏惧，却依然向前。

医者仁心，警魂热血。疫情在前，黄埔后代亲属宋榕龙、代月娇只进不退，他们用自己的奉献和坚守，佑护生命，守卫平安！2020年5月，经组织推荐，宋榕龙、代月娇家庭获评为“云南省最美抗疫家庭”，宋

榕龙还先后获评为“昆明好人”、昆明市公安局“优秀共产党员”。7月，代月娇同志经组织选派，作为云南省抗疫先进典型报告团的一员先后应邀到中共云南省纪委监委、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云南省总工会、云南财经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等单位做抗疫工作报告，分享抗疫心得体会，受到干部职工的广泛好评。8月18日，代月娇受邀参加云南省庆祝第三届“中国医师节”活动，并作为全省40万医疗卫生人员的四名代表之一发言。

（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疫情无情人有情 助力防控谋复产

——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抗疫记

自2020年1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积极响应上级部门的要求和号召，在做好本单位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筹集急需医疗物资，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2月中下旬，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多次联系珠海清华紫荆同学会及该会会长马志忠，希望得到该会的支持，从境外帮助寻找防护服、防护口罩等相关物资。马志忠高度重视，累计出资45万元并多方筹措，先后从俄罗斯购买3.3万只医用口罩和3M（FFP1）口罩，无偿捐赠给甘肃省用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并委托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分配使用。在此过程中，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及时将相关情况上报领导，主动提出统筹使用捐赠物资，并协助上级部门制定《关于发放省黄埔同学会捐赠防疫口罩的方案》。《方案》本着“向一线倾斜、以预防为主”的思路，既照顾一线医疗单位救治防护需求，又支援帮扶文县、舟曲县及乡镇一线工作人员的防护需要，同时将部分口罩作为应急储备，支援有关



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代表马志忠向陇南市文县、甘南州舟曲县捐赠医用口罩。

单位部门复工复产。

3.3万只口罩通过航空运输多批次抵达兰州后，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及时接收并逐批清点。按照既定分配方案，当天即联系有关单位、部门开始分发工作，以期尽快送至各使用单位。被抽调担任火神山医院副院长的第九四〇医院院长向大伟收到捐赠的3M（FFP1）口罩后，在电话中对姚惠珍副秘书长深表感谢。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向陇南市文县、甘南州舟曲县两县10个村捐赠医用口罩，用于一线工作人员走村入户、封闭隔离的防护之用。文县县委副书记王光龙动情地说：“在繁重的

防控工作中，收到马志忠会长从国外采购的口罩，心里暖暖的。”此外，还向兰州公交集团第二客运公司、兰州公交集团第三客运公司、兰州市城关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陇南市两当县招商局、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团结报》驻甘肃记者站和临夏州八松中学等一线单位和有关单位及部门捐赠口罩。收到口罩后，各驻村帮扶队工作人员、公交公司司乘人员、一线环卫工人及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纷纷表示，要戴着“爱心口罩”更加细致扎实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不留死角；要全身心投入复工复产，积极做好本职工作。

在整个衔接争取、分配发放工作中，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秉持公开、透明、高效的原则，把接收到的捐赠物资及时分发至各防控一线单位，全程做好捐赠收发记录和宣传报道，及时向珠海清华紫荆同学会及马志忠会长反馈物资使用情况，把好事办好。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得到有关部门、一线人员的好评和马志忠会长的赞赏。

（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戮力同心共抗疫 黄埔精神再生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黄埔军校同学会抗疫记

2020年，新疆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疆上下众志成城，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积极响应自治区党委的号召，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区黄埔军校同学会4名同志（3名中共党员）始终奋战在抗疫第一线。周振新秘书长（7月中旬）在阿克苏地区柯坪县盖孜力克镇色热托格热克村“访惠聚”工作队代理第一书记，曹兴建担任工作队队员；施光主任在阿克苏地区柯坪县玉尔其乡阿热阿依玛克村“访惠聚”工作队担任副队长；刘军锋在社区报名当志愿者做疫情期间的服务工作。工作队与村“两委”组成防疫工作专班，共同开展防控工作。

“访惠聚”工作队组建巡查组，建立疫情防控巡查台账。每天通过对防疫卡点（劝导站）、村委会大门值班室、居家隔离户、医务室、综治中心、幼儿园、电子商务店等场所进行至少两次巡查督促，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按照规定有序高效开展。

以疫情防控为重点在村里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组织村干部小队对村里的重点部位、垃圾收集点、文化室等重点场所进行全覆盖卫生清理和消杀。同时，结合疫情防治巡逻、流动小喇叭、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加大宣传，党员干部带头清理整治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村民积极响应，不串门、戴口罩、不聚集成为共识，为全力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夯实基础。

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脱贫攻坚普查工作。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脱贫攻坚普查工作的部署，区黄埔军校同学会3人参与此次普查的前期准备工作，并配合防疫人员每天对到户开展工作的普查人员逐人进行测温、消杀，询问身体状况。结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及时对因受疫情被隔离或无法返回的贫困户进行摸排登记，并负责落实好居家隔离贫困户（内地返乡大学生）普查工作，圆满完成了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普查工作任务。

做好疫情期间的生产生活保障工作。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区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



色热托格热克村“访惠聚”工作队队员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人员与村“两委”和“社区”为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没日没夜挨家挨户进行摸排，解决居家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确保物资供应充足到位。“我们家没有体温计怎么办”“我家的米、面和蔬菜都快吃完了”“我们家的牛和羊饲草料不够了”“我们家的牛生病了请求帮助”……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区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和村干部总是第一时间统计群众所需，提供“代购代送”服务，通过“联系卡+干部保障”的方式，保持与群众的联系，全心全意做好群众生产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

□ 王增佳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形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指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祖国大陆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以达到国家和平统一的目标。“一国两制”构想一经提出就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但这个构想从萌芽到成熟，其实也是经过长期酝酿的，是一个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其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现实需求看，具有自身的生成逻辑。“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组成部分，探析“一国两制”的生成逻辑，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逻辑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有其历史支持，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斗争和实践，可以在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发展中，也可以在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相处中，还可以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领导人的外交探索中，找到“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历史渊源与逻辑。

(一)“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大一统”并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思想观念或者学说，它更是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典治国方略。中国对“大一统”的追求早在西周时期《尚书·尧典》中就有了“协和万邦”的说法，孔子撰《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经《春秋公羊传注疏》阐释后发展成“大一统”理论。经历了春秋战国，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武帝独尊儒术，中国初步形成了完整“大一统”的政治和思想格局，这种格局体系一直持续到清朝。虽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清两个朝代，但由于其取得政权后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没有改变，所以实质上仍是“大一统”的继续。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虽然边疆多有变化，但在“大一统”的框架下，统一的局面是常态，分裂的局面是非常态。无论是疆域还是领土，民心还是制度，统一的思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大一统”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近代以来，由于清末政府腐败无能，到处割地赔款，使得中国支离破碎，饱受列强侵略之苦。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港澳台的回归和统一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不得不解决的百年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凭借高明的政治智慧和宽阔的政治视野，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并将其成功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的回归问题，使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迈出了重要一步。“一国两制”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大一统”历史传统的延续，是中华民族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科学实践，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并保持繁荣稳定，昭示着祖国完全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于中国外交的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的外交受当时国际局势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处在一个行而未稳的状态下，但不难发现外交始终贯穿着一条线，这条线随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逐渐明晰。最早是在解放军渡江不久后，毛泽东就在针对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中提出与其他国家建交的两大原则：“中国人民革命军军事委

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此，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从一边倒向更多地考虑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转变，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于中国对外交往的认识和所坚持的原则，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对于港澳台地区问题的解决。1955年至1956年，周恩来于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上、工作报告中以及会见原国民党将领时多次强调和平解放台湾，指出：“国共两党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不是招安，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1963年，周恩来将这些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十亿人口在

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他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的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在一个国家之内能否存在两种制度，存在两种制度又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一国两制”构想首先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其实也是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应用于解决国内和平统一问题。

二、理论逻辑

邓小平创新性提出融铸中华民族传统和文化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重要组成。

（一）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传统文化中倡导“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国语·郑语》中有记载：“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指出“和”可以产生新事物，而“同”则不能。《论语·子路》中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告诫人与人之间相处应该做到和谐而不盲从，认同但不苟同。“和而不同”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种种问题的基本原则。和而不同，多

元共生，“和”文化存在于中华民族基因之中，融合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历史文化，说着共同的语言，都致力于民族发展和复兴，在这么多的相同点面前，可以接受港澳台地区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邓小平在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一国两制”，求“一国”之和，存“两制”之不同。“一国两制”构想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凝聚力，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二）相承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

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一国两制”恰恰就是对恩格斯这个观点的坚持和实践，“一国”是前提和基础，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化解阶级冲突和矛盾，“两制”是从属和派生，是为了反对传统的暴力手段，通过和平的方式调和利益，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不仅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还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历史和现实，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立足于港澳台同胞与祖国大陆人民骨肉相连，血浓于水。港澳台回归祖国，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共同愿望，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之所向。第二，“一国两制”在给予港澳台地区高度自治的同时，除了尊重在祖国大陆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守“一国”原则底线外，最重要的是特别行政区要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使得“一国两制”法律化、制度化。所以，“一国两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三、现实逻辑

从现实需求看，邓小平提出

“一国两制”构想是受到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交织影响。

(一) 国内迫切发展的需要

“一国两制”构想是在一个特别的国内背景下提出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对城市和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所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港澳台问题，一定程度上能够排除外部势力的渗透和干扰，维护国内稳定，这是现实的需求。另一方面，国家统一可以集全国之力发展，完成中华民族复兴之伟业。对于地方而言，也可以利用国家的优势和力量发展自己，再分享自身优势带来的发展机遇，形成共同发展的局面。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事：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归还祖国，实现国家统一；加紧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可以看出，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站在国家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上，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和需求。在“一国两制”构想指导下，中国于1984年、1987年分别与英

国、葡萄牙达成协议，签署联合声明，在二十世纪末顺利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港澳的成功回归以及二十多年的发展，让“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变成了生动实践。


(二) 对外交往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失败，中国在外交上出现一个巨大转机。在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欲以中制苏，打破中美关系僵局，所以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正常化。随后，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为了制衡苏联，卡特上台后加快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与邓小平改善国家全球安全处境，更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布局想法不谋而合。台湾成为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问题，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建交的当务之急。几经波折，在“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基础上，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与美国于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在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邓小平用“解决台湾回归祖国”代替“一定要解放台湾”，对台工作方针实现历史性转变，并将解决台湾问题提上日程，这也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提

出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内外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由对抗转为对话，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局面，战争的威胁逐渐减弱，发展问题逐渐凸显。邓小平敏锐察觉到这种趋势，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基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潮流，美苏调整对外战略，中国也要调整对外方针。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就必须对外开放，调整和其他国家的

关系，积极建交，寻求合作，共同发展。所以在港澳台问题的解决上，“一国两制”构想正是符合这种潮流和趋势的最佳方案。

探究“一国两制”的生成逻辑，不得不敬佩邓小平的政治谋略和时代视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和决策，顺应时代潮流，符合社会发展需要，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问题，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历史性一步，并且在二十多年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并逐步为国内外社会所接受，为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地域冲突、民族问题等，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一国两制”构

想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发展。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一国两制”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科学的、正确的。尽管在未来的实践中，“一国两制”还会面临很多未知的困难与挑战，甚至有的人对“一国两制”存在疑虑，但“一国两制”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两岸中国人可以探索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完成国家和平统一大业。

“我的黄埔前辈”主题征文启事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黄埔军校是一个传奇，黄埔同学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今，长洲岛上的黄埔军校旧址早已没有了往昔金戈铁马、沙场点兵的情景，我们的视野中也越来越难寻觅到黄埔师生龙腾虎跃的身影。但是，这些黄埔前辈叱咤风云的威武雄姿，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救国救民的爱国情怀，却从来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为了永远铭记黄埔师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激励后人在新时期继续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推动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我刊特开展“我的黄埔前辈”征文活动。

征文主题：记忆中的父辈印象(包括您所了解的父辈的主要经历和贡献，最难忘、最感动的故事)，父辈身上体现出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好品德等，结合父辈的人生经历谈对黄埔精神的思考、感悟

和传承等。

征文对象：海内外黄埔亲友后代。

征文要求：文章字数不限，要求内容真实，生动具体，情感真挚，可读性强。来稿时请提供父辈历史照片1至3张，家庭照1至2张，作者本人照片1至2张，父辈和作者的个人简历以及作者联系电话、地址、邮编、银行账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请有条件的作者尽量提供电子版稿件，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我的黄埔前辈”。手写稿件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20号
《黄埔》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75

电话：58336325 58336358

联系人：曹燕

电子邮箱：hpzzs88@sina.com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0年12月—2021年1月

□ 吴亚明

2020年12月

台盟十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

台盟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3日在京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听取并审议台盟第十届中央常务委员会2020年工作报告等。台盟中央主席苏辉代表台盟第十届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台湾商业服务业景气持续走低

台湾商业发展研究院最新发布的“台湾商业服务业景气循环同行指标综合指数”显示，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冲击，2020年10月台湾商业服务业景气循环同行指标、领先指标综合指数双双下降。

澳粤港台青年企业家峰会在澳门举行

“天下为公·中华情——2020澳粤港台青年企业家峰会”5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峰会以“协同奋进·圆梦湾区”为主题，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铨、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等出席活动启动礼。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文博会达成合作意向93项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7日在厦门闭幕。4天展期内，共有93个文旅项目达成合作意向，项目总金额388.21亿元。现场签约项目20个，签约额67.55亿元。

外交部：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

针对美国务院日前批准对台售武，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日说，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2020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召开，汪洋致信祝贺

2020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9日以视频连线方式在厦门市和台北市同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向两岸企业家峰会理事会发贺信，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年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峰会全体会员和与会嘉宾致以问候。

两岸企业亮相苏州共话5G 赋能智能制造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江苏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等承办的第十九届中国苏州电子信息博览会10日开幕，吸引来自电子智能制造、5G 通信技术等领域的280家两岸企业参与。

“闷”字当选2020海峡两岸年度汉字

由台湾《旺报》和厦门《海西晨报》等机构共同主办的2020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11日在台南揭晓，“闷”字以最高得票当选。

第七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聚焦“维护和平稳定，深化融合发展”

以“维护和平稳定，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七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13日在北京举行，60余位两岸专家学者通过视频连线展开深入研讨。与会者认为，民进党当局谋“独”动作不断，加紧与美勾连，美方肆无忌惮打“台湾牌”，使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大陆方面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主动权，引领两岸关系走向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更加坚定。

国台办：“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长期以来，我们为解决问题，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它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个方针充分地照顾到了台湾的现实情况，充分地尊重了两岸的客观差异，也充分地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两岸关系40年历程（1979—2019）》出版

《两岸关系40年历程（1979—2019）》一书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讲座教授孙亚夫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领衔编著，分上、下篇，共15章，系统论述、纵深剖析两岸关系40年风雨历程，研究探寻两岸关系发展的规律性特征。

山东舰航母编队航经台湾海峡赴南海跨区机动训练

据海军新闻发言人刘文胜海军大校介绍，中国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20日顺利通过台湾海峡，

赴南海相关海域开展训练。山东舰入列服役一年来，顺利完成舰载机起降、实际使用武器、作战系统调试等任务，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在试验训练中不断提升。

台资企业11月赴大陆投资金额同比大涨逾七成
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21日发布统计显示，2020年11月，投审会核准赴大陆投资件数为58件，较上年同期减少6%；核准投（增）资金额计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大涨71%。

台湾时隔8个多月再现新冠肺炎本地感染病例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2日举行记者会公布，台湾新增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例为本地感染病例，这是自2020年4月12日以来岛内再次出现本地病例。

台湾近20万人联署“拒莱猪”，消费者团体吁当局悬崖勒马

台湾消费者文教基金会22日在台北举行记者会，宣布“严拒莱猪/牛进口”活动已获得近20万人联署支持。该团体呼吁当局悬崖勒马，立即宣布暂停莱猪进口。

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铁路通车运营

26日上午，随着G5322次列车从平潭站缓缓驶出，祖国大陆离台湾岛最近的铁路——福平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全长88公里的福平铁路连接福建省会福州与全国第五大岛平潭岛，为国铁I级双线客货共线铁路，共设福州、福州南、长乐、平潭等6座客运车站，最高运营时速200公里。

国台办：新冠疫苗接种优先安排人群包括台湾

同胞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新冠肺炎疫苗接种优先考虑进口冷链、物流、口岸、国际和国内交通运输等感染风险比较高的人群，包括台湾同胞。疫苗上市后，在大陆台胞的预防接种工作会做出妥善安排。

国台办：2020年两岸交流遇到前所未有冲击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应询表示，2020年两岸交流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克服了很大困难，但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仍处于极不正常状态。人为设置的障碍比新冠疫情影响更大。2020年2月至今，民进党当局一直单方面暂停大陆居民赴台，关闭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的“小三通”，大面积取消两岸直航航点，严重影响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也给台湾同胞往返两岸平添许多困难和障碍。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舰穿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31日就美舰穿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他说，美舰行径对“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2021年1月

国台办：台湾当局领导人新年讲话再次暴露谋“独”本性

针对台湾当局领导人新年讲话中涉两岸关系内容，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日应询表示，讲话再次暴露民进党当局谋“独”本性。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台湾出现变异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元旦起限缩非台籍人士入境

自2021年1月1日零时（当地搭机时间）起，民进党当局限缩非台湾地区籍人士入境，并自1月15日零时起强化入境旅客检疫措施。

《海峡评论》三十年座谈会在台湾举行

“海峡评论三十年：台海形势与和平统一”座谈会3日在台北举行。近百名与会者缅怀为《海峡评论》付出心力的前辈，期待《海峡评论》等平台继续勇往直前，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鼓与呼。

国台办：严正谴责台湾陆委会蓄意污蔑抹黑大陆疫苗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4日应询表示，台湾陆委会蓄意污蔑抹黑大陆疫苗，再次暴露其无视台湾民众健康福祉、制造与大陆对抗的政治恶意。我们对此予以严正谴责。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台进行所谓“政治军事对话”答记者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7日就美台进行所谓“政治军事对话”答记者问。他说，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官员访台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7日说，据媒

体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将访问台湾。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020年台湾人口首次负增长

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最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显示，2020年台湾出生人数为165249人，创历年新低，死亡人数为173156人，人口自然增加率为负千分之0.34，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台湾2020年对大陆出口创历年新高

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8日公布，2020年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额达1514.52亿美元，创历年新高，同比增长14.6%，占台湾总出口额的43.9%。大陆（含香港）稳居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顺差来源地。

外交部批驳美方取消美台交往限制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将解除美台交往限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日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任何提升美台关系、加强与台军事联系的言行。

国台办：大陆已在24个省区市批准设立79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13日，国台办举行2021年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介绍，2009年以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在24个省区市批准设立了79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这些基地的设立，体现了我们坚定不移贯彻对台方针政策，积极扩大两岸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国台办：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主题展受到广泛关注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3日应询指出，“金甌无缺——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主题展”2020年10月25日开幕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很多观众在展览留言簿和网上留言，强烈表达了希望祖国早日统一的迫切心情。

国台办：台湾对大陆出口创新高与大陆经济增长率先由负转正密不可分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3日应询指出，2020年台湾对大陆出口额及占台湾总出口额比例均创历年新高，和大陆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由负转正的主要经济体密不可分。这充分说明，台湾经济离不开大陆，大陆持续发展进步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是广大台胞的重大利好；两岸经贸合作符合两岸同胞利益要求，不断扩大深化，台湾同胞就能更多获益受惠。

台湾渔船参与救援大陆遇险船员

巴拿马籍散货船“永丰”轮在菲律宾以东约400海里海域遇险，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紧急组织救援。中国台湾籍“闽发渔”渔船率先抵达现场，将包括14名大陆船员在内的22名遇险船员全部安全救起。

2021年对台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汪洋出席并讲话

2021年对台工作会议17日至18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

台工作决策部署，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积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外交部：中方已决定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负责官员实施制裁

针对美方近日在涉台问题上采取放松美台交往限制等行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说，鉴于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已决定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负责官员实施制裁。

台湾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创逾6年最大增幅

台湾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关18日公布，截至2020年12月底，台湾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含可转让定期存单）为2444.89亿元人民币，为近半年最高。比上月大增86.3亿元，增幅3.66%，月增量与增幅均创下2014年4月以来新高。

台湾2020年外销大陆订单同比增长15.6%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20日发布统计数据，2020年台湾企业外销大陆（含香港）的订单达1376.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6%，在各主要接单地区中增幅最大。

“开台王”颜思齐写入大陆统编历史教科书

2021年适逢“开台王”颜思齐拓台400周年，大陆统编初中历史教科书收录了颜思齐率众开发台湾的史实内容，将从2021年春季开学后正式启用。

国台办：望台湾社会认清所谓“宪改”“公投谋独”危害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7日应询指出，一小撮“台独”顽固分子不断鼓噪操弄所谓“宪改”议题，一再玩弄“公投谋独”伎俩，破坏两岸关系，撕裂台湾社会，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认清危害，保持警惕，坚决反对和抵制，不放任纵容任何此类滋事挑衅行径。


国台办：台方设置政治障碍拒绝大陆疫苗

针对有记者问是否可能通过红十字组织向台湾捐赠新冠肺炎疫苗，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7日应询表示，台湾防疫部门负责人多次表示“不会使用大陆疫苗”，所以这个问题确实存在障碍，主要是政治障碍。台湾一些人拒绝大陆疫苗，总要编织各种借口和谎言，为一己政治私利而损害台湾民众生命健康。

国台办：大陆严禁台湾地区生产或转运的肉类产品输入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7日应询表示，大陆严禁台湾地区生产或经台湾地区转运的肉类产品输入。大陆有关部门已加大查验力度，消费者发现市场上有来自台湾地区肉类产品可向监管部门反映。

国防部：“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8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就台湾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正告那些“台独”分子：玩火者必自焚，“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现代航母趣谈 :色彩斑斓的航母服

□ 石稼

在有关辽宁舰的视频报道中，非常吸引人眼球的是画面中色彩斑斓的马甲、各种颜色的头盔、酷酷的墨镜、夸张的手势……

这些构成了航母甲板特殊而繁忙的景象，将冰冷的钢铁甲板点缀得生机盎然。辽宁舰飞行甲板设有数十个航空保障专业岗位，为使舰载机起降保障组织指挥更加形象、直观，采用不同颜色的工作服可以迅速地区分专业岗位。甲板上这些花花绿绿的航母人所穿的就是航母甲板识别服。

辽宁舰的航母识别服与包括美军在内的世界主要航母国家，在服装识别功能和色系上没有大的区别。

2017年11月，北京电视台军情解码栏目，对辽宁舰甲板上舰员的服装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我军航母甲板工作人员大致分为七个战位区块，颜色以红、黄、蓝、绿、紫、棕、白等七色为主。

红色马甲为危险和安全管控战位。红色最为醒目，穿透力强。一般是管理弹药、消防、应急救援的人员使用，如军械人



/ 辽宁舰舰员。

员，主要工作是为战机进行武器挂载、装载弹药。他们通常穿着红色马甲和红色头盔，身后标注“弹药”字样。

黄色马甲为指挥类战位，比如舰载机的放飞、航空系统最高管理人员。马甲身后标注“航空长”和“副航空长”字样。

蓝色马甲为调运和供气保障战位，是飞机航空维护的主要工作战位，一般采用蓝色头盔和蓝色马甲。如负责舰载机甲板上拖车运输的人员，蓝色马甲身后标注“调运”字样，对舰上设备进

行管理的为“设备”字样。

绿色马甲为起降和飞机维修战位，一般采用绿色马甲和绿色头盔。如舰载机起飞时的飞机安全管理，身后标注“起飞”字样。穿绿色马甲的安检人员，会在起飞前通过手势与飞行员沟通，通过飞行员操纵飞机各部位以观察飞机功能是否正常，确保战机安全起飞。阻拦设备的维修人员、货物卸载人员，也都穿绿马甲。军事专家傅前哨在节目中说：“现在中国的航母没有弹射器，如果将来有了弹射器，甲

板工作人员穿的也是绿颜色衣服，穿绿衣服戴绿头盔的，基本跟舰载机的起降有关。”

紫色马甲为燃油补给战位，采用紫色马甲和紫色头盔，身后标注“油料”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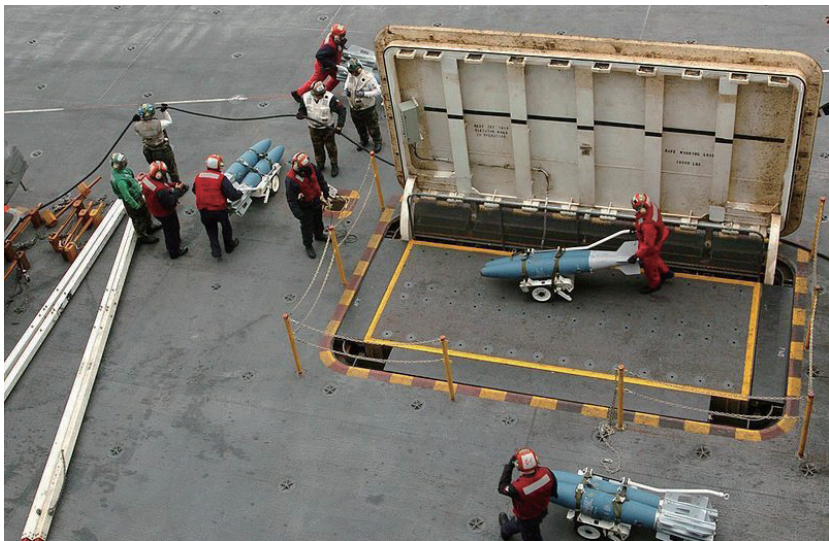
棕色马甲为机务战位，主要是战机保养，就是战斗机的日常维护以及战机的清洁和整体维护，并监督战机起飞程序。

白色马甲为安全、医务、政工战位和临时上舰人员，一般头戴白色头盔，身穿白色马甲，比如安全人员，身后标注“安全”字样。

这七类人员负责了航母上的主要战斗任务，实际上每种相同颜色的马甲下，头盔颜色也各不相同，通过头盔作更加细微具体的工作划分。各种人员服装标志清楚，色彩醒目，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减少了事故的发生。

军事专家傅前哨解释说：“因为航母上有几千个工作人员，怎么区别他们、怎么指挥控制，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颜色控制，这是各国航母的通例。”以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为例，舰上有5984名舰员。全舰仅机库甲板以上就有9层，甲板以下除双层底外还分8层。整个航母共有大小住舱几百个、床铺6400多张。

航空母舰上的这数千名舰



美军“尼米兹”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弹药作业。

员的工作如何做到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奥妙就在航空母舰舰员们身上穿着的“七彩”工作服上。美军的航母识别服也分为黄、白、蓝、红、绿、褐、紫七种颜色。

1. 黄。穿黄色识别服的主要是舰载机调度军官、飞行甲板军官、起飞和拦阻装置部门军官、飞机失事营救军官、飞机引导员等。

穿黄色识别服和戴黄色头盔的飞机起飞指示人员负责在航母转向等各种情况下，引导飞机准确地移动至弹射器上。

穿黄色识别服和戴黄色头盔的舰载机调度军官负责监督管理航母甲板和机库甲板上所有舰载机的调度，同时协助航母部门长实施飞行作业。

穿黄色识别服和戴黄色头盔飞行甲板军官负责飞行甲板安

全准时作业、甲板作业人员培训，飞行甲板全面维护和设备状态监控等。

穿黄色识别服和戴有3条橙色条纹的绿色头盔的飞机弹射军官负责弹射起飞装置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负责起飞过程中的人员作业和舰载机的弹射安全。

穿黄色识别服和戴有3条橙色条纹的绿色头盔的拦阻装置军官，直接听命于航母部门长，在舰载机调度军官的配合下，负责舰载机回收作业中的拦阻装置，保证飞机起降的相关设备和人员安全。

头戴黄色头盔的飞机失事营救军官负责指导救援人员和消防队处理飞机作业事故和其他突发事件，负责航空作业人员、消防人员和救援设备的日常准备，负责航空部门及航空联队飞行甲板人员有关舰载机消防和救援

方面的训练。

穿黄色识别服，蓝色头盔上标有“U1”字样的是舰载机引导员，他们负责向飞行员发出视觉信号，引导并进行舰载机的甲板调度。

2. 白。穿白色识别服的主要是安全观察员、空运军官、飞机降落指挥官、飞机故障抢修员、液氧员、医务人员等。

安全军官和安全员穿白色马甲识别服和白色救生背心，戴白色头盔，头盔前后及服装背后都有绿色“十”字标识和“SAFETY”字样，负责飞行甲板作业的所有安全事项，确保所有工作符合作业程序规定。

飞机着舰信号军官穿的是标有“LSO”符号的白色识别服，其职责是详细了解降落飞机的特性、气象情况、飞行员情况，并使用无线电通讯和灯光信号随时与飞行员联系，确保舰载机保持安全着舰航线，在舰载机偏离安全下滑航线时发出禁降命令。

穿涂有黑白交叉排列图案的白色识别服、戴绿色头盔的是中队飞机故障检修员，负责舰载机的安全和故障检查。

医务人员穿白色识别服、戴白色头盔，胸背上均标有红十字，负责为甲板受伤人员提供快速的医疗救助。

3. 蓝。穿蓝色识别服的主要是飞机移动和轮挡员、升降机



/ 美军航母飞行甲板人员作业。

操作员、传令兵等。

穿蓝色识别服、戴白色头盔的是升降机操作员，职责是根据指示随时将舰载机从机库升至舰面甲板上，如果遭受意外攻击，他们会立刻将飞机引入机库。

舰载机移动和固索员身穿蓝色识别服、头戴蓝色头盔，职责是在身着黄色识别服人员的指挥下，操作舰载机调度设备，包括牵引车和飞行甲板上的飞机启动装置，负责用轮挡和留索链固定飞机。

戴蓝色头盔，识别服上印有黄色“T”字符号的为传令员，职责是负责向甲板上人员传达上级的命令或指令。

4. 红。穿红色识别服、戴红色头盔的主要分三种：飞机失事救护员、爆炸物处理员、军械军官和军械员。

他们分别负责对甲板上舰

载机火灾及失事人员实施救援、操作机动消防设备和救援设备、负责搬运和装卸机载武器弹药、负责拆除有问题的弹药；负责航空武器的搬运、装载和卸载。

其中“马甲”上带有醒目黑色条纹的是军械员，带有“Crash/Salvage”标记的是飞机失事打捞救护员，带有“EOD”标记的是爆炸物处理员。军械员们大多数时间要往返于弹药升降机和指定停机位置之间，使用各种工具搬运那些粗细长短不同的、或轻或重的钢铁家伙，并把它们装进飞机的弹舱或挂上飞机的挂架，再小心翼翼地连上插销或安上引信。有的军械员力大无穷，他们可以不借助任何外力，就能把重达86公斤的ALM-9L“响尾蛇”导弹装上F-14“熊猫”战斗机的挂架，臂力之大让人目瞪口呆。

甲板上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到

飞机失事打捞救护员和爆炸物处理员的，但一旦飞机在作业过程中发生事故，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冲出来。他们是航母上最不希望看到的人。

5. 绿。穿绿色识别服的主要是弹射器安全观察员、解钩员、摄影师等属于弹射部门、制动部门及维修保障等部门的人员。

他们是甲板勤务人员中最大的群体，具体分为三类：

一是弹射装置人员，他们的马甲上带有“C”字样，包括弹射器安全观察员、飞行甲板安全士官、制动装置操作员、中央甲板操作员、喷气偏流板操作员、飞机称重员。

二是阻拦装置人员，他们的马甲上带有“A”标志，包括飞行甲板军官、甲板边缘操作员、解钩员、甲板清查员。

三是其他工作人员，包括飞机检修人员、垂直补给协调员、直升机着舰信号员，以及摄影师等。负责维修的军士长的马甲上带有“Main,CPO”字样；负责检修的军士长的马甲上带有黑白棋盘格图案；普通维护员的马甲上则带有黑色条纹；还有一些负责舰面航空支援设施检修的机械师，他们的马甲上带有“GSE”标志。垂直补给协调员身上带有“SUPPLY COORDINATOR”标记、戴白色头盔。马甲上带有

“P”字样的是摄影师。

弹射器安全观察员主要负责监督并确保弹射器工作人员遵循飞机弹射作业规划；飞行甲板安全士官主要负责确认飞机从弹射器上弹射时飞机前轮的弹射杆与弹射器套索正确连接；制动装置操作员负责安装张紧环、挂钩、牵制杆和释放组件，检查安置是否正确；中央甲板操作员负责联络弹射控制台，向弹射器军官汇报飞机型号、总重、飞机舷号和蒸汽容量选择阀的设定值；喷气偏流板操作员负责每一架飞机弹射时喷气偏流板的升起和放下操作，确保弹射器后面区域的人或物免受飞机高温喷射尾气伤害；称重员负责执行飞机弹射前的最后检查程序，与空勤人员核实飞机质量，并根据每一架飞机自重，选择弹射器蒸汽容量阀的设定值。

美军这些在实践中形成的弹射操作的任务分工为中国未来航母发展弹射装置提供了参考。

飞行甲板军官负责监督飞行甲板上阻拦装置人员的工作，确保阻拦装置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甲板边缘操作员负责飞机着舰阻拦作业完成后的阻拦装置复位；解钩员负责在飞机完成着舰后确认阻拦索与飞机尾钩分离，并在甲板着舰区清空后，向甲板边缘操作员发送阻拦装置复位信号；甲板清查员负责

飞行甲板着舰区无异物，阻拦索已就位，舰载机回收作业时着舰区内无任何人员。

垂直补给协调员负责把货物吊索挂到舰载直升机底部，卸下直升机上的货物，完成垂直补给后将货网打包、收藏等。

飞机检修人员负责飞机的维修和保养；直升机着舰信号员负责用手势信号指挥直升机起飞和着舰；摄影师负责用图像和视频记录舰上飞行作业，编写安全报告，用于存档和对外发布。

6. 褐。穿褐色识别服的主要是飞行器材检查官。这一族的人员有：带有“H”标记的直升机飞行器材检查员、带有“Line CPO”标记和头戴绿色头盔的调度军官和马甲头盔都是褐色的空勤军官。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每次飞行作业前后的检查与保养，确保飞机清洁和整体状况完好，同时还负责监管飞机起飞的作业程序。

7. 紫。穿紫色识别服的主要是航空油料员。

他们穿紫色识别服、戴紫色头盔，带有“F”标记，负责为舰载机加油或释放剩余的油，为舰上设备补充汽油，为飞机弹射器添加润滑油、负责向喷气式发动机检查装置提供燃油，以及为防止舰身倾斜分配航母上储备的燃油。

外行看热闹，行家看门道。航空母舰上的工作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只要了解了航母舰员们的着装打扮，就会找出其中的一些“门道”和奥妙。

我国辽宁舰甲板识别服的研制和配备情况，海军医学研究所潘前芝、王世锋在采写的《彩蝶之舞——我国首艘航母甲板识别服研制纪事》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这篇报道提供了辽宁舰甲板识别服的一些重要信息：

一是颜色和标示功能，借鉴了美军航母识别服的成熟经验

和做法，与美军大同小异。

二是面料、防护等核心技术体现中国特色。航母甲板识别服就其自身面料而言，除了具备一般的防寒保暖功能外，还要同时具备阻燃、防水、耐磨、不易褪色以及救生的多项防护和识别功能。经过120多次的实验，研制出了“包芯纱”工艺，即以棉和阻燃纤维作外层，用高强度纤维作纱芯来纺纱，解决了功能复合的问题。

三是一些服装的战术功能与美军同类产品相比毫不逊色，

有的甚至优于美军。比如，针对甲板工作靴较重的问题，首次将TPU材料应用于防护鞋外底，取代了原来的橡胶外底，并对鞋底花纹进行了防蹬滑、侧滑和平滑设计，具备了减重、耐磨和防滑三大功能。为保证舰员保持最佳待救姿势，分别在识别背心的颈部、后背、身体两侧设置了充气气囊。

对此，该所政委黄孝虎曾自豪地说：“别人家有那是别人的，在我们国家这款服装就是首创。”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藏品、史料征集公告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建立于1984年，是我国唯一一座以保护黄埔军校历史建筑、展示黄埔军校发展历程为核心主题的纪念馆。自建馆以来，我馆始终致力于与黄埔军校相关的革命遗址、文物史料的收藏保护、展览展示、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努力使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

黄埔军校建校已近百年，许多珍贵文物史料散落在民间，为缅怀革命英烈，弘扬黄埔精神，也为使相关文物史料得到更好的保护利用，我们热切期盼这些文物史料能够回家，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这个平台更好地发挥它们教育公众的作用，体现“天下黄埔是一家”的团结精神。为此，我馆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黄埔军校相关藏品、史料。

一、征集范围

- (一) 与黄埔军校建校相关的实物、史料；
- (二) 与黄埔军校人物或事件相关的实物、史料；

(三) 与黄埔军校各个时期相关的实物、史料。

(四) 与黄埔军校各分校、校区相关的实物、史料；

(五) 其他与黄埔军校相关的实物、史料

二、征集方式

捐赠或购买，同时欢迎提供文物、史料线索。

三、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金洲北路563号

号

邮编：510715

联系人：汪喜 曹霞

电话：13580515755 020-32065841

邮箱：wenwuzhengji@126.com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

2021年1月6日

结缘抗日战场 情传两家后人

□ 郑学富

近日，著名爱国将领，曾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的覃异之先生的女儿覃珊装修老房子时，在父亲遗存的信笺中，发现了一封来自台北的信，字迹娟秀。信中写道：

异之先生：

您好。我是张郁廉，抗日战争期间曾到过您旅部（应为师部，台儿庄战役时覃异之任第52军第25师参谋长——作者注）采访的女记者，您还记得我吗？毕竟事隔已近半个世纪了，最近由前中央通讯社同事彭河清处得知一些有关您的消息，知道您主持《黄埔》杂志社，还经常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照着杂志社的地址，寄这封简短的信给您，希望能和您取得联系。咫尺天涯，却相隔数十载，我们也由青壮年迈入老年了，大家还健在，实值得欣慰。近年来，我返大陆北京、哈尔滨探亲已四次，在北京住在五弟海淀家，希望有机会见面。孙先生（张郁廉丈夫——作者注）逝世十余年，我育有两子一女，皆已成家立业，分住国外，详情容后再告。



/ 抗战时期的覃异之。

遥祝安康顺适。

这封信将人们带到了82年前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

—

笔者通过手机微信分别采访了居住在新加坡的张郁廉的儿子孙宇立先生和居住在国内的覃珊女士。

孙宇立告诉笔者，他的母亲张郁廉是位“感情丰富、爽朗正直、感恩图报、重视友谊”的东

北女性。他从小常听母亲提起，抗战时期在台儿庄前线遇到的英勇杰出的覃异之。还多次提到与覃异之的几次重逢。母亲珍藏的一枚象牙印章便是覃异之赠送的。

张郁廉祖籍山东掖县平里店朱由村，1914年出生在哈尔滨，两岁半时，母亲去世，从小被寄养在一个俄罗斯家庭，所以，张郁廉精通俄语。1934年9月入燕京大学学习，主修教育，辅修新闻。1937年6月下旬，燕大放暑假，张郁廉按照和父亲的约定，来到山东老家朱由村探亲。几天后，就传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北平是回不去了，只有随流亡学生赴南京。临行前，父亲再三叮嘱：女孩子家绝对不能到前线工作，一定要完成大学学业。同年底，张郁廉辗转来到武汉，她在报纸上看到驻武汉的苏联塔斯通讯社招收记者的启事，于是报名应试，结果被录取为塔斯社记者。社长罗果夫让她学习俄语打字，把中文报纸上刊登的中日战况消息翻译成俄文，发回苏联。

二

日军于1937年12月先后占领南京、济南后，决定南北对进，夹击徐州，打通津浦线。在津浦路北段山东境内，日军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和矶谷廉介第10师团分别沿胶济线和津浦线分进合击鲁南重镇台儿庄，企图打开徐州的北门户。中国军队以擅长防守的第2集团军沿台儿庄运河一线布防，打阵地战；以武器装备精良、机动性较强的第20军团隐藏于峰县东北山区，拊敌之背，打运动战。这样将日军内外夹击，以图歼灭。

1938年3月，骄狂冒进的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一带被中国军队包围，第2集团军苦苦硬撑，坚守台儿庄半月有余，将敌人死死钉在台儿庄；第20军团在敌人侧背发起猛攻。中国军队众志成城，浴血奋战。中外几十家新闻媒体、上百名记者云集台儿庄。苏联塔斯社总社派谷礼宾斯基等几位军事记者来到中国，要到台儿庄采访，罗果夫安排张郁廉陪同前往。

3月中旬，他们从武汉出发，来到徐州，住进有名的花园饭店。张郁廉在《白云飞渡》中写道：

重庆派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及其他外国及国内各通讯社、报馆派来的记者，也集中住在这里。



／覃异之(台上站立者)在台儿庄前线。

于是，这家旅馆成了日军每次空袭的目标。徐州城内没有防空设施，百姓缺乏防空常识，空袭警报一响起，大家纷纷往外跑，能躲到郊区最好，不然藏在空旷的地方，如大树下、树林中或石堆旁，双手抱头，蹲着或脸向下躺着；有时来不及跑远，就躲进民房的桌子下面，生死全靠命运。花园饭店中弹数次，部分房舍被炸毁，但我们没有搬走。

几天后，他们乘火车离开徐州，奔赴台儿庄前线。到了台儿庄南车辐山车站后，火车不能再

往南开，他们步行前往台儿庄。他们来到了驻扎在台儿庄东北的第20军团52军25师，参谋长覃异之接待了他们。

覃异之，出生于1907年，广西安定（今都安）人。他的童年很不幸，6岁丧父，7岁丧母，由祖母抚养长大。1924年入桂军军官学校第1期学习，次年6月转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2期炮兵科学习，其间参加东征、北伐。全国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9月率部参加平汉路北段对日作战，在保定保卫战中胸部中弹负伤。1938年3月，参加台儿庄战役。

第25师作为52军的先头部队，位于台儿庄东北的兰陵镇附近，其任务是向红瓦屋屯攻击，将敌人压迫于台枣支线以西歼灭之。经过两天的激战，进展颇为顺利。4月6日夜，日军突然向52军两个师的阵地发起疯狂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军部判断这是日军撤退前的一次反扑，因为52军对敌人侧背威胁很大，不攻击52军，日军不能安全撤退。军部命令坚守，并乘机反攻。半夜后，台儿庄之敌已向峰县撤退。7日拂晓，中国军队追至峰县县城外围，将日军团团包围在城内。第25师主力转移到台枣支线方面，继续攻击敌之侧背。经过几天激战，占领峰县城东九顶山以北的几个村庄，使敌侧背受到很大威胁。日军抽出兵力对第25师进行多次反扑，均被击退，敌我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张郁廉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到达第25师师部的。她对覃异之的第一印象是：“他是广西人，工诗词，态度稳健、坚毅，谈吐温文，‘儒将’之风教人钦敬。”覃异之向记者们详细介绍了战况，并细致分析了战局走向，之后，又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因为战事激烈，覃异之派人将记者们送到离战火较远的偏僻村庄过夜。村民早已离家逃难去了，村庄内空无一人。护送他们的军



张郁廉在台儿庄前线的壕沟里躲避日机轰炸。

士找到了一间破旧的老屋，供记者们休息。张郁廉写道：

屋里四边透风，木板上放了些稻草，一盏油灯发着微弱的光，忽然在屋角发现一口黑色大棺材，上边盖着草，又神秘又恐怖。我带着些微不安，和衣躺下，睁眼等天亮。

当记者们完成采访任务与覃异之告别时，覃异之望着张郁廉说：“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使我敬佩。”说着掏出一支手枪递给张郁廉手中说，“这支德制勃朗宁小手枪送给你，需要时拿来自卫。”在采访过程中以及后来辗转于湘鄂川，张郁廉一直带着这个“纪念

品”。

台儿庄一战取得空前大捷。消息传来，举国沸腾。

正在台儿庄附近前线访问的张郁廉等塔斯社记者，于8日上午赶到台儿庄城内。战后的台儿庄已成一片废墟，张郁廉写道：“城中仍弥漫着火药味，建筑物一半以上被毁，有的房舍还在燃烧，冒着烟，断垣残壁间散布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国军正忙着挖坑掩埋死者，坑浅土少，土堆中还有残肢露出，被野狗拖食。眼前处处景象，残酷无比，教人想到血战的惨烈，实在难以描述！”

1938年4月中下旬，60多万中国军队集中在鲁南，准备与日军决战。日军已调集30万大军，分六路迂回包围徐州，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为保存有生力量，与日军持久作战，1938年5月中旬，中国军队作战略转移。张郁廉来不及与覃异之告别，便就地随部队突围，于6月初回到武汉。

三

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侵华日军封闭的燕京大学，在四川省成都市办起临时学校，6月开始招生，10月开学。张郁廉得知后十分兴奋，她要完成父亲希望自己完成学业的遗愿，于是向已经工作了两年之久的国民党

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辞职，到成都续读一年，完成大学学业。当时正值抗战艰苦阶段，为了凑足路费和学费，张郁廉不得已卖掉了覃异之赠送的那把小手枪。

1946年6月，因丈夫调任沈阳社会局局长，供职于中央通讯社总社的张郁廉请调到沈阳分社工作，住在民富街的一幢两层楼房里。

张郁廉一共有5个弟弟，其中4个是继母所生，作为大姐，她有很强烈的责任心，父亲对她也寄予厚望。父亲去世后，她责无旁贷担当起家庭重任。她一到沈阳，首先迎来了二弟一家人，四弟、三弟、大弟几家人也先后前来投奔，加上丈夫在沈阳求学的表弟也来借宿，楼上楼下住着十几口人，在兵荒马乱之际，一家人能热热闹闹地团聚在一起，并且都有一份工作做，实在不容易。

巧的是，当时，张郁廉在台儿庄前线认识的覃异之也住在沈阳。1947年10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覃异之，派他担任第8兵团副司令官兼第52军军长，加强沈阳防务。军令不可违，覃异之只得赴任，但是他并不愿意和解放军正面作战。让他意外的是在沈阳见到了张郁廉。分别近10年的老友重逢，格外高兴。

覃异之见张郁廉家人人口众多，每月送来一大袋军粮，这在

当时物价飞涨，粮食匮乏的情况下，无疑是雪中送炭。

四

覃异之1948年3月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居南京。1948年5月，张郁廉又随丈夫迁居南京。覃异之提出要把自己在南京的一幢楼房借给他们一家居住。当时张郁廉一家人已有住所，遂婉言谢绝。

1948年11月，覃异之担任国民党首都卫戍副总司令兼江北指挥所主任，在淮海战役期间兼任总统府战地视察组组长，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覃异之在南京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保护了大批革命进步人士，并掩护45军97师师长王晏清以“过江演习”为名起义，力主保全南京下关火车站及轮船港口码头不破坏。1949年5月1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军官开会时，覃异之以接家眷赴香港再去台湾为名，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8月，与黄绍竑等在香港通电反蒋，宣布起义，与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12月，回到北京。1954年，覃异之与将门之女、比自己小17岁的王大坤女士结为夫妻，育有一子一女。覃异之先后担任国家水利部参事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

北京市委主委等职。1995年9月，覃异之在北京去世。

1949年5月，张郁廉和丈夫带着两个儿子到达台湾，后辞去中央通讯社的工作，拜在黄君璧门下学习国画。2010年，张郁廉去世。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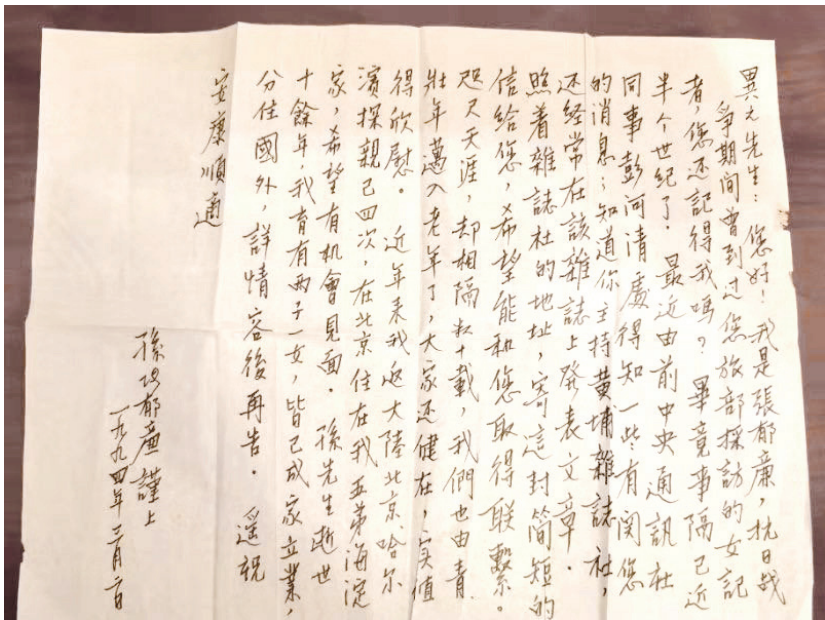
海峡相隔，张郁廉和覃异之自南京一别就再也没见过面。重情义的张郁廉始终没有忘记老朋友对自己的帮助，她在《白云飞渡》中写道：

1949年，覃异之没有随军到台湾，留在大陆，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五十余年前，他送的象牙图章，我一直用到现在。

1994年3月，张郁廉偶然得知覃异之任《黄埔》杂志社社长，于是便写了本文开头的那封信。

茫茫大海，阻不断血浓于水的两岸情。二人虽然没有再见面，但据孙宇立和覃珊证实，二位长者应该是联系上了。孙宇立告诉笔者：“二位老人起码应是通过电话了，因在母亲的记事本中详细记有覃将军的联系方式及覃珊名字。至于是否有覃将军回信，可惜母亲旧时信件经多次搬家已无处可寻了。”

覃珊告诉笔者：“1994年父亲的耳朵已经不大好，写字也困



张郁廉 1994 年写给覃异的信。



张郁廉之子孙宇立与覃异之之女覃珊在新加坡相见。

难，电话应该是通过母亲转达的，因为在张阿姨的记事本上，有我家的详细地址、电话，还有我的名字和我在台北两个舅父的名字。”

2015年，孙宇立整理母亲留下的手稿，取名《白云飞渡》出版发行。2017年春节，覃珊第一次听说这部书，便在网上买了一本。她说：“看完以后，心情

激动不已，开始寻找张女士的后人，一年多未果。2018年4月，屈令婉大姐（台儿庄战役参战士屈伸之女——作者注）说有一个有关台儿庄的微信群，孙大哥在里面，经牵线才联系上。孙大哥已是新加坡著名的雕塑家。”

2018年10月，覃珊利用去新加坡参会的机会，见到了孙宇立。二人相见，圆了前辈的心愿，自然是感慨万千。孙宇立赠送覃珊一本台湾版《白云飞渡》，并题字：“覃珊，有幸与您在2018年10月21日在新加坡见面，一圆母亲希望一生中再有机会一会覃将军的多年梦想。母亲终生珍重与覃将军的战地因缘及情谊。感谢您，望保重。”覃珊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1938—2018，缘自80年前；1948—2018，缘断70年。今天有机有缘，再续前缘！”

2018年12月，孙宇立到北京讨论作品展出事宜，再次见到覃珊。他说：“覃珊举止端庄典雅，为人谦虚大方。在我们欢谈、畅饮、共餐、同游间，我隐然见到了母亲终生敬佩的爱国军人楷模覃异之将军。”

一段未了情，传承两代人。抗日名将和战地记者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80余年生生不息，延续到他们的后代身上，但愿这种君子情谊一代代传下去，绵绵无尽。■

寻找飘荡的忠魂 (下)

□ 陈永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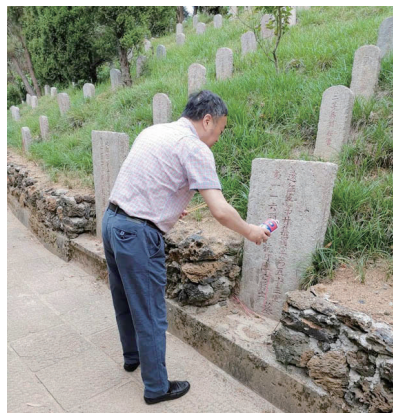
腾冲

第四站，我们到达腾冲。

相对于石碑的默默无闻，腾冲因国殇墓园之大名，早已名闻遐迩。

腾冲，是中缅边境一个美丽的边城，未遭战火荼毒前，它号称是高黎贡山上的小上海，万商云集，一派繁荣景象。这个崇山峻岭之间的绝少兵祸之地，却因日寇铁蹄占领了缅甸，而一下子由最边远的大后方变成了最前沿。

腾冲之所以出名，除了有国内最大规模的国军阵亡将士公墓，还因为这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个被收复的县城，第一个将日寇完全消灭的县城，是国内焦土抗战的典范。日本军史上记载的三



/ 国殇墓园洒酒祭奠。



/ 国殇墓园中国远征军名录墙。

次玉碎之战，腾冲算其中之一。

其实，侵略者哪有资格称玉碎，你作为觊觎人家美玉一般的土地的豺狼，被赶尽杀绝那

是活该！真正玉碎的，是腾冲翡翠一般美丽宁静的县城和为之壮烈捐躯的8000多名中国官兵。

1942年5月10日，因中国远

征军第一次远征失利，腾冲沦陷，从此，腾冲人民陷入了暗无天日的炼狱。

1944年5月11日，在腾冲沦陷整整两年后，滇西大反攻开始，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的53军、54军的5个师，一个重迫击炮团4万余人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继而准备收复腾冲。

由于腾冲县城城墙系巨大的火山石堆砌而成，日军又在此经营两年，工事十分坚固，居高临下坚守，万难攻破。远征军用原始的架云梯方式攻城，战役打得十分艰苦，在付出巨大伤亡后，远征军高层只有咬牙决定：玉石俱焚！调集美军重型轰炸机炸开巨大的城墙后，英勇的远征军官兵从缺口鱼贯而入，未料进城后的巷战更为惨烈。

此前，我曾经反复阅读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写的《滇缅抗战档案》，其中20集团军霍揆彰司令撰写的《第二十集团军腾冲会战经过概要》曾有以下描述：

……我与二师、一九八师、廿六师、一一六师各部主力奋勇直前，由南面城墙下城突入市区，激烈巷战于焉展开。唯城内人烟稠密，房屋连椽，大都坚实难破，且顽敌家家设防，街巷堡垒星罗棋布，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折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



/ 云南民众修筑滇缅公路。



/ 密支那纪念碑。

沿……苦战廿余昼夜，所赖将士忠勇，克敌致果，且于9月14日将困守腾城之敌全部歼灭……

字里行间，都闻得到血腥的气息。

一踏进国殇墓园的大门，我就感受到了十分沉重而压抑的气氛，在墓园的山坡上，长眠着收复腾冲之战牺牲的亡灵，从山脚到山顶，仍按原来的军事编制，每个班、排、营至师一级，整齐排列，仿佛他们未曾牺牲，明天一早冲锋号一响，他们仍要奋勇杀入敌阵。

我们将带来的中国远征军纪念酒环绕一圈洒在第一排阵亡将士的墓碑前，然后拾级而上，在山顶那仿佛要刺破苍穹的纪念碑的基座下环绕三圈，再次洒酒祭拜。

来此之前十来年之中，国殇墓园那整齐划一的墓碑和蒋介石所撰由民国元老李根源所题的“碧血千秋”牌匾时时萦绕于脑海，如今，这一切真真切切展现在眼前，我却恍若隔世。

碧血千秋！说的多好啊！千秋万代，我们都不应该忘记祖先流过的血！

密支那

密支那是与腾冲相距不足300公里的缅甸第四大城市，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反攻时在缅甸境内血战规模最大的所在，密



/ 看望密支那老兵。

支那战役的胜利，彻底奠定了打通滇缅公路、第二次远征胜利的基础。

一入缅甸境内，与国内的繁华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经过6个小时的颠簸，我们到了密支那。密支那城区几乎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的翻版，道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

由于事先有朋友联系，安顿下来后立即被当地中国远征军后代陪同去看望密支那唯一健在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光钿。

老人祖籍是云南宣威，96岁仍中气十足。据老人口述，他并非参加密支那战役的当事人，而是参加远征军71军的八二炮排排长，曾镇守怒江，后参加强渡怒江后的收复阴登山战役，在此役中负重伤后流落腾冲，再辗转至缅甸谋生。

见我们一行人到来，老人十分高兴，临走时我们提议拍照，老人摆手让我们稍等，随即取出一件挂满各式勋章、纪念章的西装穿在身上才与我们合影。我仔细看了老人胸前的徽章，除了2005年由胡锦涛主席颁发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外，其余的均为民间团体所赠，但老人一样视若珍宝。

临走时我问老人：“您入缅甸籍了吗？”老人大声回答：“我是中国人，入什么缅甸籍？”我小心翼翼地再问老人：“那您现在在缅甸的身份是？”老人脸上掠过一丝凄然，小声说道：“难民！两边都不认我们。”

我们无言以对。

从老人家中出来，我问有没有当年远征军的墓地可祭拜，远征军的后代杨玲玲大姐带我们



/ 50 师师长潘裕昆将军站在缴获的日军坦克上对官兵作动员。地点：缅甸西保。

到了一处破败不堪的学校内，指着破旧的操场说：“这里原来是远征军50师阵亡将士的墓地，因为当年缅甸排华，几乎所有远征军墓地都被毁，尸骨也找不到了。”我们闻言黯然神伤，照例拿出纸钱焚烧，点上三炷香后，同行的老张说：“我给他们再点上一支烟吧。”老张把香烟点燃后放到一块小石头上，我们正叩首祭拜时，非常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在没有一丝风的情况下，香烟居然以类似敬礼的姿势，相隔五秒连续转动两次，与原放置位置呈180度，我们一行人目瞪口呆，陪同的老兵后人也大声惊呼，我抬头看了一下，树枝纹丝未动。我们期盼那是50师的阵亡

将士地下有知在向我们打招呼。

我将上述情形发短信告诉了50师师长潘裕昆少将的外孙晏欢——一位痴迷于外公英勇历史而孜孜不倦为此奔忙的建筑师。我说：“潘将军地下有知，知道我们在祭拜他的忠勇将士，一定会有心灵感应的。”晏欢立即回复：“谢谢！你们有心了！50师忠魂在天之灵得以欣慰。”

第二天上午，当地的华侨头领标叔领我们去探访一处简陋的建筑物，那里存放着几年前刚从地下挖起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运回国内安葬的300多具远征军官兵遗骸。300多具遗骸分别作了DNA鉴定，基本能确定身份的遗骸被分别盛放在长方形的塑

料盒中，简单地放在架子上。见此情形，我们心痛不已。我拿出一瓶酒，绕忠骸一圈洒遍，然后恭恭敬敬把未倒完的半瓶酒置于忠骸正中，我有些不解地问标叔：“你们怎么知道这挖起来是国军士兵而不是日本鬼子呢？”标叔说：“同时挖起来的有国军青天白日徽章的嘛。”并指着近处一片墓地说：“这下面都是呢，埋得很浅，谁家要造房子了，一挖都是。”

我闻言不胜悲怆，临走时，让同行的老张向远征军忠烈告个别，老张清了清嗓子，朗声说道：“中国远征军的先烈们，我们今天不远6000里来看望你们，说明祖国的亲人没有忘记你们，

总有一天会把你们接回去的。”

诚哉斯言！无论如何，为国出征的将士魂归故里总是应有之义。当然，这不是民间力量所能解决的。站在忠骸面前，我突发奇想：待有朝一日远征军忠骸回国时，如果有可能，应享受派专机接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回国的同等礼遇。因为，他们同样是为国征战，血洒异域的忠魂。

回来的路上，标叔建议我们去看一下日本人造的慰灵塔，说日本人修得考究，我们很坚决地拒绝了。作为中国人，先烈抛骨荒野我们无能为力已很惭愧了，为什么还要去看鬼冢呢？

见标叔忙上忙下，陪了我们大半天，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便拿出点钱想做劳务费，标叔连连摆手，说：“我现在虽然是缅甸人，我老娘是缅甸婆，但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的后代，你们这样来祭拜，是应该我感激你们的，怎么还能要你们钱呢？”

我们心情沉重地踏上归程。密支那的沉重，超出了国内所有祭拜过的地方。

滇缅公路

尽管目前的高速公路网络已四通八达，但从来没有一条公路，对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1937年8月，大规模抗战爆

发，鉴于实力的严重不对称，沿海港口城市被日寇占领已是无法避免，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商讨。会上，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随着战争蔓延，日军可能会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取道香港和越南的国际运输必然遭扼，建议紧急修建一条从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戍山间公路，以确保海外援华物资能源源不断地抵达国内，并表示，除中央财力补助外，筑路由云南省地方负责。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真应该感谢龙云的未雨绸缪和高瞻远瞩，他的建议诞生了一条堪比万里长城般伟大但更加实用的世上独一无二凭人力完成的盘山公路，没有这条公路运来源源不断的武器物资，捉襟见肘的战场仅靠将士的忠勇是撑不下去的。

1937年11月2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由行政院拨款，云南省一年内修通滇缅公路。龙云不敢怠慢，立即通令沿线各县征集民工大举上山施工，男女老幼在没有任何施工机械的情况下，完全凭人力，胼手胝足，逢山火烧裂石，遇水人工搭桥，路基则依靠人力推动巨碾滚压，20万民工万众一心，仅用9个月时间，滇缅公路就提前竣工通车。

这条速成的滇缅公路从建成的第一天开始就成为了战时中国的唯一国际大通道，海外华侨捐赠的军需物品、药物和世界

反法西斯阵营支援及国民政府采购的军火均依赖这条通道源源不断运入国内，以中国抗战生命线和输血管来形容这条奇特的公路并不为过。

公路通车后，因急需大量司机和技术修理人员，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青年回国共拯危亡。于是，南洋3200多名华侨以赤子之心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开着满载着海外华侨捐赠物资的汽车，放弃海外优裕的生活，回到了素未谋面、饱受战火蹂躏的祖国。

为了保证这条20万民工血汗筑成的道路畅通，有数千筑路的民工及10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长眠在路旁的崇山峻岭之中。

从松山望下去，对面半山腰上细如飘带的一条白线就是滇缅公路，这条现在看起来有点寂静的云端上的英雄路，是云南人民对抗战胜利居功至伟的见证！

现在，由于有了便捷的高速公路，很少会有司机再去走那条坑坑洼洼、颠簸不平的公路，但我们还是特意绕一个大圈子，驶上了这条当年为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路。

在保存完好的一段著名的塘石路路面，我们下了车，仔细端详着历80年风雨沧桑的滇缅公路，路面的设计恐怕为目前国内所仅有，石头被深埋地下，露



作者(左2)与卫立煌上将的孙女卫修宁及戈叔亚、孙春龙。

出地面的是整齐划一的小方石，崇山峻岭间，既可防止汽车轮胎打滑，又可避免雨水冲垮了路面。

整段滇缅路静悄悄的，除了附近的村民偶尔骑摩托车驶过外，我们几乎没有碰到来车。

我们静静地伫立在路旁，耳边恍惚响起韩红唱的歌曲《天路》。我想：尽管青藏公路的自然环境更为险恶，但战火纷飞下的肩挑手扛之艰辛，是和平环境下大型现代化施工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要说天路，滇缅公路更堪当此美名！

抗战中的英雄人物可以入忠烈祠，抗战中居功至伟的英雄路同样也不应该被遗忘。

后记

历时14天，行程8000公里，驾车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寻访忠魂

之旅对我们一行6人来说，简直是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洗礼！国恨家仇，从未像这一次集中连日展示，以致回来后的几天里，我久久无法释怀，满眼晃动着纪念碑，满耳回荡着抗战将士的呐喊声……

途经昆明时，我特意拜访了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上将的孙女卫修宁大姐、国内研究滇缅抗战史的泰斗级人物戈叔亚先生、国内第一个创办大型关爱抗战老兵慈善基金的孙春龙先生。他们请我吃了饭。席间，他们提议为我们此次寻访忠魂之旅先敬我一杯。我毫不迟疑地挡住了他们的酒杯，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说：“你们是忠良之后，是先行者，理应我先干为敬！”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经他们引荐，我又与慕名已久、抗战史田野调查著名学者、

《父亲的战场》作者章东磐先生，国内最著名的军旅作家、滇西抗战史权威余戈先生取得了联系。

他们都是历时几十年孜孜以求追寻当年抗战踪迹的人，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与他们相交，我深以为幸！

在石牌纪念馆内，我们发现，胡璉将军的上司，第六战区参谋长郭忏上将竟是我们诸暨人！他作为第六战区司令陈诚上将的左膀右臂，对整个石牌保卫战的指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老家诸暨，他的英名几乎无人知晓。

回来的当天，从桂林到诸暨，行程近1500公里。我们本来打算在途中留宿一晚，但天天热血沸腾的一行人，似乎仍无法平静下来，我们发了狠，一口气千里奔袭开回诸暨。

车行至浙江境内已是子夜时分，我们全无倦意，车内刚好飘荡起张明敏唱的《中华民族》歌声，我把音量开到最大，一车小老头情不自禁，和着歌声大声同唱：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马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风吹雨打中，耸立五千年！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

帅才骁将黄公略 (下)

□ 陈宇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1929年11月底，彭德怀、黄公略等率红5军主力开始向南游击。12月中旬，到达湘赣边的遂川一带。这时，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尚远在闽粤赣边区。中共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拟将赣西南的独立第2、第4团及延福、富田纵队等地方部队，合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他们要求红5军派黄公略去当军长，红5军党委答应了这一要求。

1930年1月，活动于赣西南地区的原红2团和红4团开始扩编为红6军。中共中央指示两支老大哥部队——红4军和红5军派人帮助加强领导力量。红5军派黄公略带领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军事干部和训练大队前往赣西南中心区东固，黄公略调任红6军军长；红4军派出陈毅、宋裕和前去协助黄公略工作，陈毅调任红6军政治委员。从此，黄公略离开红5军，开始为创建一支新的工农红军而奋斗。

新成立的红6军共约3000人。当时，政治委员陈毅、政治部主

任毛泽覃都没有到职。原红2团和红4团是由地方武装组建起来的部队，成份复杂，地方观念强，游击习气浓。黄公略立即展开整训工作。他既是军长，又是军委书记；既抓军事，又抓政治，为部队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从思想建军和军事整训两个方面入手，使这支成分复杂、干部缺乏的地方武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提升为强有力的正规红军，并在战斗中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移，壮大成为具有很强战斗力的赣西南红军主力。

红6军成立不久，首次作战就攻克了吉水县城。

2月3日，红6军在吉安富田、东固一带，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由闽再度返赣西南的红4军汇合。这是黄公略与毛泽东首次见面，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独特见解令黄公略心仪不已。两军协同作战，在吉水的水南以及吉安的值夏、赤家山一带，全歼金汉鼎部的精锐部队唐云山独立15旅1600余人，缴枪2000余支。

几天后，毛泽东主持召开红4军前委，红5军、红6军军委，

赣西、湘赣边、赣南特委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决定将赣西、湘赣边、赣南3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将红4军前委扩大为红4、红5、红6军及赣西南、闽西、东江地区的总前委，统一领导赣西南的斗争，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并通过了“二七”土地法，决定通过开展分田运动掀起土地革命新高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他解释说，所谓“傍着发展”，就是红军部队依靠原来根据地波浪式向外发展。

会议结束后，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再度进入闽西。黄公略按照总前委“以3个月为分期路进行游击战争”的决定，以东固山为依托，傍着原来的根据地，不断开辟新的红色区域，有力拱卫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黄公略在双峰高等小学及平江起义前后，用的多是本名黄汉魂，在写文章及签名中多用黄石之名。他在黄埔军校时用过一个圆形铜墨盒，上面刻有“黄汉

魂”3个字，还有一颗刻有“黄汉魂”3个字的小牛骨头私章。到中央苏区后，他正式将原名“黄汉魂”改为“黄公略”。黄公略这个名字，更因为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反“会剿”和中央苏区时期的反“围剿”的胜利而名震红军和敌营。

毛泽东曾与黄公略在一起探讨红色革命根据地如何才能白色恐怖中壮大的问题。毛泽东说，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有了第1次，肯定会有第2次、第3次，甚至无数次。红色根据地如何屹立在白色恐怖之中，这不再是简单的大道理，而是具体的战术问题了。他想听一下黄公略对此的看法。黄公略对这个问题早有思考，几乎没有停顿就开始了他的阐述：“国民党军队要来‘围剿’我们，我们不能正面与之交锋。我认为，当前形势下，红军最要紧的不是学会打仗，而是要学会打圈，也就是游击战术，游而不击，游而偶击，视情况而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另外，要多建立几块像样的根据地。三国里面有个犄角的故事，面对强大的曹军，孙刘盟军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围点打援，都需要有犄角。我们在井冈山反敌人‘会剿’的胜利，是因为我们有犄角，敌人进攻井冈山，我们就打他后面，叫他首尾不能相顾。目前，我们这样

的犄角太少了，有分量的犄角太少了。”后来，黄公略被委以重任，率领红6军开创一块新的根据地，这就是赣西南根据地。

黄公略在赣西南担任红6军军长时期，特别注意对部队进行政策和纪律教育，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和主张，注意了解人民疾苦，帮助解决困难。他和政委陈毅联名发布六言体的《红军第六军司令部布告》，宣示红军纪律“所过秋毫无犯，纪律特别严明”等。

黄公略率先垂范，不仅对外严守群众纪律，还严守官兵一致的红军内部纪律。

在赣西南地区打游击期间，由于给养困难，红军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黄公略的身体日渐消瘦。房东鲈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天早晨，黄公略带着警卫员高书官正要外出，就听到鲈妈妈养的母鸡“咯咯咯”地急叫了几声。待黄公略与高书官回来后，鲈妈妈笑眯眯地对小高说：“我不在屋时，不知哪个老表给黄军长端来一钵鸡汤，麻烦你给军长端去。”

当天中午，黄公略约红6军第3纵队纵队长徐彦刚商量事情，同桌吃饭。小高刚把鸡汤端上桌，黄公略就问：“哪来的鸡？”“买的。”小高知道黄军长历来不收群众送的东西，只好撒了谎。“谁买的，从哪里买的？”

没想到黄军长寻根问底，小高一时无从回答。“从实招来！”黄公略严肃起来。委屈的小高把实情和盘托出，进而又说：“这钵鸡汤一定是鲈妈妈杀自家鸡做的，不是别人送的。”黄公略赞成小高的判断，并嘱咐小高到经理处领自己下个月薪饷1块大洋，作为买鸡的钱，给鲈妈妈送过去。

小高送钱回来后，如释重负地说：“军长，反正已经付过钱了，这只鸡你就和徐纵队长吃了吧！”“好，我吃。”黄公略嘴里虽答应着，却端起那钵鸡汤走进连队厨房，把鸡和鸡汤全部倒进锅里，又操起锅铲将整只鸡铲成碎块。随后，黄公略、徐彦刚在连队同战士们一起吃了这顿饭。

徐彦刚因为中午与黄公略的谈话中断，当晚又和第3纵队政委刘作述来向黄公略汇报，看到黄军长正在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一本兵书。黄公略见徐彦刚、刘作述等人进屋来，让他们坐下后，指着书说道：“你们看看书上这段话！”刘作述接过书，顺着划了红线的一段话读道：“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一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

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兵书上这段话是用古文写的，警卫员小高听不懂，问黄公略：“军长，这段话是什么意思？”黄公略循循善诱地解释说：“这兵书上说，将帅须与士兵共甘苦，才能战胜敌人。并举例说从前有个善用兵的将军，有人赠他一竹筒酒，将军没有自己独饮，而是叫人把这筒酒倒进河水里，然后与士兵共饮含有酒味的河水。一竹筒酒虽不能使河水都有酒味，但全军将士却因此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激励，纷纷表示在作战时愿意跟随将军拼死而战。”

黄公略又说道：“我们每次打仗，都有成千上万群众前来支援，帮助我们搞交通、侦察、运输，给我们作向导。不能参战的老幼、妇女也忙着送茶送饭，服侍伤员。群众为什么拥护和支持我们打仗？因为我们是为工农打仗。如果我们违背为工农服务的宗旨，我们就会失去群众。在外失去群众，在内失去士兵，我们就会打败仗。”

黄公略率领红军在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仅仅用3个月，就把赣西南建设成为了红色根据地的模范区。

6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红4

军、红12军再次来到赣西南，同黄公略红6军会合。月底，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为统一战略区域的红军编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下辖第3军（由红6军改编）、第4军、第12军，黄公略任第3军军长、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从此，黄公略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战斗。

6月底，红1军团建立后的第一次作战是攻打南昌。此战刚刚结束，毛泽东于7月初挥笔写下了《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一词：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进攻南昌之役，红4军担负正面进攻，黄公略率领的红3军是右路军，因为不是攻城主力，所以说是“偏师”。黄公略所率领的部队主体虽然是由农民和矿工组成，但经过几个月的整训，已经成为红军劲旅，能够独当一面，毛泽东用“红一角”来写出他们的盛威，用“借重”来写出他们在此次战役中所担负的重大任务。这是对黄公略及其所指

挥部队的极高评价。

黄公略是毛泽东在其一生所写诗词中赞赏的第一位红军将领，如此点名道姓褒扬，全名直接嵌入诗词，也是唯一的一次。

8月20日，黄公略再率红3军奔袭湖南浏阳文家市，歼敌3个团又1个营，开创了运动战的第一个大胜利。8月底9月初，再率部参加攻打长沙，力主在猴子石歼敌，取得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唯一胜利战斗。

9月中旬，红3军参加第二次攻打长沙后退占醴陵时，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在县城渌江桥东的状元洲，召开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宣布结束时，群众却迟迟不走，“我们要见黄军长”的呼声此起彼伏。黄公略闻讯赶来与群众见面，群众空前热烈，当他离开会场时，群众簇拥在他身后，一直把他送到军部。

从这一年的8月到10月，红3军在奇袭文家市、抢占醴陵、攻打吉安等战斗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在黄公略率领下，红3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成为一支不仅能打游击，而且能打运动战和阵地战、能攻善守的红军主力部队。

至1930年年底，赣西南有34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红色区域扩大到由广东南雄至江西永

新，自寻乌到峡江，纵200公里，横150公里，有党员3万余人、红色区域人口达400多万人，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区域发展成为有统一领导、连成一片的大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在实行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千里转战湘赣和第1、第2、第3次反“围剿”中，黄公略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积极鲜明地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策略，对运动战和歼灭战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率领的红3军成为中央苏区红军的一根顶梁柱，经常打头阵，频频传捷报。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7个师约10万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1次大“围剿”，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任总司令，国民党第18师师长张辉瓒任总指挥。

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依靠根据地的有利地形，作出了“诱敌深入”的决策，把敌人引到根据地的腹地，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黄陂的君埠、汉下、上下固一带隐蔽集结。

11月底，中央苏区第1次反“围剿”战斗开始后，红军先是牵着敌人在根据地内“打圈子”，寻找战机，这“圈子”一转就是

1个月，战机终于出现在龙冈地区。

12月28日，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率领号称“铁军师”的第18师，气势汹汹向龙冈挺进，准备进犯离龙冈15公里的君埠。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决定在龙冈全歼张辉瓒师。当晚，毛泽东、朱德率主力急行军，抢先占领了君埠，并于29日作出具体部署：第一路，由红3军从东和东北面，即从敌人正面向龙冈挺进；第二路，由红12军从西南向龙冈攻击；第三路，由红4军向龙冈附近的端儿铺、张家丰一线前进；第四路，由红35师由西南而转北，迂回到敌后，牵制增援的敌人。

12月30日拂晓，龙冈周围浓雾弥漫。各路红军按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在云雾的掩护下，踏着泥泞湿滑的山间羊肠小道，静悄悄地向龙冈挺进。龙冈，东邻君埠，北靠上固，南与兴国相连，西与吉安交界，西南边有海拔350多米的万功山，地势险要，山路崎岖。黄公略率领红3军第7、第8、第9师急速行军，拂晓前赶至王竹峰，在万功山一带进行埋伏，准备正面迎敌。

拂晓前夕，轻敌冒进的张辉瓒率第52、第53旅及师部8000多人，从龙冈向君埠进发。敌军经过两天的行军，官兵们已经走得腰酸背痛，饿得头晕眼花，

进入龙冈，看不到一个人，也找不到一粒粮食，官兵人心惶惶。等敌先头部队戴岳率领的第52旅进入王竹峰时，黄公略一声令下，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红3军首先发起冲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敌阵，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连成一片，不到一个小时，戴岳身边的2个营全部被歼灭。

戴岳急得拿起电台话筒，向张辉瓒求救。此时还在睡觉的张辉瓒被紧急的电话铃惊醒，他一看，窗外一片漆黑，若无其事地回答：“红军主力还远在黄陂、小布地区，即使是天兵天将，也不可能这么神速抵达龙冈，你们遭遇的肯定是小股游击队，你给我顶住。”戴岳气急败坏地对着电话筒喊道：“肯定是红军主力，请火速派兵增援！”张辉瓒后来慌忙通知在东固的第52旅1个团前往增援。

此时，红3、红4军正张开口袋，等待张辉瓒的援军往里钻。敌军增援部队顶着毛毛细雨，饿着肚子，慢吞吞地向王竹峰蠕动。突然间，沉睡的山岭沸腾起来，万功山四周响起“嗒嗒嗒”的机枪声，“轰隆隆”的爆炸声和“缴枪不杀”的喝令声，敌军没来得及反应，便被打得鬼哭狼嚎。红军很快把敌军增援部队逼到河边，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溺毙，顿时乱了阵脚。只

一顿饭功夫，除戴岳只身逃命外，他的整个旅和一个增援团，便被全部消灭。

天亮后，红军总攻开始。各路红军愈战愈勇，战士们高呼着：“活捉张辉瓒！”从四面八方方向龙冈扑来。张辉瓒听到响彻山谷的枪炮声、喊杀声，慌忙拿起电话筒向鲁涤平和临近的公秉藩告急，要求鲁涤平派空军支援。

此时，红3、红4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杀进了龙冈镇。敌军兵败如山倒，纷纷缴械投降，第52旅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朱先志被击毙，第53旅旅长王捷俊被俘。随后，黄公略迅速率部直捣18师师部，活捉了代参谋长周维黄、第104团团团长李月峰、特务连连长张达泉，俘张辉瓒警卫营全部官兵和报务人员。

张辉瓒见大势已去，急忙脱下身上的中将制服，换上士兵服装向万功山中逃去。然而，山顶早已被红军占领，他只得在半山腰的一片油茶林中躲藏起来。

当黄公略率部冲到张辉瓒师部的祠堂前时，张辉瓒的特务营全体官兵200多人已经整齐地列队站立在祠堂前空地上，面对冲上来的红军，这个全部德式装备的特务营官兵镇定自若，红军将他们包围了起来。

特务营的一位长官向黄公略行军礼：“国军第18师特务营

286名兄弟向红军缴械投诚，请接受检验。营长贺仲斌！”

黄公略一听这名字，顿时看清站在面前的原来是平江起义时的“大冤家”。就是这个贺仲斌，在平江城外的烟舟田竟然将准备参加起义的两个连拖走了。当时，黄公略带人去追，险被贺仲斌一枪打中，时任营长的黄公略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只带几个兵到平江城参加了起义。没想到龙冈之役，贺仲斌竟又撞到了黄公略的枪口上。若照常理，黄公略当时的心情是将贺仲斌杀一百次也不解恨。但是，理智战胜了情绪，黄公略回了一个军礼，然后对红军战士们说：“把枪放下！”与贺仲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交谈。贺仲斌的确是非常诚恳地表示投诚之意，愿意带领特务营自愿参加红军，并说立即带人去抓张辉瓒，戴罪立功。

贺仲斌带领红军朝万功山扑去。穷途末路的张辉瓒狼狈地藏进了草丛中，10多名红军战士搜到油茶林中时，忽听到土坑边上的茅草“嗦嗦”作响，战士上前用枪一挑，发现一个全身发抖、神情惊慌、肥头大耳的汉子，随即把他押到山下。几个俘虏一看，认出这就是师长张辉瓒。红军战士顷刻一片欢呼声：“我们捉到张辉瓒了。”

黄公略注重以德服人，化

敌为友，贺仲斌就是典型的例子。龙冈之役结束后，黄公略拍着贺仲斌的肩膀，畅快地说：“你这个冤家！派你到红军步校当教官，如何？”贺仲斌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命，并对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兵们说：“黄军长是个人才，国军‘剿’了他那么多年，他的部队不仅没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壮大。他是个干大事的，我们跟着黄军长走，没错！”贺仲斌后来成为一名英勇的红军干部，始终没有背叛，奋战在反“围剿”战场，牺牲在长征前夕。

此役中的龙冈战斗，红3军担负正面进攻，黄公略始终在前线指挥，为红军合围、夺取战斗胜利立下了首功。红军歼敌9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黄公略率领的红3军歼敌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毛泽东大为赞赏，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著名词章：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

1931年5月底，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再次调集30万人马，亲任“围剿”总司令，于6月22日下午抵南昌坐镇指挥第3次“围剿”。

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是黄公略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最险恶的一场战役。这次战役，由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6次战斗组成。

8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调兵遣将，聚集到兴国周围地区，将3万人的红军包围得密不透风，红军处于北、东、南3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困境。毛泽东、朱德决定仍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在敌阵空隙中专拣杂牌军和弱敌打。

红军出击的时刻到了。黄公略红3军率先向东北方向突围，穿过敌第4师的包围圈，突然迂回到了敌后方，与兄弟部队一起，首战莲塘，再战良村，击败敌第47师和第54师两个师，两战皆捷。接着，黄公略又率部佯攻龙冈之敌，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出其不意猛攻黄陂，一举歼灭敌第8师立下功劳。5天之内，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初步稳定了局势。其后，黄公略率领红3军又在老营盘战斗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9月初，林彪、彭德怀与国民党军蒋鼎文第9师在高兴圩苦战多时，一时间僵持不下。就在同时，黄公略率领红3军却出其不意地在老营盘打了一个大胜仗，打的正是蒋鼎文第9师。

老营盘之所以成为战场，

纯属偶然。红一方面军原计划在高兴圩围歼国民党军蒋鼎文第9师，但战斗始终没有进展，打成了僵局。9月6日上午，第9师奉命将高兴圩阵地移防给蔡廷锴第19路军。蒋鼎文率部经老营盘，准备撤往泰和县。7日凌晨，黄公略率领红3军到达老营盘附近，意外发现蒋鼎文第9师正在村子里的峡谷地带集合，准备开拔。

蒋鼎文第9师以能攻善战、长途奔袭著称。蒋鼎文是国民党军名将，刚在中原大战中赢得了“飞将军”美誉，为什么会在老营盘这个险地耽搁了将近一天呢？原来蒋鼎文部与蔡廷锴部换防之后，行军到达老营盘村时，天降大雨，山洪竟然冲垮了山溪间的石桥，无奈只得在老营盘村黄土坳一带宿营，等待洪水退去。人算不如天算，这一等竟然遇上了黄公略。蒋鼎文第9师正在整队待发，对于红军的迫近毫不知情。由于事发突然，来不及请示，敢打硬拼的黄公略当机立断，指挥红3军扑了上去。战斗打响后，黄公略根据敌情变化，提出必须速战速决，争取1个小时内歼灭敌人。他命令第27团团长：“预备队不要了，快上前方打敌人，动作要快，要坚决猛攻！”

这一战，对红3军来说真是一步险棋。蒋鼎文第9师是国民

党军嫡系部队的甲等师，下辖2个旅共6个团，加上师部直辖部队有近1万人。而黄公略的红3军虽然号称一个军，但经过大半年的反“围剿”战争之后，所剩不过3000多人。虽然有萧克的独立第5师从旁相助，但是独立第5师刚刚组建不久，由当地农民游击队合编而成，战斗力很弱。然而，黄公略还是极为大胆地使出了这一险招，将蒋鼎文的部队致于了死地，国民党这位“飞将军”的部队，被红军的“飞将军”全部围歼在了峡谷中。

红军在清晨发动突击，午后1点便开始打扫战场，全歼蒋鼎文第9师一个旅3000多人，其中一个新兵团被集体俘虏。红军也付出了代价，伤亡800余人。黄公略把一场“以寡敌众”的遭遇战，最终打成了“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战绩，除了蒋鼎文第9师毫无准备之外，还得益于老营盘隘口的地形优势。此地有长达几公里的深沟山谷，最窄处宽度仅有1米多，山谷两侧是茂密的树丛，处在这样的地形之下，一旦突然遭到两侧高地的袭击，只能被动挨打。

老营盘战斗的最大“受益者”，是萧克的独立第5师。他后来回忆说：这次战斗胜利后，部队集中整顿。莫说梭镖，就是土造五响枪也不要了，独立第5师的武装已经和主力红军一样

了。

老营盘战斗是第3次反“围剿”的收尾之仗，进攻对象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果正如黄公略所预料，红3军在1个小时内全歼蒋鼎文第9师1个旅，为彻底打破敌第3次“围剿”，提前奏响了胜利的凯歌。

第3次反“围剿”即将全面结束时，黄公略奉命率红3军参加了方石岭追击战，歼灭国民党军第52师等部。然后，率部由西向东移往瑞金、石城、于都、宁都地区，主要任务是休整部队和拔除苏区内残存的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使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

9月15日，部队行至东固附近的六渡坳时，3架敌机突然从山后飞了出来，黄公略指挥先头部队立即躲进树林隐蔽。

这时，一位参谋跑到黄公略隐蔽的地方，指着山下的平阔地带说：“报告军长，你看7师还在路上行进。”黄公略一看，极为着急，命令道：“快通知他们就地隐蔽。”那位参谋盯着山下行进的部队，说：“他们正走在大道上，两旁都是水田，没有掩蔽的地方。”“那要争取让7师有隐蔽的时间，我们必须把敌机全部吸引到这里来！”黄公略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跳出遮蔽物，一面指挥部队隐蔽，一面组织对空射击。他大喝一声：“所

有机枪手听我命令，向敌机射击。”刹那间，3架敌机听闻机枪声，便飞来六渡坳，低空盘旋，疯狂扫射。

“打，狠狠地打！”黄公略夺过一位战士的机枪，对着敌机射击。行进间的红7师听到地空交火的密集枪声，看到敌机正在扫射轰炸，迅速冲过开阔地带，向两边山林奔去。红7师部队脱险了。但在与敌机对射中，3颗子弹从黄公略的右腋下穿过，顿时血流如注。黄公略立即被抬往兴国方山红军后方医院进行抢救，但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于当晚7时牺牲，年仅33岁。临终前，他仍念念不忘革命职责，给战友留下了宝贵的遗言，他断断续续地说：“一、二、三次反‘围剿’，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绝不可骄傲轻敌，应当充分准备。要巩固和扩大红军，以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解放。”

天公妒英才，黄公略的牺牲来得太突然了。这位威镇敌胆的虎将，屡经大战、恶战、苦战，从来没有负过伤，却倒在这次普通的行军途中。正当中国革命需要他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这位骁勇善战、有勇有谋、声威并重的红军杰出将领却过早陨落了。广大红军将士为失去这位高级指挥员而万分悲痛。

9月16日，黄公略追悼大会在兴国县鼎龙水头庄召开，草坪

上万人肃立，一片沉寂。红军指战员和附近的乡亲们臂缠黑纱、胸戴白花，会场上悬挂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为了纪念黄公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黄公略牺牲的地方，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设立了公略县。1931年秋季，红一方面军总部红军大学第5期学员在于都县城开课。时至翌年10月，红军总部为快速培养出更多的基层指挥人员，决定在红大第5期学员团的基础上进行扩编，成立一个军事学校。为纪念黄公略，军事学校后改名为红军公略步兵学校。该校设在于都县城昌村小学（现城关小学老校区），校长林野，政委先后为陈铁生、张际春、李芳远，训练部长韩纪振。培养对象主要是红军的排、连干部。该校一直办到1934年10月，最后一批学员随主力红军出发长征。1933年，在江西瑞金叶坪广场建造了公略亭，亭为3个角，寓意为黄公略是在第3次反“围剿”中牺牲，并在亭中立了

一块三棱锥体的石碑，上刻有黄公略传略。

黄公略的故居，在今湖南省湘乡市桂花乡朝阳村高木冲，距湘乡市44公里。198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黄公略故居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坐落在老虎山上，占地1200平方米，平房土墙青瓦，系黄公略祖父所建。1896年，黄公略分得房屋5

间，计113平方米。因原故居已毁，198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对故居按原状进行修复，并增辟两间辅助陈列室介绍黄公略生平业绩，陈列照片81帧、画4幅、实物31件。杨尚昆题写了“黄公略同志故居”匾额。聂荣臻、王震、邓颖超、杨得志、张爱萍、浦安修、郭沫若、李聚奎等为故居题词。

2002年8月1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人民军队早期将领（一）》纪念邮票一套5枚，第1枚即是黄公略。邮票以黄公略的一张西服便装照片为蓝本，采用炭精笔素描手法表现。

2009年，黄公略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编读往来


近日，本刊收到读者钱贤鑫、孙亚男的来信，对本刊2020年第6期刊登其撰写的文章《孙仁山的家国情怀》表示感谢。来信全文如下：

黄埔杂志社领导：

您好。我们是黄埔军校七分校原军法处长孙仁山少将的后辈。今年8月，我们观看讲述淞沪会战的电影《八佰》，感触非常深刻。殊不知自己的太爷爷孙仁山先生也曾参与了这场战役，后来我们重新整理太爷爷的书籍和日记，并根据史料以及王劲哉将军回忆录等，整理出一文《孙仁山的家国情怀》刊发于贵刊2020年第6期。在撰写文稿以及投稿的过程中，我们得到贵单位编辑同志热情的帮助和专业的指导，文稿几经修改完善后见刊，这也完成了我们的一个愿望。特此来信，向编辑老师及黄埔杂志社表达真诚的感谢，向你们致敬！祝愿你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愿杂志越办越好。

钱贤鑫 孙亚男
2020年12月21日



《黄埔》杂志创刊以来，以“为黄埔同学立言，为祖国统一尽力”为办刊宗旨，发扬黄埔精神，宣传黄埔师生的事迹，团结黄埔同学为祖国统一做贡献。我们所做的都是分内之事，应该感谢的是广大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作者和读者。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黄埔后代亲属和热爱黄埔事业的作者，能够挖掘出更多黄埔师生的事迹，为本刊提供更多更好的稿件，与我们共同携手将《黄埔》杂志越办越好。

记百岁抗战老兵——江国珍

□ 傅再纯

2020年9月14日，抗战老兵江国珍的家中，福建省南平市有关领导以及福建省、南平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向江国珍及其家属送上了鲜花和慰问金，对抗战老兵及家属表示真诚的问候，祝福江国珍老人身体健康。当天正值江国珍老人百岁生日，慰问人员还送上生日蛋糕，并为他唱起生日歌。江国珍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江国珍一生经历坎坷。青年时放弃学业，怀着满腔热血报国从军，曾经转战缅甸、越南，率部与日寇展开白刃战。晚年执教，殚精竭虑，深得师生的爱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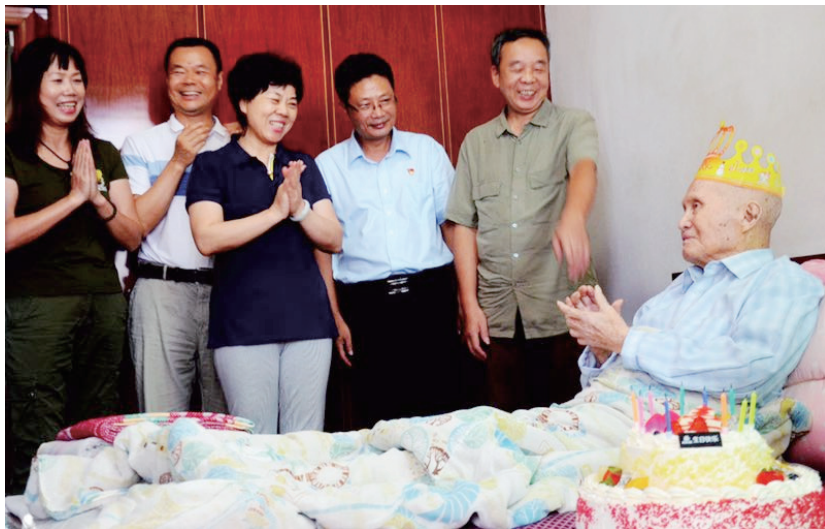
才俊青年，报效国家

江国珍，1920年9月出生于邵武市大埠岗村。他天资聪颖，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初中毕业后，尽管家境清贫，父母还是倾力供养他继续读书。1939年，考入福建协和大学（抗战期间迁邵武）附属高级农业中学，他希望将来成为一名农艺师。

1941年初春，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时期，黄埔军校在福建招生。国难当头，江国珍毅然放



/ 江国珍。



/ 福建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为江国珍(右一)过生日。

弃学业，和一批热血青年前往南平投考，考试合格后被黄埔军校17期录取。当年，父亲劝他，当兵危险，打仗会死人。江

国珍矢志从军，说：“国家都快没了，读农学还有什么用！”没想到此去一别便是10年，从此再也未能与父亲见面。

江国珍和邵武新生先到建瓯集中，然后到长汀参加入伍生团集训。3个月后才由成都军校派员接收，再经过数月跋涉，到达成都黄埔军校本部，开始为期两年的军校学习训练。军校培训兵种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江国珍学的是步兵科，入伍第一年，课程安排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不仅要学步兵操典、战术学和地形学等，还要学习射击、劈刺、投弹、爆破、土工作业。其中一项是“心理试验场”，即碉堡群的轻重机枪一齐射击，学员必须从战壕中向阵地上爬去，体验在敌人火网下的心理状态。

抗战期间，物资匮乏，学员住的是破庙、祠堂、草棚，一日两餐，生活极端艰苦，但国难当头之际，每一个学员都同仇敌忾，热情高涨。

当时，军校还聘请了美军教官，在中方翻译的协助下授课。江国珍之前就读的协和大学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学校，因此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再经过军校的学习，他的美式英语有了更大的提高。入缅作战后，远征军配备美械装备，美国军事教官配置到营连，更是无意中造就了江国珍过硬的英语水平。

第17期的军校学员原计划1943年6月毕业，因战事吃紧，1942年底提前毕业调往云南。

浴血奋战，远征缅甸

江国珍所在的部队是国民革命军52军195师585团。1943年春，部队开进缅甸，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攻克仰光，江国珍因战功升任连长，随后转战越南，攻占青门镇等地。1944年春，中国远征军会师于密支那、腊戍，打通中缅公路国际运输线。

1945年8月，各战区发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52军奉命由云南马关、西畴等地出击，进攻驻守北越的日寇。195师585团突击北越蒙坑镇之敌。江国珍回忆说：“当时，我担任585团第3连连长。8月5日晚，我连找到当地可靠居民作向导，夜间突进，秘密通过丛林带，到达林留线隐蔽待命。6日拂晓总攻开始前，我召集各排长布置攻击任务，1排为重点，攻击左侧蒙坑营房；2排向右攻占蒙坑镇街道；3排为预备队，随1排隐蔽跟进。”

蒙坑镇处于山谷小平原，地势开阔，左端营房为法国统治越南时期所建，四角有炮楼，暗堡密布，均为钢筋水泥结构，异常坚固。总攻开始，195师远程重炮呼啸着从头顶飞过，蒙坑一片火海，各部借着火力掩护，逐段跃进，通过了开阔地。2排攻进街道，占领了蒙坑镇区。但1排阻于营房围墙外，攻势受挫，士

兵伤亡很大。为了避免无谓牺牲，江国珍令1排停止进攻，监视敌人，3排预备队跟进占稳街道。这时，全营各部也进驻蒙坑镇，我方兵力雄厚，日军只能龟缩在营房内。

黄昏后，江国珍重新组织兵力，以3排接替1排，攻击营房之敌。战士们组成3个爆破组，背负重量炸药包，爬伏至围墙脚下，待信号弹升空，同时引爆，敌营房围墙炸开3个大口，全连弟兄乘势突入营房，与敌人展开格斗。是役，斩敌30余，敌余部向南逃窜。计缴获轻机枪6挺，三八式步枪百余支及大量弹药。

8月底，江国珍随部队奉命开进越南河内，亲历了庄严的日军受降仪式。

老当益壮，桃李芬芳

1950年2月，江国珍回到和平私立中学（邵武二中前身）任教。1951年调入邵武一中。1955年，江国珍因为“历史问题”回大埠岗老家务农。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大埠岗中学缺少英语老师，英语水平过硬的江国珍被学校聘为民办教员。

这一年他57周岁，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知天命的年龄，应该少干甚至不干了。但对江国珍来说，新生活才刚刚开始。他这一干就是17年，从来没有过半句怨



/ 2014年, 江国珍在阳台做体操。



/ 江国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 江国珍夫妻合影。

言, 直到1993年夏天73周岁的时候才离开学校。

江国珍的小儿子江立新也是大埠岗中学的老师。他回忆说：“父亲当年教两个班的英语，一个班四五十人，每天带回上百本作业，都是一本一本改，一行一行看，六七十岁的老人，带着老花镜经常熬到深夜。”

17年间他教过1000多个学生。几十年过去了，师生们仍然记得这位和蔼可亲、工作敬业的老师，不断有学生登门看望。

“国家”二字，高于一切


2015年8月，江国珍收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在这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他有过这样一段辉煌的经历。

江国珍的老邻居——64岁的江善和说：“我们就晓得他读过黄埔军校，不晓得他打过日本鬼子。”他的学生和同事对他这段经历也一无所知。

江国珍的妻子齐耀珊生于1929年，1946年与在吉林梅河口驻防的江国珍相识。结婚73年来，夫妻相濡以沫，不管多少困苦，多少磨难，始终不离不弃，相守一生。

晚年，江国珍跟小儿子迁往邵武市区闽福花园小区居住。笔者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卧床不起，神智也不甚清晰，但是还能够简单交流。问他打鬼子和教英语的感受，他含糊地嘟囔着“为国家啊，国家啊”。这是一句跨越了时空、跨越了生死、跨越了荣辱得失的真情表白。在他心中，“国家”二字高于一切。

不幸的是，江国珍于百岁生日后不久即去世！

致敬！抗战老兵，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国难跨马杀敌寇

——记黄埔骑兵薛维轩

□ 崔瀚鹏 蒲元

成为国家龙虎兵

薛维轩，陕西西安户县人，1922年出生，因家贫自小在舅舅家长大。在舅舅进步思想影响下，家里先后五人当兵，其中四人参加对日作战，一人在新疆伊犁保卫边疆安全。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薛维轩青少年时即产生了心系国家民族的朴素爱国思想。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西北的三秦热土上，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日高于一日，薛维轩逐渐萌发了报考军校为国效力的念头。1939年，17岁的他如愿考上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成为第18期骑兵科第8大队的一名学员。

黄埔军校第七分校驻西安城南，步科、工科、炮科等均在此展开教学和训练，但骑兵科因考虑到校本部专业教员缺乏、马匹供应困难等因素，其第17期、第18期、第20期、第22期学员均由位于甘肃天水马跑泉的陆军骑兵学校代训。

陆军骑兵学校尽管名声不大，却是抗战期间中国正面战场骑兵部队指挥员的主要培训机构。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9年创办于南京马标的陆军教导



/ 薛维轩向作者展示在黄埔军校的军装照。

队。1929年4月，教导队骑兵组成乘马步兵学兵连。学兵连不久扩充为乘马步兵营，1931年元旦再扩充编练为陆军骑兵教导队，直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招训黄埔第6期、第7期骑兵科学员。1933年2月，陆军骑兵教导队在南京改办为骑兵学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教育长章鸿春。1935年10月，骑兵学校奉令停办，多数人员安置资遣，但有一部分骨干人马拨归黄埔军校接收。1936年，黄埔军校将这部分力量组建骑兵军官教育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南京局势

吃紧，黄埔军校迁移四川成都，但骑兵军官教育班未随本队行动，而是辗转来到位于河南洛阳的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继续办学。1938年3月，第2期学员毕业。11月，骑兵军官教育班迁往甘肃天水马跑泉。1939年4月，经军事委员会批准重建骑兵学校，归军训部领导。实际负责人为日本骑兵专科学校毕业、曾任骑兵第11旅副旅长的胡竞先。

多年后，薛维轩仍然清楚地记得军校的学习情况：“学习的课程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学科主要分

为普通学、军事学、大教程等类别。普通学主要有文学、数学、物理等课程；军事学主要包括步兵操典、骑兵操典、马术、射击等课程。大教程则包括战术学、地形学、筑城学、爆破学、兵器学、通信学、相马学等。”

与学科并列的是术科，骑兵的基本训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例如，马场内外的马术训练。场内训练主要是对骑马基本要领的熟悉，而场外训练是要使骑兵对各类野外环境进行适应，包括上山、下山、过水、渡河，等等。此外还有障碍超越训练等，很有针对性。

薛维轩特别提到，除了学科和术科之外，学校还设有一门名为“轻乘训练”的特殊科目。所谓轻乘，是指人在骑乘马匹时，马所做的各种步度和人的动作进行变换的各种形式总称。

轻乘训练分为好几类：第一类是单人单马，主要训练速度的快慢及各种动作，包括悬垂、跳下跳上、倒立、倒骑、马上站立、单肢独立、镫内藏身等，共计16个项目；第二类是单人双骑，即一人两马，有横担二马、左右换骑等项目；第三类是二人二马，也是各种步度的骑乘训练，包括交换马匹等。此外，还有二人一马、二人三马、一人四马等训练。

听到此处，笔者不禁问道：“二人一马、二人三马的训练目的不难推测。然而竟还有一人四马的训练？一个人要带四匹马，又不是贩马，意义何在呢？”

薛维轩微微一笑，答道：“一人四马训练的是徒步作战时的马匹管理。在战斗中，骑兵往往需要下马徒步战斗，当时的骑兵多为4人一组，徒步战斗时，其中3人下马，将各自坐骑交给不下马的第四人控制，目的是保证马匹不在战斗中走失和受伤，便于任务结束后快速转移。这时，第四名骑兵就必须骑自己的马，同时右手牵两匹，左手牵一匹，控制好这三匹马，使它们在与主人分离的战场特殊环境下，不乱跑、不嘶鸣，服从指令。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必须要进行专门训练。”原来如此！其实，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后，骑兵已经退到战争舞台的边缘。然而，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远逊于敌，还需要大规模借助马匹去实现部队的机动性。

2012年9月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后，薛维轩回忆起早年的黄埔生涯，提笔写道：“艰苦学练习本领，成为国家龙虎兵。”

国难跨马杀敌寇

1942年，薛维轩从黄埔第七分校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

陆军骑兵第7师第20团4连任少尉排长，后历任中尉副连长、上尉参谋、特务连少校连长等职。

陆军骑兵第7师，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主要骑兵力量之一。1935年成立于山西芮城。全面抗战爆发前，该师驻绥远归绥（今呼和浩特），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辖第19团、第20团、第21团。1937年8月参加平汉铁路北段沿线作战，10月改隶骑兵第6军，参加太原会战。1938年起长期在绥远作战。

薛维轩对这支老部队感情很深，在他眼中，骑兵第7师是当时5个骑兵师中实力最强的部队，不仅官兵军事素养好，而且装备也好，每人都配发一顶钢盔，这是其他部队没有的，故而是人称“铁帽兵”。骑兵第7师的军马有青海马、蒙古马、伊犁马、山丹马，此外，师里还和当地民众交易换马，缴获的日军步枪加二百发子弹可以换一匹马，一挺机枪则可换三四匹马。

薛维轩记忆力好，在陕西抗战老兵中是出了名的。他曾经担任过团部参谋，看过师编制表，70多年后，他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骑兵第7师的编制情况：

全师辖3个团（第19团、第20团、第21团）及直属单位若干，编制人数6720人，马匹6750匹。

师部辖参谋处等机关及直

属单位特务连、工兵连、通信连、侦察队、炮兵营各一个。编制人员、马匹各1620，车辆10台。

团下无营，每团辖4个骑兵连，及重机枪连、迫击炮连、通信排各一个。编制人员1700人，马匹1730匹。

连部直辖一个卫士班，每班辖5个排，其中前4个排为骑兵排，每排3个班，每班编制人员16人、马匹16匹。第五个排是小炮排，配备六零口径小炮。

不难看出，骑兵部队的编制与一般步兵部队有很大的差别。

薛维轩回顾抗战时期他所经历的骑兵作战情况，总结出骑兵7种作战任务：

1. 侦察，对象为敌部队、指挥所、弹药库（车）、粮库（车）、油库（车）、通信设施等重要目标。
2. 警戒，担任友军主力左右侧或后方的警戒工作，防止敌迂回袭击。
3. 迂回，至敌侧背实施袭击，或减轻正面防守压力，或配合正面进攻取得胜利。
4. 包围，协同正面主力，从敌两翼及后方形成包围，动摇敌防御信心。
5. 袭击或破坏，出其不意地突击敌人重要目标。对象为敌指挥所、后勤物资、通信设施、交通枢纽、炮兵阵地等。
6. 阻击，快速到达指定方位，对敌增援力量进行下马徒步阻击，配合主力作战。
7. 追击，当敌溃退时，步兵速度较慢追不

上，骑兵远则射击，近则战刀劈杀，扩大战果。

这7种任务，都着眼于骑兵较高的机动速度和灵活的作战方式优势，涵盖了现代战争中骑兵作战的主要样式。当笔者看到薛维轩手书的这份记录时，也不禁为老兵惊人的记忆力和深厚的军事素养而叹服！

从1942年起，薛维轩一直在绥远随骑兵第7师行动，接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并与第35军并肩作战，参加老虎山战斗、包头外围战斗等，后来在临河、陕坝、五原等地抗击日寇，斩杀、射杀日军多人。

在对《陕西老年报》记者的讲述中，薛维轩谈到了他的对日第一战：“我第一次接触日本人是在1942年初秋的一天下午，我们团在搜索敌情时，发现敌人大约一个团的兵力准备偷袭我们的步兵部队。我们就下马挖掩体、设阵地，阻击敌人进攻，直到增援的步兵上来。打得很惨烈，日本飞机投下了燃烧弹，把我的裤子都点着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好多人都受伤了，我包扎好伤口后，还一马三骑，救回了两个受伤的战友。”

回想起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薛维轩写下了“国难跨马杀敌寇，歼灭日寇国太平”的诗句。

骑士战友是骏马

1945年日寇投降后，骑兵第7师奉命调往陕甘西兰公路担任护路工作，薛维轩所在的第20团则赴河南洛阳接收投降日军的战马。之后，第20团全部更换成缴获的马匹，将原有马匹交付第19团和第21团。此次接收后，薛维轩骑坐的是日军一个小队长的红栗马，薛维轩为其取名为“小黄龙”。1949年夏，薛维轩所在部队在甘肃景泰县起义，改编为景泰骑兵公安大队。不久，薛维轩退伍回到秦镇老家。

由于是黄埔军校毕业，有一定文化素养，薛维轩先后在户县秦镇小学、花园小学和苍游小学从事教学工作，担任过班主任、主任教师，所带班级在全县80多个学校的评比中获得过第五名的好成绩，还出席过全县初等教育工作者大会，作了先进事迹报告。其间，他还担任速成班老师，教乡亲们识字，帮助当地扫除文盲。上世纪六十年代，当地政府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薛维轩离开教育岗位务农。后因经济条件较差，自七十年代起，他利用自家临街的房子开了一间纸花店，从事工艺、纸花类、贡制丧葬用品的制作和销售。他制作的剪纸惟妙惟肖，深受乡亲们喜爱。此外，他还为乡亲们书写建房、婚丧嫁娶、祭祀等内容的对联。



/ 薛维轩于抗战胜利 67 周年前夕所画的自画像。



/ 薛维轩送别志愿者。

2010年，已经88岁的薛维轩加入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2015年和2019年，他先后获得中央颁发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从此，薛维轩的晚年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政府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经常到家中看望、慰问他。陕西志愿者团队还向他敬赠“抗战英雄”的牌匾，并将其挂在他开的纸花店门头上。

在向来访者讲述抗日经历时，薛维轩的话题总是离不开马。在黄埔受训期间，有一门名为相马学的课程，令他记忆深刻。70年后，薛维轩依旧能够回忆起相马学的很多内容：“相马

学对于骑兵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它主要研究对各种马匹的辨识。比如，从马的使用方面分类，有乘马、驮马和挽马。乘马就是人骑的马，特点是耳小、蹄小、腹小、胸宽，较为灵活；驮马就是驮东西的马，特点是耳大、蹄大、腿粗、腹大、头大，较为笨拙；挽马则是拉车的马，与驮马比较接近，笨且不灵活，相对更有力一些。再如，从毛色上分，有枣红、红栗、黄、白、黑青、菊花青、铁青、卷毛等等种类。黑马，全身黑毛，又名乌骓马；白马，全身白毛，又名白龙马；红栗，全身红毛，又名火焰驹、赤兔马；黄马，全身黄毛，又名黄马、栗马；青马，全身青白色毛；菊花青，全身

青白毛加油白花片毛，等等。又如，从产地上分，有伊犁马、青海马、蒙古马、山丹军牧场马、东洋马、西洋马等。”

在没有朋友来访、纸花店也没有客人的时候，薛维轩喜欢静静地看书。在他家中，笔者看到厚厚一摞《黄埔》杂志，还有几册专刊，不少杂志上都留下了他折页和勾画的痕迹。

同时，作画和写诗也是薛维轩常做的事，而战马，永远是他诗画中的主角。在很多画上，薛维轩都题写了诗词，同样，话题离不开他最挚爱的战友——马。例如，在活动障碍超越训练图的第二张上，他就写下了：“骑士战友是骏马，艰苦锻炼不能忘。马术练得精又精，保国驱寇战场



/ 薛维轩画作：左上图是他抗战期间所乘战马，其余是他障碍超越训练自画像。



/ 作者蒲元(右)到医院看望薛维轩。



/ 薛维轩画作：跨马挥刀与战友并肩作战。

上”的诗句。

2020年3月，笔者接到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侯丽的求助电话。她说，薛维轩因肺部栓塞、低蛋白血症、双侧胸腔积液住院，鄂邑区当地医院医疗条件不足，紧急转至西安市西京医院。因正处疫情期间，医院病房限制人数导致床位紧张，薛维轩只能在急诊科抢救而无法正式入院，家属非常着急。笔者第

一时间赶到医院，看见薛维轩却并不焦虑，手里捏着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的是他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和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证。薛维轩的儿媳告诉笔者：“老人到哪都要带着这个布包，时刻随身，绝不分开。”把荣誉和认可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就是最可爱的抗战老兵！

经过一番努力，笔者将薛维轩的抗战事迹设法转告医院。医院高度重视，很快在老年病科为薛维轩安排了最好的病床和医疗力量。陕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西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也迅速来人慰问。

这天，笔者一直陪在薛维轩身边，聆听他缓缓地讲述骑

兵第7师的有关情况。到了傍晚，他说：“我给你讲一次战斗吧，那是在包头外围的一次阻击战。当时日军迂回包围第35军的一个团，第35军要求我们阻击，”讲至此处，他轻轻呼了一口气说：“我有点累了，歇一歇再给你讲……”接下来，医院通知办理入院手续，笔者帮家属一直忙到当天深夜。一切安顿完毕，薛维轩已沉沉睡去，笔者悄悄告辞。孰料，不几日薛维轩病情迅速恶化，医院方面尽了全力，但仍没能挽救下这位已经98岁的抗战老英雄的生命。时至今日，笔者的录音笔里，还保存着薛维轩未尽的讲述。每听起这段录音，泪水便无声淌下……

老兵永不逝，只是渐凋零。



那个夜晚， 父亲在柳河车站所经历的……

□ 余良模

我的父亲余贤俊，字应求、季秀，号爱五、越人。浙江衢县人。上海大学毕业后入黄埔5期学习。曾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安徽省党部、中华海员特别党部、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第10集团军总司令部任职，先后参加北伐和抗战，历经中原大战、淞沪和浙赣会战，功绩卓著，获忠勤、胜利勋章。父亲文武兼备，是《党军日报》创刊初期主要成员。先后担任《大江通讯》《安徽民国日报》《安徽半月刊》《衢县国民日报》《新风日报》等报刊的社长或总编，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侵略集团与反侵略集团崩溃给我们的教训》《西班牙革命经过及其展望》等论著存世。父亲一般很少在家人面前谈及战场上的事，也许是在柳河车站发生的事过于离奇，所以和我们谈起过。至今，我对于父亲当年叙述的一切仍记忆犹新。

1929年，父亲离开中央军校，先后任职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

1930年5月，调往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任总司令行营政治训练部少校秘书、宣传队长。在这一年里，他亲历中原大战，度过了无数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5月，中央军主力与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在河南东部鏖战，双方投入兵力巨大，战斗异常激烈。开始时，中央军攻势凌厉，在空军配合下，一气攻占河南归德。为了激励士气，总司令蒋介石亲抵前线督战，设总司令部于柳河车站，坐镇指挥。为作战需要，在距离总司令行营不远的归德部署了临时机场。当年，只有中央军和东北军有飞机，而反蒋阵营的西北军和晋绥军只有骑兵和炮



/ 余贤俊。

兵，中央军的空中优势对反蒋阵营威胁非常大。一直以来，西北军将中央航空兵视为眼中钉肉中



/ 云集在柳河车站整装待发的中央军。

我和我的百岁父亲

□ 蒋光璞

我的父亲蒋润苑，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广饶，今年104岁。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生活所迫，1936年参加了东北军第53军。1941年考上了黄埔军校武冈二分校第17期。抗战期间，父亲随部队转战于陕西、河北、山西、湖南、湖北、贵州、四川、云南等地。经历过西安事变、武汉会战，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

战。抗战胜利后曾去越南接替受降部队60军的防务。

父亲虽已是百岁老人，但依然活到老，学到老，这也是他留给我们子女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桌子战

父母家60平方米的小屋里安放着一张桌子，1.2米长，0.8


米宽，虽说已经很陈旧，却是老两口晚年生活的活动中心。

每天写字，是二老几十年养成的习惯。都要写字，都要用桌子，这张桌子就成了他们每天的“必争之地”。经过多年的争执和磨合，桌子的使用规则是：父亲上午3小时写字，下午1小时看报；母亲下午两小时写字。桌子也有闲的时候，那就是他们生

刺，必拔之而后快。5月31日夜，西北军冯玉祥所部骑兵部队1000余人，长途奔驰40多公里奇袭归德机场。中央军担任机场警卫的两个连顷刻间被消灭，十余架飞机被烧毁，包括飞行员和地勤共50余人被俘虏。更严重的是作为中央军指挥中心的总司令专车就停在离机场不远的柳河车站。午夜时分，车上熟睡的人被枪声和爆炸声惊醒，远望机场方向一片火光冲天。蒋介石急令转移，要命的是因为火车头刚好被拉去加水，此时车头和车厢分离，列车无法开动。当时中央军主力均在前方，蒋身边除了200余名卫兵具备实际作战能力，其余几十位都是像父亲这样的总部

机关文职军人。西北军骑兵的马蹄声渐渐逼近，情势万分危急，欲战不敌，欲逃不能。西北军骑兵在中原大地上纵横驰骋，彪悍无比，行营卫兵别说区区200余人，就算再增加数倍，也无法抵挡素以骁勇善战闻名的上千西北军铁骑，当时的情形简直令人绝望。蒋介石对此作了最坏打算，果断下令将重要机密文件就地焚毁。随行的陈调元下令包括文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官兵一律携带武器下车，分布在车站周围，对外密集射击。幸而西北军骑兵不明就里，既不知敌军最高统帅就在眼前的列车车厢里面，也不知对方到底有多少兵力，夜色中遭到激烈抵抗，误以为遭遇大

部队主力，加之袭击机场目的已然达到，便觉得不宜久留，遂无心恋战，迅速撤离。然而，对于留守在柳河车站的总司令行营官兵来说，这个夜晚实在是惊心动魄，令人终生难忘。父亲曾经谈到在得知险情解除后，当时所有的人均长吁一声“好险哪！”

父亲在总司令行营虽然是文职军官，然而他毕竟在军校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之前在北伐中也有过实战经验。在这次柳河战斗中，他的作战表现虽然不能和百里千里挑一的总司令卫兵们相比，但是也没有相差太多。故而，事后他得到陈调元的赞许。次年，陈调元主政安徽，父亲随之调安徽省党部工作。

病时。有一年，父亲得病，在床上足足躺了半年。还有一年，母亲住院、看病也是小半年。还有一次，父母同时住院，都躺在病床上……

然而，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竟又能重新坐在小桌旁，每天笔耕不断，直到去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我每年都在父母家里住上几个月，利用他们不用桌子的空闲，也开始练字。慢慢地，我发现这张桌子似乎有魔力。只要我站在这张桌前，我的底气就会足；只要我提起笔，我就能心静如水；只要我闻到墨香，就会心花怒放。这种感觉是在自己的家里写字时，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的。

父亲提笔写字总是超时，我不得不和他“抢”桌子。和父亲“抢”桌子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斗智斗勇：“你睡我写，你写我溜，你停我占，写得了就写，写不了就看。”久而久之，我的字长进不大，“抢”桌子的方法却多了几招。如今想来，每天写字和父亲“抢”桌子，那感觉真是好极了，充实、美好、幸福，回味无穷。

父亲的“字外功”

父亲每天坚持写字，他的“字外功”，还真值得一说。

一是练字不择纸。父亲平



/ 作者和父亲蒋润苑。

时写字用纸，从来以废报纸、草纸为主。这还不算，还得正、反面都写，就连每天日历上撕下的巴掌大的纸，药盒里的说明书都不放过。我用过的纸，每天都会被他检查，寻找重新利用的价值。二是用笔不挑。一支笔坚持用到不能用才肯换新笔。我们淘汰下来的旧笔，到他手里都成了好使的家伙，再用上一阵子。三是自成“抖”体。92岁以后，父亲的右手开始抖，但还是坚持写字。写出的字的笔画，由无数均匀有序的小点点组成。写成一后一看，字的风骨依旧，神采不减，还另加了一种特别的韵味。我们叫它“抖”体。四是双手写字法。随着年龄的增大，父亲的右手有些不听使唤。他就发明了双手写字法。右手执笔、悬腕，左手

垫在右手下，扶持右手和右腕完成写字。有几十年的功力垫底，父亲现在用双手写出的颜体楷书照样厚重、大方、圆润、规范。

父亲的“字外功”是他用一生的历练写就的一本厚重的书，足够我们子女受用终生。

“战”友变老师

去年回到父亲家里，由于体力、精力跟不上，加之手抖得厉害，父亲挂笔不写了。和父亲“抢”桌子的战斗结束，那种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这让我如何是好！多年来我已习惯了和他“抢”桌子的学习方式。没有了“抢”与被“抢”的过程，我写字的兴趣、效果和积极性大打折扣。我感到很失落，又有些悲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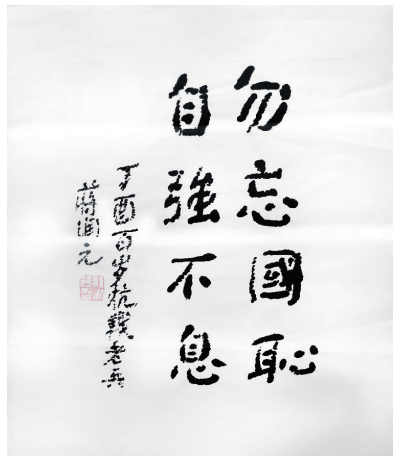
/ 蒋润苑为书法盖章。

父亲把我叫到身边，向我交底：家里的字帖你可以随便挑，随便选，随便写，随便拿。这“四个随便”政策放开了我的手脚，我反倒不知从何下手。正好电视上《书法课堂》正在讲王羲之的行书《圣教序》，我就选了本行书《圣教序》和《兰亭序》临帖。好在父亲头脑不糊涂，思维清晰，语言表达准确，眼睛经过手术后，视力恢复也很好，挑毛病的能力不减。多好的老师啊，就在自己身边，何乐而不用？这样一想，桌子战停息后心里产生的失落感被一扫而光，反倒增加了学习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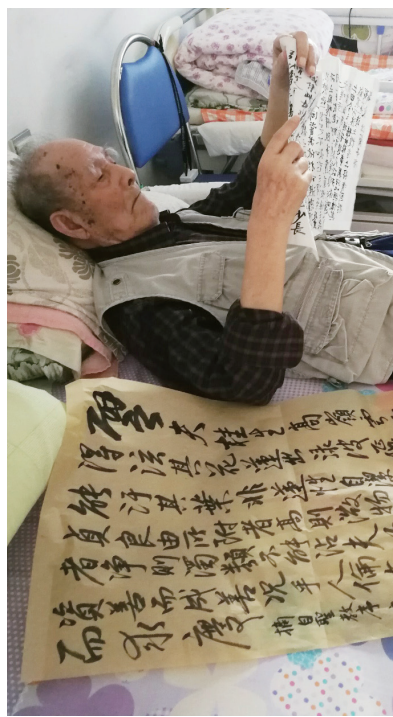
从此，我每天早上比他们早起两小时，临帖写字。等他们起来时，我写完了两大篇，等着让父亲挑毛病。父亲有个习惯，早上起床穿好衣服后，必须在床

上静躺半小时。这可是个好机会。我把刚刚写完、墨迹还没干的字拿给父亲看。父亲看得慢，但很认真，当场面授。他先通看一遍，找错字。父亲对错字不原谅，他说，写得好坏不要紧，写成错别字不应该。命令我把原帖拿来，对照着看，错在哪。有一次，我写《兰亭序》的324个字，竟然被他的火眼金睛发现了6个错别字。他说，6个里有3个写得四不像，四不像就是错字。我本想解释一下，但一想在白纸黑字面前，在严厉的老师面前，我就别狡辩了，还是老老实实低头认错，改过来就是。


父亲告诉我，笔迹乃心迹，墨痕即履痕。字就是一个人的心电图。要把写字当成修身、健身、养性的慢功夫，要去除功利意识，这样可以做到心手通畅，心无旁骛，更有利于写字的进步。



/ 蒋润苑的书法作品。



/ 蒋润苑检查女儿作品。

如今，写字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写字的这条路上，有104岁父亲的亲自指导与陪伴。这条路风景如同春园之草，不见其长，而日有所增。这条路还很长，看不到终点，它能给我带来心灵的平静与安宁，我行走，我喜欢，我快乐，我幸福。 

激情岁月

——忆“战干四团”

□ 王建

王建(1925—2017), 祖籍山东安丘。1942年从北京“山东中学”进入设在西安的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前身为战干四团), 被编入学生总队第3大队第3中队(黄埔18期), 成为黄埔政治科结业生。参加豫中会战, 在潼关激战3个月。1944年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 在印度兰姆伽训练基地训练7个月, 成为汽车兵团的上士班长。1945年冬, 回到南京。

1946年, 回到山东, 考入山东大学文史系。1950年, 大学毕业, 分配到青岛铁路职工子弟中学教书, 并获青岛市优秀教师等多项嘉奖, 被推选为青岛市四方区第4届政协委员。1988年加入民革, 担任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会副会长, 青岛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会会长, 屡次被评为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先进工作者。退休后继续从事业余教育工作, 并与他人合作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师出印度》。

1942年, 我17岁, 就读于北京(当时叫北平)私立山东中学。



/ 王建。

这已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五个年头。古老文明的北平已成为一个“木屐世界”, 日本兵车在大街上横冲直闯, 趾高气扬的日本兵和日本侨民随处可见。当时, 北平市民吃的是一种用橡子和花生壳合成的“混合面”, 既少营养又不易消化, 即使这种劣等食物也经常短缺。我所在的学校有日本教官, 实际上是学校的“太上皇”。他们可以任意体罚、殴打学生。师生稍有不满意言论, 即刻送往宪兵队长期关押。精神上的折磨更使人忍受不了, 强迫学

生效忠天皇, 为“大东亚战争”做贡献。凡此种使血气方刚的我深深感受到当“亡国奴”的耻辱。精神上的重压更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谈论侵略者的暴虐, 大家下定决心有机会一定投身于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去。一天, 苏州胡同小学的一位教师悄悄告诉我们, 说他可以介绍我们去西安报考军校, 并可以向我们提供去西安的秘密通道。事后才知道, 这位小学教师正是西安军校派往沦陷区招生的工作人员。

1943年寒假期间，我和山东中学的庞毓江、杨佐棠、李文川等同学按照提供的通道，先从北平乘火车到河南新乡，然后徒步经焦作到达博爱渡口，乘木船冒着生命危险于夜间横渡黄河到偃师，辗转三天到达当时华北唯一尚未沦陷的城市洛阳。从洛阳再乘火车到西安。费时半个月，行程万里，几经艰险，终于完成了从沦陷区到达大后方的旅程。我们的心情就像一个弃儿又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抵西安后即进入了战干四团。我被编入学生总队第3大队第3中队。当时的战干四团由蒋介石兼团长。胡宗南兼教育长。副教育长葛武荣，总队长包介山，都是黄埔早期的毕业生，蒋介石的嫡系。中队长韩永平是跟着冯玉祥打过仗的西北军，人很粗鲁，对学生训练要求很严格。训完话后要问一句：“懂不懂？”大家齐声回答“懂！”才罢休。韩队长是少校军阶，但朴实得像大兵一样。大家背后都昵称他为“懂事长”。

战干四团的全称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4团。早在1938年秋，以中央军校七分枝政治训练班、学员队、凤翔女生队为基础，加上胡宗南第17军团各军、师的文工队、敌工队等机构合并成立的。七七事变后，平、津、沪、宁等大城市相

继沦陷，抗日烽火燃遍全国，青年学生不甘心当亡国奴，成群结队从日占区投奔大后方。国民政府分别在湖北武汉、河南鸡公山、江西鄂州、陕西西安各地办起了战干第一、二、三、四团。4个战干团中，四团成立最晚，但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其它3个战干团都在1942年前合并于中央军校及分校。战干四团一直办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结束。其毕业生都取得战干团和军校的双重学籍，纳入中央军事院校系统。

战干四团地处西安小南门外，占用的是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旧址。东北大学原在沈阳，由张学良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迁到北平。1936年，东北大学理学院迁到西安。张学良动用15万大洋修建东北大学校舍，所以教室、宿舍的条件都很好。抗战开始后，日军一度逼近潼关，东北大学迁至四川三台。空出来的校舍就由战干四团接收使用。我到战干四团的时候，看到宿舍很整齐，大礼堂和办公楼外就是一排排红砖垒成的宿舍群。演兵场也很开阔。新兵入伍后有3个月的基础训练。每天听号声起床，匆忙洗漱后就集队跑步。绕着操场跑十几圈后才用早餐。餐后略事休息就按照步兵操典在操场上演习。教官和区队长都是早几年的军校毕业生。带队训

练一丝不苟，要求很严格。他们的口头禅是“演习场上多流汗，战场上才能少流血”，大家也都信服。军事操练完成后，下午就在教室里上政治课、文化课。学生每一个人一个小马扎、一块小木板，小木板平铺在膝盖上可以书写记录。政治课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国际国内时事等。

由于对抗日前途的关心，大家比较爱听时事课。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连震东教官，他的讲课最受欢迎。连震东时年40岁左右，身材高挑，穿一身褪了色的黄布军装。他讲课深入浅出，对日我双方的军力部署、战事消长，战争前途分析，鞭辟入里，引人入胜。我后来才知道，连震东教官家是台湾的旺族，其父连横是台湾著名史学家。连震东教官曾留学日本，洞察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回国后一直从事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工作。顺便提一下，连震东的儿子连战当年在西安读小学，抗战胜利后全家返回台湾。

另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方镇中教官。他本在法国留学，抗战开始由法国回国。人长得威武俊朗，课讲得好，在战干四团担任少将副总教官，深受同学们尊崇。方教官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深刻透彻，耐人寻味，开阔了我们的视野，鼓舞学生在世界大变局中树立抗日必胜的信

心。

叶鼎洛是文化课教官，是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他上课时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虽讲课照本宣读有些古板，但小说写得缠绵悱恻。他讲课的认真态度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战干四团有歌咏、戏剧、话剧等文艺宣传队，利用节假日，在团内演出，有时也到西安各单位演出。歌咏队经常演出的是一些抗日救亡歌曲。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新入伍的学生由歌咏队派人教唱《黄埔校歌》和《满江红》等歌曲。学生每天起床和就寝前都要集队点名，早点名唱《黄埔校歌》，首句是“怒潮澎湃”，晚点名唱的是《满江红》，首句是“怒发冲冠”，这“二怒”歌我们天天唱。从早到晚，高亢嘹亮的歌声给枯燥乏味的军事训练生活增添了一些激情。戏剧队最为轰动的演出是豫剧《木兰从军》。当时，豫剧名家常香玉风华正茂，她领衔的豫剧团在西安市剧院长演不衰，而《木兰从军》能连续演几十场，很受欢迎。战干四团的戏剧队把这出戏移植过来，经常在团外演出，鼓舞热血青年参军报国。

抗战时期，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军校学生的生活非常艰苦。穿打补丁的旧粗布军衣，打绑腿。脚上穿用布条编成的“草

鞋”，脚趾和脚跟都露在外头。早饭是稀粥咸菜，中、晚饭各有一个半斤重的“杠子馍”。鱼、肉是根本见不到的。但各中队也尽量想些办法改善生活。有一次，轮到我担任中队的生活干事，奉命和另一位同学到几十里以外的咸阳赶集。在牲畜市场上以低价买回一头已不能耕地的老黄牛，牵回来交给伙房杀掉了，光是出售整张牛皮就够本了，牛肉算白吃。说实在的，这条老牛身上剥不出多少肉，而且久煮不烂。但我们年轻，不怕吞不下去。连续几天，我们全队就靠这老牛肉“打牙祭”。战时生活条件的艰苦可见一斑。

由于条件的限制，战干学生不能经常洗澡，又缺少衬衣可换，一到冬天，人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我们对这种骚扰人体的虱子恨之入骨，称之为“日本虫”，以摸出来把它掐死为快。这种“日本虫”极易引起皮肤病的传播，不少人因之染上疥疮。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只能抹点茶水，也起不到治疗的作用。各中队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批准生疥疮的学生去华清池温泉治疗。华清池在骊山北麓，离西安不过20公里路。华清池温泉水含多种矿物质，有消毒去癣的功效。我们去泡温泉，自带干粮，住在破庙里。我们当然捞不着去当年唐明皇“春寒赐浴华清池”的贵

妃池享受。而是在山坡上的一处不收费的“大众浴池”浸泡，一天能泡上五六个小时。不几天，身上的疥疮居然完全落痂了，大家才又欢天喜地地回去。抗战时期，能在胜地华清池消闲几天，泡温泉治好顽疾，也是军校生活的一段佳话。

1944年春夏之间，日军以10个师团的兵力发动了豫西战役。5月1日攻陷许昌，25日洛阳失守。5月底，陕州和灵宝两大重镇又相继沦陷。灵宝西距潼关90公里，是潼关的门户。如果潼关被攻破，那么西安则无险可守，大局堪危。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胡宗南派出坚兵强将，阻敌于潼关之外。经多次拼杀，终于在6月中旬收复灵宝、虢略镇两地，大局才算暂时安定下来。

在豫西战役开始阶段，战干四团就动员学生组成战地工作队，开赴抗日最前线。记得我们是在端午节前一天到达灵宝，当时敌军刚刚退去。灵宝县城百业俱毁，十室九空，一片凋零。我们组成救护队、抢修队、宣传队深入到城镇及各乡区，做些救助安抚工作。我在学堂给孩子们上过课，还编写活报剧《仇与恨》，组织人员在街头巷尾演出。因为几十公里外就是日军阵地，上课或演出的时候，还能听到阵阵枪声。我们工作队员配有

枪支，个个都是射击能手，战斗意志高昂，也随时准备和胆敢来犯之敌搏杀。

从灵宝出来，我们战地工作队又在潼关驻扎了一个多月。潼关地处陕、晋、豫三省交界处，是关中地区的东大门，背倚华山，下临黄河。黄河对岸就是山西的风陵渡。我们在潼关和日军隔河对峙，时刻能听到对岸日军的枪炮声。我们守在潼关高处，油然而产生“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英雄气概。在灵宝和潼关，我们接受了战争的洗礼，增强了抗敌的意志，真刀真枪，面对强敌，发扬不怕死的爱国精神，这种气氛在军校演练场上是无法体会的。在前线，胡宗南以西北统帅的身份对战地工作队全体队员进行检阅。这位五短身材的将军讲话声调颇高，勉励大家奋勇杀敌、报效国家。我们每个队员都为自己能阻挡日寇于潼关之外而感到无比自豪，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我们战地工作队从前线回到战干四团不久，就遇上了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的青年从军热潮。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英对日本宣战，世界战争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汇合在一起。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先后攻占东南亚各国，

完成了对中国的大包围，也直接危害到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由于英国在缅甸的驻军力量薄弱，要求中国进军缅甸。美国驻重庆的史迪威将军也建议中国组成远征军入缅协同作战。当时，我国海港已被日军全部侵占，以缅甸仰光为起点经曼德勒、腊戍、畹町到达昆明的滇缅公路是中国与国际交往的唯一通道，这条大动脉一旦被切断，抗日战争将更加艰险。中国远征军在这一背景下，于1941年12月11日以10万兵力开赴缅甸对日作战。

入缅作战的远征军英勇顽强。但在与英军协同作战中，由于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外语交流能力和文化素质都很差，很难适应战场上的变化和需要，也不能掌握新式武器的使用。1943年，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要求军委会补充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兵源，这就掀起了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的浪潮。1944年初，四川军管会秘书长徐思平在三台东北大学讲话，要求学生自动服兵役，从军抗日。当场就有许多学生申请参军。第二天，徐思平又召集中学以上学生2000余人讲话，当场又有男生200余人，女生30余人请缨。青年学生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促使当局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在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

从军热潮的推动下，战干四团从上到下也积极行动起来。自1944年10月起，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三四百人报名从军。原因是：当时战干四团的学生中，大多数是从沦陷区各大中院校流亡出来的热血青年。这些人单纯热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恨之入骨，现在有了从军报国的机会，大家当仁不让，愿意早日奔赴抗日前线与敌人血拼到底。

在报名从军的人员中，还有不少是具有军衔的干部。有一位中校大队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30多岁，坚决报名从军，他说：“摘下军衔、放下架子、从兵干起。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发扬不怕死、不爱钱的黄埔精神，杀敌报国、革命到底。”这番讲话使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记得，经批准从军当兵的校尉级军官就有十多位。就是在这激情昂扬日子里，我和同队的李佩荣等多位同学，生死结盟，共同从军。战干四团批准我们提前毕业，颁发配剑和证书。1949年11月，我们乘飞机越过秦岭到达云南沾益大营房，然后乘美国军用飞机越过“驼峰”到达印度的兰姆伽训练中心。经过培训，编入中国驻印军汽车兵团，驰骋于中、印、缅战场。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们才沿着新打通的中印公路返回祖国。■

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 (上)

□ 杨守礼 黄胜利

1926年5月24日，蒋介石“为忠实于中国国民党并求其精神与意志统一，以促进国民革命之完成和三民主义之实现”，授命组织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会。6月27日，黄埔同学会正式成立。这引起旧军人的不平，1927年就酝酿加强北洋时期的四校同学会，以与黄埔同学会抗衡。1930年11月，蒋介石先令黄埔同学会解散，迫使加强四校同学会的企图胎死腹中。一个月后，12月12日蒋介石成立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以这一名称实际上恢复了“黄埔同学会”。1935年9月19日，蒋介石将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扩充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隶属军事委员会，以刘咏尧为处长，黄雍为副处长，主持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联络考核等事宜。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在自己的文件中直言不讳地宣示，“本处胚胎于黄埔同学会”。

关于黄埔同学会和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产生和演变、国共两党在其中的斗争、蒋介石对其所作的备案、以及它们的作用和历史定位，我们曾做过一些探讨，这里我们就得到的

一些资料，再就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各种变化和表现，作一些评介。

随战局演变办公地点不断内迁过程

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办公地点随战局演变不断辗转内迁：

1937年11月21日，由南京出发西迁；

1937年12月8日，到达湘潭，分驻韩家仓、由义巷及洗脚桥三处办公；

1938年3月17日，由湘潭迁驻长沙南门外社坛街办公；

1938年5月29日，由长沙出发迁移武昌，于30日到达，驻银元街三楚中学办公；

1938年8月5日，由武昌出发迁衡阳，于8日到达，驻汤家坪办公；

1938年10月22日起至12月22日，人员、公物分四次经水陆两路由衡阳迁至桂林，驻江东岸六师洲，候车转渝；

1939年1月11日，开始由桂林迁渝，于22日全部到达；

1939年1月24日，在渝驻桂

花街达育小学内开始办公；

1939年5月4日，由重庆市迁至巴县小龙坎栀子湾办公；

1939年11月10日，由栀子湾移至覃家岗自建新屋办公。

由上述办公地点迁移的过程可以看到，毕业生调查处从1937年11月到1939年11月两年间，就迁移了八九次之多，少则两个多月，长也不过半年。这样频繁地迁移办公地点，一方面说明，抗战初期中国面对强敌的艰难处境，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中国军民坚持抗战，在艰难中步步为营，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艰苦卓绝的战斗意志。此外，可以想见，一个政府机构在这样的频繁转移中坚持工作会有多么困难。这不仅是携带大批文件物资转移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的问题，还有在这样长年累月的迁移过程中，如何保持队伍战斗意志不被消磨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只是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在转移，成百上千的政府部门都在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每个部门都面临着工作人员体力的消耗和精神的消磨。中国政府能够在抗战初期历经艰难，完

成政府各机关和众多单位向后方的转移，是一个艰巨的行动，这个行动的完成是中国政府的重大成功，也是千百万公务人员和民众深藏家国情怀、对抗战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隶属关系和编制的变化

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隶属关系在抗战期间的变化：

1935年9月19日，成立于南京，直隶军事委员会；

1937年9月1日，奉令改隶训练总监部；

1938年3月15日，奉令改隶军政部；

1942年12月21日，接铨叙厅公函，归并铨叙厅，重新调整；

1942年12月28日，经军政部核定该处调整事宜，一律由铨叙厅办理；

1943年2月2日，仍直隶军政部；

1945年7月，改隶铨叙厅。

毕业生调查处成立之初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而军事委员会则是国民政府的首要直辖机关。1937年，毕业生调查处改隶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部是国民政府内仅次于军事委员会的直辖机关。1938年3月15日，该处奉令改隶军政部，军政部不是国民政府的直辖机关，而是国民政府行政院一个重要的部。1942年

12月底，该处归并铨叙厅，铨叙厅是国民政府直辖机关军事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厅，毕业生调查处又回到了军事委员会治下。1943年和1945年，该处又分别改隶到军政部和铨叙厅。8年时间，毕业生调查处就5次改隶，这似乎太频繁了，这也说明这一机关是比较重要的部门，掌权者总是要把它放在手边，军事委员会也好，军政部也好，铨叙厅也好，都是最重要的核心机关，只是放在哪用起来更顺手罢了。当然，顺手不顺手就看当时这些机关的负责人是谁了，这也许就是隶属关系频繁变化的原因所在。一直担任毕业生调查处处长的刘咏尧，从1941年起就相继兼任军委会第二厅、第一厅和铨叙厅负责人，所以当他1942年6月调离毕业生调查处处长职务，去军委会之后，毕业生调查处的隶属关系就在年底由军政部转到铨叙厅去了。

毕业生调查处的编制在抗战期间也随形势而变化：

1939年9月1日，呈准扩大编制，由原三科六股一室扩编为三科九股一室；

1942年4月21日，呈准修改编制，由原有三科九室改为六科三室；

1942年12月18日，遵令办理裁减员兵四分之一；

1943年2月2日，奉军政部令，

组织缩小；

1943年2月12日，遵令缩小该组织，将现编制之六科三室改为五科二室；

1943年8月1日，奉令实行缩编后之新编制，正式改为五科二室。

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从成立之初一直到1942年上半年，编制都是在逐步扩大。1939年前设少将处长1人：刘咏尧；少将副处长1人：黄雍（上校副处长谢远灏）；中校秘书1人：杨良；少校秘书1人：朱松涛。下设三科六股：第一科上校科长1人：田绍翰；置指导股和考核股，各设中校股长陈叔渠和刘兰陔。第二科设上校科长1人：侯鼎钊；置统计股和通讯股，各设中校股长侯鼎钊（兼）和蔡汝慎。第三科设中校科长1人：王仲平；置文书股和事务股，各设少校股长肖受刚和孙重斌。全额官佐45人，士兵公役23人。1939年扩编后达到全盛时期，竟达三科九股一室。1942底，国民政府开始要求该处裁减1/4编制，1943年2月，就将六科三室缩小到五科二室。这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消耗日增，需要适当缩小编制。到抗战接近胜利之时，面临战后部队和军事单位的缩编，毕业生调查处自然也在其中。

毕业生调查处任官的变化

抗日战争前的1935年9月，蒋介石就将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升格为处，不再隶属中央军校本部，而是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并任命刘咏尧为处长，黄雍为副处长。1937年2月11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申请备案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并再次明确任命刘咏尧为处长，黄雍为副处长。

抗战开始后，毕业生调查处主要官员任免记录如下：

1938年1月1日，主任秘书谢远灏奉命升任副处长；

1942年6月1日，处长刘咏尧呈准辞职，副处长谢远灏奉令升任处长；

1942年6月15日，前处长刘咏尧来处与全体职员话别，并聚餐留影；

1942年8月12日，奉军政部令批准派该处主任秘书田绍翰兼任遗族工厂厂长；

1942年8月28日，副处长黄雍呈准辞职，主任秘书田绍翰升任为副处长；

1944年2月11日，国民政府令谢远灏为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

1938年初，毕业生调查处主任秘书谢远灏奉命升任副处长，但从报备角度看，黄雍此时还在副处长任上。不过黄雍

已于1938年1月被任命为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专任少将副处长。该处是受蒋介石命令于1937年10月成立的，中将处长魏益三，兼任少将副处长郝子华不久即辞职，由黄雍专任少将副处长，官佐100人，士兵69人，编制比毕业生调查处大一倍多。魏益三生于1884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炮科毕业，原是奉系的一个小军阀，1926年12月加入北伐军，先后任30军军长、第8军军长兼第2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第2路代总指挥等职，1937年任中央伤兵管理处（即荣誉军人总管理处）中将处长。他年纪已大，又有一些虚衔在身，不能专注于伤兵管理事务。而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之后，几十万伤残官兵亟待救治和安置，必须有一个得力负责人才能胜任。此时，何应钦和蒋介石决定把毕业生调查处的副处长黄雍调来，任命为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专任副处长。因为毕业生调查处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安置救治伤残军校毕业生，黄雍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于是黄雍就很少参与毕业生调查处的工作了，这个头衔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虚衔。当刘咏尧1942年中调离调查处处长职务去銓叙厅时，该处副处长谢远灏升任处长，黄雍在该年8月请辞调查处职务，才了结了这

一虚位，主任秘书田绍翰顺理成章地升任为副处长。1944年2月11日，国民政府令谢远灏继续任毕业生调查处处长。

蒋介石对毕业生调查处的指令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曾多次直接向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发出指令，我们查到的记录主要的有：

1939年3月31日，蒋介石手令：“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主任：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应注重学生毕业后之考核联系等工作，希即切实设计如何健全充实，使能尽责生效。”

1939年4月3日，蒋介石面谕刘咏尧，呈报本处优秀干练之人员。

1939年4月6日，刘咏尧奉蒋介石4月3日面谕，呈报该处优秀干练之人员田绍翰等14名。

1942年7月27日，该处处长受蒋介石面谕：“一、应注重毕业生考核；二、应与銓叙厅切实联系。”

1942年8月24日，蒋介石发给遗族工厂内遗族一次救济金一万一千六百元。

1943年2月15日，该处处长受蒋介石面谕：“一、对于在部队服务潜逃之毕业生，应依法惩办，不宜开除学籍了事，着拟定防止办法呈核；二、调查志愿赴边疆屯垦之毕业生。”

1943年2月17日，对于军官总队之处置办法，经蒋介石批准，除合于退役者外，其余待命移垦西北。

蒋介石对毕业生调查处的指令，主要包括：注重毕业生考核联系；呈报优秀干练之人员；部队潜逃之毕业生依法惩办，拟定防止办法呈核；调查安置赴边疆屯垦之毕业生；抚恤毕业生遗族；与铨叙厅切实联系。前三点主要是对毕业生的联系考核和奖惩，关于毕业生潜逃，蒋介石命令“拟定防止办法呈核”，所以1943年10月27日，毕业生调查处订定了《防止现在部队服务毕业生潜逃办法草案》。

第四点是调查安置毕业生赴边疆屯垦，这是毕业生调查处与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和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相重叠的工作，毕业生调查处只负责安排失业或伤残的军校毕业生（军官），而荣誉军人总管理处和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则负责伤残的官兵两方面人员的生产和生活的安排。这一工作把毕业生调查处和荣誉军人总管理处和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联系起来。屯垦是国民政府抗战后期安置失业军官和伤残士兵的一个主要途径。

第五点是抚恤毕业生遗族，这里，蒋介石发给遗族工厂内遗族一次救济金11600元。此外1942年9月2日，中正学校还编制

了各军校毕业生遗族子女名册，签请蒋介石赐给教育费。1941年6月13日，胡文虎参政员捐款10万元，分发中正学校和遗族工厂各6万元。1940年4月10日，宋庆龄、宋美龄和宋霭龄三姊妹还专程来中正学校接见学生，并参观遗族工厂。这些都表达了当时国民政府、政界名流和社会各界对于为国捐躯烈士遗孤的深切关怀。

第六点是与铨叙厅切实联系，这实质上是指示毕业生调查处要切实遵从领导机关，这是蒋

介石控制毕业生调查处的关键所在。因此，1943年10月29日，毕业生调查处订定了《本处与铨叙厅工作联系办法》。

关于1939年4月3日蒋介石面谕刘咏尧，呈报本处优秀干练之人员，刘咏尧于同年4月6日即给蒋介石报告：“面谕着将该处优秀干练之人员报核。兹查有科长田绍翰等十四员，学能俱佳，做事负责，理合列表呈资，敬乞鉴核。”所列14人见下表：

上表可见，优良职员一半是

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学能优良职员报告表

职级	姓名	年龄	籍贯	出身履历
上校第一科长	田绍翰	32	湖南	黄埔5期，编篡股长、教官、总编
中校第二科长	侯鼎钊	34	江苏	黄埔1期，参谋、秘书、政训处长
中校指导股长	陈叔渠	32	湖南	黄埔6期，参谋、秘书、编辑组长
中校组织股长	蔡汝慎	38	江西	黄埔6期，政训员、指导员
中校考核股长	刘兰陔	32	湖南	黄埔6期，排连长、科员、股长
少校事务股长	孙重斌	26	湖北	政训班1期，队长、政训员、科员
少校秘书	朱松涛	38	湖南	粤军官讲习所，参谋、秘书、科长
上尉股员	黎明	31	浙江	金陵大学，统计员
中尉股员	倪天才	31	浙江	浙江党校1期，科员、股长、指导员
上校服务员	陈康黎	39	湖北	高教班2期，团长、参谋处长、副旅长
中校服务员	赵尔玉	32	贵州	黄埔7期，连长、训育主任
贵州处付主任	韩城	38	江苏	政训班1期，科员、指导员
陕西处付主任	杨造时	34	湖北	黄埔4期，营长、政训员、科员
军官总队大队长	张瑞澄	36	河北	高教班2期，团长、参谋处长、副司令

黄埔军校毕业生，大多数籍贯是南方各省，而且年龄都很年轻，最大的上校陈康黎也只有39岁，大部分只是30出头。抗战期间在战场上拼杀的士兵大多是20岁左右的大孩子，指挥他们的下级军官也就是20出头，中级军官也就是30出头。抗日战争使我们国家损失了千百万年轻的子弟，他们以生命赢得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们。

毕业生调查处的下属机构

根据《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员)生调查处组织条例》，毕业生调查处“于中央各军校及全国各省市、各部队设立通讯处或直属通讯分处，或直属通讯小组”。此外该处尚有奖惩委员会、军官总队。各通讯处协同中央调查处完成如下事项：调查统计各年度各军校之班次及毕业生人数及各兵科人数，科长、团长以上同学人数，抗战期间伤亡同学人数及受奖惩同学人数，调查统计各月份学籍登记人数，调查亡故同学生平事迹及其家属情况，调查所在军校机关及部队历年度之概况等。到1938年底，毕业生调查处负责调查的各学校、训练班团队等计有86个单位，此时毕业生人数为146862人(包括军校本校22302人，各分校32220

人)，已登记者为77268人，占毕业生52.6%，正在核发登记证者44275人。1937年各军校开始办理集体登记，修订登记规则和表格，调查未统计同学数量，并限定1939年内一律补行登记。

在抗日战争之初的1937年已设通讯处(分处)的省份有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四川、贵州、陕西、上海14个，在柏林亦设有通讯处，1938年后又增设广西、西康、云南等省通讯处，亦有沦陷区通讯处被撤销，仅派联络员继续工作；军区方面原有通讯处148处，后归并调整为58处；各军校有通讯处25处；各机关有通讯处13处。我们能查到的关于通讯处在抗战期间的增减变化情况如下：

1939年1月1日，设立广西省通讯处。

1939年6月1日，设立西康省通讯处。

1939年7月15日，成立云南省通讯处。

1939年7月15日，恢复湖北省通讯处。

1940年2月1日，于西安成立特设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通讯处。

1942年2月27日，成立美洲通讯处，蔡文治兼任该处主任。

1942年3月13日，特设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通讯处驻陕坝办

事处。

1943年2月15日，成立安徽临泉直属通讯分处。

1943年9月10日，裁撤威海卫直属通讯小组。

1943年9月30日，裁撤江苏省通讯处。

此外，设立的学籍登记单位有：

1940年4月1日，签准青岛海军学校为本处学籍登记单位。

1940年9月1日，签准前广东军事政治学校为本处学籍登记单位。

1941年1月15日，签准第一、三两战区干部训练团为本处学籍登记单位。

1941年1月25日，签准特种兵西北联合分校为本处学籍登记单位。

1942年1月26日，签准第九战区干训团、军政部兵役干部训练班、战区政治部游击政训班、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等为本处学籍登记单位。

1943年4月27日，签准前汉阳兵工专门学校为本处学籍登记单位。

1943年9月2日，签准第六战区干部训练团及军政部南岳计政人员训练班为本处学籍登记单位。

抗战期间各通讯处的负责人及其简况(括号内为继任者)

如下：

浙江省通讯处，主任宣铁吾，黄埔1期，浙江人，时任浙江省保安处长；副主任周汉仪，黄埔6期，湖南人（胡履端，黄埔2期，浙江人）。

四川省通讯处，主任叶维，黄埔4期，四川人（史良，黄埔3期，中央军校教官，四川人）；副主任杨律，黄埔4期，四川人（彭钧烈，黄埔4期，四川人）。

湖北省通讯处，主任阮齐，黄埔2期，湖北人，时任军训主任委员、保安处长；副主任覃学德，黄埔1期，广西人（蔡汝慎，兼，黄埔6期，江西人，毕业生调查处通讯股长）。

江西省通讯处，主任郭礼伯，黄埔1期，江西人，第6预备师师长；副主任张礼猷，黄埔2期，江西人（张谓珍，黄埔6期，湖南人；谢振华，黄埔2期，江西人）。

河南省通讯处，主任萧作霖，黄埔4期，湖南人（王汝泮，黄埔4期，河南人，军训处长）；副主任张其峯，黄埔6期，湖南人（艾圣绪，黄埔4期，河南人）。

湖南省通讯处，主任蒋肇周，黄埔3期，湖南人（李树春，黄埔1期，湖南人，保安处长）；副主任向阳，黄埔5期，湖南人。

福建省通讯处，主任叶成，黄埔3期，浙江人，时任保安处长（黄珍吾，黄埔1期，保安处

长）；副主任邝积典，黄埔4期，湖南人。

云南省通讯处，主任陈廷壁，黄埔一期，省党部常委，云南人；副主任卢浚泉，黄埔四期，时任干训班上校团长，云南人（李琛，黄埔四期，四川人）。

陕西省通讯处，主任马志超，黄埔1期，时任公安局长，甘肃人（徐经济，黄埔1期，陕西人，保安处长）；副主任万国藩，黄埔2期，江西人（杨造时，黄埔4期，湖北人）。

甘肃省通讯处，主任史铭，黄埔1期，湖南人，时任公安局长（刘味书，黄埔1期，第八战区参议，湖南人）；副主任胡维藩，中央军校军研班，浙江人，军训处长。

贵州省通讯处，主任冯剑飞，黄埔1期，贵州人，时任保安处长（何辑五，陆大12期，贵州人，省府委员）；副主任赵尔玉，黄埔7期，贵州人（韩斌，中央军校政研班1期，江苏人）。

广西省通讯处，主任卿明骐，黄埔3期，广西人；付主任扶伯宏，黄埔6期，湖南人。

广东省通讯处，主任侯志明，黄埔4期，广东人（吴乃宪，黄埔1期，广东人，保安处副处长）；副主任谢镇南，黄埔3期，广东人（李崇诗，黄埔6期，湖南人）。

青海省通讯处，主任哈世

昌，中央军校特训班1期，江西人，82军政治部主任。

特设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通讯处于西安。

美洲通讯处，主任蔡文治，黄埔9期。

欧美通讯处，主任邓梯，黄埔1期，湖南人；副主任吴祖楠。

下面这些通讯处1937年尚在工作，1939年因战局的变化，活动基本停止：

安徽通讯处，主任李国干，黄埔1期，广东人；副主任丁培鑫，黄埔5期，安徽人。

上海通讯处，主任陆杰，黄埔1期，江西人；副主任吕哲，黄埔4期，四川人。

江苏通讯处，主任李守维，黄埔2期，江苏人，时任保安副处长；副主任侯鼎钊，黄埔1期，江苏人。（1943年9月30日，裁撤江苏省通讯处。）

河北通讯处，主任缺，副主任何其祥，黄埔5期，河南人。

山东通讯处，主任缺，副主任孟振干，黄埔4期。

山西通讯处，主任王国相，黄埔1期，山西人，时任保安团长；副主任王慎之，山西人。

绥远通讯处，主任包景华，黄埔4期，奉天人。

留日直属小组，组长严泽元，黄埔3期，四川人。

各通讯处的负责人几乎全

是黄埔毕业生。

规章制度的建立

毕业生调查处从成立之初，就注重规章制度的建设，尤以1937年之后为甚，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建立的规章总共不下60个。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毕业生调查处本身工作的规章：本处组织规程及服务规则；毕业生失业登记规则；毕业生奖惩办法；本处与铨叙厅工作联系办法；视察报告规范；毕业生举行聚餐会办法；整理各地新生活俱乐部或宿舍办法；本处通讯章程；本处招待失业同学办法；毕业生申请失业登记须知；对于行伍军人协会处置办法；本处工作检讨会议规则；命令监察办法；本处办理毕业生申请保送升学或受训办法；毕业生申请资助求学办法；本处经理委员会组织大纲；毕业生服务状况调查办法；毕业生捐资兴学及举办同学福利事业奖励办法草案；防止现在部队服务毕业生潜逃办法草案；会声日报各地方版刊行简则草案等。

毕业生学籍管理规则：毕业生学籍特许登记审查委员会组织规程；本处办理各短期军事训练毕业生学校登记甄别办法；毕业生遗失毕业文凭请发证明书规则；毕业生学籍登记规则；毕业生学籍集团登记办

法；毕业生缴纳学籍登记费每人一元办法；毕业生自传要点；毕业生假冒学籍及伪造篡改学籍登记证之处置办法；军官总队收训失业军官审查证件办法；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各期毕业生调查学籍及改换学籍登记证办法；开除毕业生学籍办法等。

各级通讯处工作管理指导纲领：本处各通讯人员聘任办法；各级通讯组织战时工作指导纲领；本处颁发各级通讯机关印信办法；各级通讯机关交代规则；本处各通讯人员见习办法；各省市及驻各军校、各部队、各中央机关等通讯处组织规程；特设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通讯处组织大纲；军需学校所属各班一律设立本处通讯处办法；驻各军校通讯处寄发毕业生学籍登记办法；驻各部队通讯处每次战役后之详细报告办法；通讯小组会议规则；通讯小组会议缺席惩罚办法等。

毕业生及遗族照顾救济抚恤安置规定：失业毕业生借款办法；毕业生经济互助会简章；经济互助会贷款给恤赡养金等规则草案；军官总队拟定老弱残废失业毕业生安置办法；筹设阵亡同学遗族工厂计划纲要；阵亡毕业生遗族子女教育补助费给与办法；中正学校对于各军校毕业生遗族免费办法等。

新生活俱乐部和宿舍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倡导的全民性运动，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见之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之中。以社会教育的方式，使一般国民日常生活注重纪律、品德、秩序、整洁，达到“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的目标，使人民从根本上革除陈规陋习，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意识”，想要借此“改革社会，复兴国家和民族”。蒋介石认为“新生活运动为目前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最有效之革命运动”，“望大家以‘昨死今生’之决心达成新生活运动之目的而完成革命”（《蒋委员长在行营扩大纪念周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扫荡日报》1934年2月23日3版）。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德日法西斯思想的影响，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蒋介石强调这是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孙中山提出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

抗战开始后，新生活运动，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节约献金、空袭救难、难民救济、抢救难童、成立伤兵之友社和

征募物品等与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雷厉风行推动的新生活运动，战时则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时时刻刻不忘抗敌。蒋介石曾将“礼义廉耻”口号解释为“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1939年更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慨慷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来鼓励军民奋力抗战。虽然新生活运动的成效战前一直不理想，但该运动的组织网络和动员能力，却为战时的服务提供了方便，对抗战起了正面作用。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极力推行20余年的全民教化运动，毕业生调查处作为蒋介石黄埔系的核心机构之一，必定竭尽全力去推行，在其工作纲要中就写明“策励同学实践新生活信条，使其在德的方面，成为转移风气之核心。唤起同学自立自强之精神，革除其依赖、骄奢、虚伪及自私自利之心理与行为”。该处及其下属机构每到一地，稍许安定下来，就会组织当地的新生活俱乐部或新生活宿舍。这些组织形式除了开展新生活运动的一般教化工作，主要就是对内联谊同学，为频繁调动的同学提供旅途协助，对外开展战地服务、伤兵慰问、空袭救难、难民救济和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

毕业生调查处及其下属机

构，在战时成立的新生活俱乐部或新生活宿舍及有关工作如下：

1936年7月10日，成立南京新生活俱乐部。

1938年3月16日，订定《筹设各地新生活俱乐部或宿舍办法》。

1938年5月1日，成立汉口新生活俱乐部。

1938年9月10日，成立长沙新生活俱乐部。

1939年3月8日，成立桂林新生活俱乐部。

1939年6月5日，成立贵阳新生活俱乐部。

1939年11月1日，开始筹设重庆新生活宿舍。

1940年2月1日，成立昆明新生活宿舍。

1940年4月1日，成立宜山新生活俱乐部。

1940年6月12日，重庆新生活俱乐部被敌机炸毁，该舍建筑及装修等尚未完竣，损失约5万元。

1941年5月1日，成立来阳新生活宿舍。

1942年1月1日，成立成都新生活俱乐部。

1942年2月1日，成立重庆新生活宿舍。

1942年4月1日，成立零陵新生活俱乐部。

1942年5月13日，成立淮安新生活俱乐部。

1942年6月2日，发布《整理

各地新生活俱乐部或宿舍办法》。

1942年6月16日，成立南平新生活俱乐部。

1942年7月12日，成立宝鸡新生活俱乐部。

1943年3月1日，成立重庆新生活俱乐部。

1943年5月4日，通令各地新生活俱乐部或宿舍附设义诊所。

1943年6月30日，停办零陵新生活俱乐部。

1943年7月1日，成立本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

1943年9月30日，裁撤淮安新生活俱乐部。

1943年12月1日，停办宜山新生活俱乐部。

1943年12月16日，停办遵义新生活俱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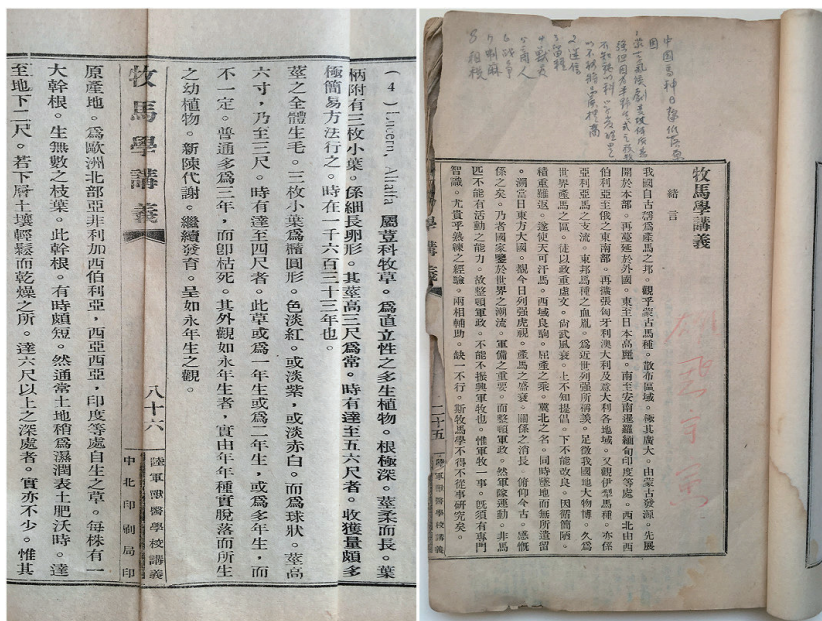
毕业生调查处于1938—1939两年间正处在办公地点辗转内迁过程中，此期间成立的新生活俱乐部的时间和地点（汉口、长沙、桂林、贵阳）大体上与办公停留的时间地点相一致。1939年毕业生调查处抵达重庆后，就开始着手筹办重庆新生活俱乐部，但不幸的是1940年6月12日正在建设和装修的建筑被日机炸毁，损失约5万元，致使重庆新生活俱乐部1943年3月1日才正式成立。1943年5月4日，通令各地新生活俱乐部或宿舍附设义诊所，这是一项很有实际意义的便利军民的举措。■

漫话陆军兽医学校

□ 单补生

藏书者历来倚重版权页，该页位于书籍正文前或最后，印有书名、作者、印行单位、版次年月等，使人一目了然，以此判断书籍的收藏价值。在线装版式中，版权信息则多印于书口（版心），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处，有鱼尾符号一（因其酷似鱼尾而名）；只有一个鱼尾称为单鱼尾，有两个鱼尾且上下对称叫双鱼尾【】，鱼尾是作为中缝折叶的基准。鱼尾上下至版框为象鼻，其空白处印有书名、卷数、小题、页码和印行等，是书的重要部分。

笔者在旧书店买了一部线装《牧马学讲义》，纸张为白宣，100页；尺寸为半框18cm×11.4cm。虽无版权页，但在象鼻空白处自单鱼尾上下印有“牧马学讲义、页码、陆军兽医学校、中北印刷局印”等字样，查1929年版《北平指南》得知，陆军兽医学校位于北平齐化门内富新仓，与陆军军医学校相邻；中北印刷局则位于北平宣武门内大街路西。陆军兽医学校为民国高等兽医学府，是培养西式兽医人才的摇篮，《牧马学讲义》是教官为教授学生《牧马学》而编



1 《牧马学讲义》。

写的教材。《牧马学》是兽医科学生的基础教程，又中央军校骑炮辎各科与马相关，故为通用教程。书中还有署名覃秉镛（疑为教官）用钢笔及铅笔写下的大量眉批，根据一段批注：“我国于1936年崔步瀛（教务主任）先生曾亲至亚拉伯采购十余头优良种马而回。”推断该校自1935年从北平迁到南京以后，覃教官仍用这部《牧马学讲义》教授。当时军训部为各军事专科学校入伍训练统一起见，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五校（军医、兽医、军需、兵工、测量）新生入伍生

营，奉令陆军兽医学校新生入营接受6个月入伍训练。黄埔校史校产篇记载：“1932年度马匹管教所统计，马匹属主：现有私马（官长个人所乘）16匹；公马192匹，废马56匹；新到马170匹。另有驮挽骡120匹。”为了保障这些“无言战士”的健康，中央军校军医处下设2名兽医专门服务。至21期增设兽医科，科长为一等正（同上校）陈有，河北栾县人，系陆军兽医学校正科12期生。由此看出陆军兽医学校与黄埔军校一体同心，实有研究之必要。为此，笔者参阅民国版《陆军兽

医之道》及相关史料，经梳理而漫话，以飨读者，敬请指正。

陆军兽医学校沿革

陆军兽医学校为民国高等兽医学府，以传授和研究西方兽医学，而养成西式兽医人才之摇篮。陆军兽医学校初名北洋马医学堂，从1904年创办至1949年结束，历史沿革45年，先后以保定、北平、南京、安顺四地为校址，故以每校址分期略述之。

一、保定时期

1902年11月，清政府在天津成立北洋军医学堂之后，又于1904年12月在河北保定创办北洋马医学堂，隶属北洋练兵处，并派北洋军医学堂总办徐华清兼署总办，任命留美归国军医姜文熙为监督。因徐总办远在天津，由姜监督主持校务。聘日本兽医教授野口次郎任总教习，伊藤浪三、中田醇为教习，浅见正吉为蹄铁助手，实为本校聘外籍教官之起源。而创办伊始，并从日本购入全部图书仪器及其他教学设备，一切初具规模。同时考取正科（4年制）第1期学生40名，附科学生20名，速成（2年制）学生40名。又委张有训为稽查，专司学生军训事宜。1906年2月，姜监督因病请假休养，并另派汤富礼代理。是年速成科毕业，第一批派赴军队担任兽医职务。



/ 中央军校骑兵演习。



/ 中央军校炮兵演习。

1907年兵部改组为陆军部，该校于同年4月转隶陆军部，并改名陆军马医学堂。且随同陆军各校归段祺瑞督办，徐华清辞兼署总办职，由汤富礼继任总办，姜文熙仍任监督，但姜监督因积劳患肺病，经呈准长假休养，照给薪俸。同年正科第1

期毕业，并续招第2期入学，是时设备日臻完善。1908年1月，派正科第1期毕业生15人出国留学，以黄岐春等10人考察日本马政，余刘葆元、朱建璋、竹堃厚、李家骥、吴家鹏5人入日本陆军兽医学校学习。3月增设提调一职，委祥彬充任。1910年留

日生竹堃厚等5人归国，派刘葆元、朱建璋等任本校助教，并从事教材编译工作，逐渐接替了日籍教习担任的教学任务。1911年考取正科第3期生30名（北京考20名，广东考10名），此时姜监督病体日见复元。10月因武昌起义，总办汤富礼奉令筹备后方医院，本校因此暂行停课，官生均行回籍，同时日籍教习中田醇解聘返国。

1912年12月，本校奉令改组，定名陆军兽医学校。废除总办监督制，改委姜文熙为校长；废总教习制，以刘葆元（别号元升，河北清苑人，日本陆军兽医学校1期毕业）为上校教务长；废提调及稽查制，改设学生监及体操教习。日籍总教习野口次郎及教习伊藤浪三等先后期满解聘返国。是时校内教职员薪俸规定较低，曾经一再呈请，终得奉准提高待遇。并延聘日籍兽医名宿渡边满太郎为教习，但以时局干扰，发展之计划未能实现。1913年9月创办蹄铁科，设立蹄铁工厂，招收第1期学生，为我国创奠了现代蹄铁技术工艺和兽医矫形外科学的基础。1914年教习改称教官。1917年12月校长姜文熙调任陆军部军医司司长，教务长刘葆元升任上校校长，教官朱建璋（别号诵莪，江苏川沙人，日本陆军兽医学校1期毕业）升任教务长；是时内战相

寻，颇受影响，幸赖措置咸宜，校务维持尚称便利。1918年7月，派教官王毓庚（别号华卿，河北冀县人，日本陆军兽医学校2期毕业）再赴日本留学，研究饲养学和乳肉卫生检验。

二、北平时期

1919年春，本校奉令与军医学校迁往北京齐化门内富新仓新校址，校舍焕然一新，各种设备扩充。同年7月，派教官崔步瀛（别号在洲，河北滦县人，日本陆军兽医学校2期毕业）赴日第二次留学深造。8月派教务长朱建璋赴日本再次留学，研究细菌学。1921年教务长朱建璋、教官崔步瀛先后回国仍充原职。1922年4月，日籍教官渡边满太郎期满解聘返国，自此全校教育均由我国教官及助教担任。

1922年10月，校长刘葆元辞职，由教务长朱建璋接任校长。此时国内军阀混战日极，校舍迭被驻军，教育器材物品颇受损失。本校经费开始积欠，日渐困难。当时本校经费未能按照预算发给，每月由陆军部军需司分次发维持费。其间，正科第10期学生分译日文《兽医宝典》一书，教官会同编纂《兽疫及其防疫法》一部，均由本校印行。1925年，因奉直第二次内战，国家财政日感困难，结果总统曹锟下野，政局未能稳定；而本校经费愈无着落，且病马厂从此迭

次驻军，不能收回；医药实习器材及蹄铁器械，以及普通用具等，常被驻兵盗卖或损坏。

自1922年至1926年间，内乱相寻，本校经费逐渐困难，先后变卖操马，掘出仓基旧砖出售，借资勉强支持。1923年由元月起至旧历端午节，始发给一个经常费二十分之一，此时教职员等生活无法维持，遂由保定军官、北平军需、宪兵、军医及本校，五校教职员生推举代表，在军需学校会拟呈文，向陆军部索薪，未获结果，遂致各校均停课月余。嗣后，由军需、宪兵、军医及本校四校学员生，推举代表在宪兵学校会商，决定由各校学员生分别间日具呈陆军部，请发经费维持教职员等生活；呈上之次日，经次长金绍曾分电各校当局，立即复课，并发经费若干。自此以后，薪俸时有不给，困难终未解除，幸赖上下坚持维持，将渡危局，皆因朱校长领导有方，其功在国家不可磨灭。1927年，北平东北军考送兽医简易班第1期60名来校，并每月补助经常费1200元，又调正科第6期毕业生杨守绅任英文教员。

1928年3月，校长朱建璋因病请假，奉派教务长王毓庚兼代校长，崔步瀛为教务主任。5月北伐完成，东北军退出平津，本校经费又告中断，学生停课，多半回家，校务殆陷停顿状态。



/ 任命杨守绅为兽医学校教官兼病马厂厂长的荐任状。

此时本校前后毕业学生，拟效劳国民革命，而留居北平者约50人。时闻国民政府有召集军医会议之举，本校同学乃在校中集议“互认经费”，由正科第5期学生齐长庆出名借到300元，由各同学认还，推举张玉林、李荣凯二同学赴南京参加军医会议，以谋兽医之发展，但当局对于设立兽医科及扩充本校之提案均未采纳。是年7月，国民政府委员赵仲冀、张忠哲来校接收，由教务长兼校长王毓庚点交后，各实习教室及器材均一一加封，校务完全停顿；同时本校改隶军事委员会，并任命王毓庚为上校校长赴南京请训。同年10月，本校又改隶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至12月王校长回校，携带委

任令有教官崔步瀛升任中校教务主任，朱建璋、苏荫庚等为中校教官。此时对本校编制又加修正，预算经费亦经成立，数年困苦毫无办法者，又于1928年12月重行开办。此乃第三次开办，与前两次开办时间均为12月，同符合契，颇为奇妙。

1929年2月，调正科第1期毕业生刘葆元为中校教官。9月，美国军医学会在丹佛市开会，我国受邀派军医学校上校陈辉代表参与。1930年7月，国际军医司药会议在比利时召开，军政部派陆军医院上院长樊登峰代表出席。1931年6月，在海牙举行第6次国际军医司药会议，派正在法国调查军医业务之前第1师军医处上校处长陈宗莹就近

参与。1932年3月，奉令修正编制，校长定少将级，教务主任为上校级，专科教官为中校级，其员额以平均每周担授14小时为准，必要时得请增设助教，并兼管标本仪器，辅助教授，并废学生监制。10月，聘德籍顾问爱贝博克为教官。11月，创办兽医训练班。1933年，王校长晋少将级，又聘德籍顾问贝尔哈特为蹄铁教官。是年古北口抗日战役，奉令设兽医院，校长兼院长，余职均由本校人员兼任，负责前方马骡之治疗事宜。1934年2月，向德国购置新器械一批，学校元气新复。5月，教官兼病马厂长杨守绅他调。6月，德籍教官爱贝博克解聘归国。是年年终考绩，教官朱建璋奉颁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一座。

三、南京时期

1935年2月，本校又改隶军事委员会军医署。11月，奉令由北平迁南京小营骑标，以原骑兵学校为校址。军训部为各军事专科学校入伍训练统一起见，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五校（军医、兽医、军需、兵工、测量）新生入伍生营；奉令本校新生入营接受6个月入伍训练，取得训练合格证书，方可入校学习。1936年1月，聘德籍顾问哈塞为本校顾问。2月，迁新址部署就绪即开课，并创办校刊《兽医月刊》。6月，本校又改隶军政部，

并规定业务受马政司之监督指导。7月，校长王毓庚奉令调上校教官，并派军政部部附陈尔修兼代本校校长，于同月就职。8月，奉准修正编制，增加员额，提高阶级。9月，奉令接收广东军医学校拨出兽医班学生一班，编为正科第18期，随带教育器材一批，及专科教官苏荫庚、吴文安、井文堂三员并归本校。10月21日，补行正科第18期开学典礼，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亲临训话并视察，约历3小时礼毕。1937年1月，陈校长受命专任。4月，特别党部正式成立，陈校长奉中央党部令兼任本校特别党部特派员。6月，陈校长奉调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并兼该团参事。8月19日，校舍为敌机轰炸，器材无甚损失。8月底，本校奉令暂迁湖南益阳。

四、安顺时期

1937年9月9日，本校抵益阳白鹿寺。1938年8月，奉准扩大编制学额，增设专科。9月，由益阳迁湘西洪江。1939年1月，由洪江迁贵州安顺，并增设额外兽医监教官多名。4月，设立政治组。7月，呈准附设兽医研究班及学术讲演会。12月，设精忠堂。1940年1月，增设兽医监、研究委员会及教育处长，扩充政治组为政治部，成立副官、军需、军医三组，将正科改称兽医科，扩大学额500名。4月，呈准



兽医学校奖状。

附设国药研究所、印刷所及器材库。同月，考取兽医研究班研究员21名。12月，研究班第1期研究期满。同月，制定聘请名誉教授办法。1941年1月，陈校长赴渝述职，以曾援例请以校长改由委员长蒋中正兼任，未奉邀准，此次又面谒蒋委员长重申前请，亦未蒙准。3月，军委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莅校视察及训话，又呈准扩大编制增加学额。4月，陈校长奉军委会训令改任军政部部附仍兼任校长。5月，创办畜牧科及建设畜牧实验

场，将原定各学科改为学系，并增设兽医勤务学系；又前后成立本校招生委员会，考试委员会，经理委员会，校史编纂委员会；又分别恢复各班肄业年限。将校刊《兽医月刊》改名为《兽医畜牧杂志》。1942年3月，奉令特设校阅官训练班。5月，派研究员朱建璋为西北分校筹备主任。6月，军委会训令派陈校长为专任职，免去部附职。同月，改精忠堂为国魂堂。10月19日，陈校长亲率西北分校筹备主任朱建璋等赴渝转飞兰州，筹设西

北分校。12月1日，西北分校在兰州正式成立筹备处。同月30日，陈校长公毕返安顺。1943年1月，前报请军政部部长何兼任校长一案，奉军政部指令“以校长陈尔修主持校务七载以来，颇称努力，际兹时艰任重，仍需继续供职，所请另调名义各节，暂勿庸议”。同月，制定1943年度官生兵种痘及伤寒预防办法；成立会计室。2月8日，奉军政部分令：“校长陈尔修主持校务七载，殊著成绩，该校教育长崔步瀛资历亦属优良，经呈奉军委会核准，特准一并晋级，按照中将支薪备案。”并援中央军校及军需学校例，增设校务委员会及提高教育长阶级，并健全教育组织。另扩总务处及经理科，其他各单位亦略予扩修；又呈请修正陆军官制兽医人员部分，增设兽医总监官位。3月，确定校徽图案。4月，奉准聘请外籍畜牧兽医专家5员，准派留学生3至5名。5月，重修教育纲领。同月18日，奉军政部训令：“以准调该校校长陈尔修为本部部附，校长一职为本部长兼任，改用兼校长何应钦，并调陈冀为教育长，崔步瀛为教育处长，秦国桢为该西北分校教育处长，遵自即日起。在陈教育长未到任以前，暂由部附陈尔修代行职务。”1944年，拟定十年兽医教育发展规划，学校编制扩大，员生名额也大为增加。同



/ 中国远征军骑兵搜索队。

年，美国以援华名义派遣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教授凯思敏和农业部畜产局技师柯柏来德来校，分别讲授微生物学和寄生虫病学课程。1945年初，杨守绅接任教育长并代校长职务。

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民政府成立国防部，本校隶属于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杨守绅任校长，西北分校并回本校。国防部选送杨本升、叶重华等10余人，赴美国留学或实习，此前派陈超人去德国留学。1948年，杨校长率部分教职员到北平丰台开办兽医勤务班，后改为迁校筹备处，由张萇臣负责。同年杨守绅兼任马政司司长，贾清汉代理该校校长。

1949年秋，代理校长贾清汉尊重全校师生意愿，审时度势，组织临时机构，保护学校财

产不受损失。11月18日，贾亲率全校师生员工在安顺东门外欢迎解放军入城接收。未几，本校改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兽医学校。至此本校共办科班期别：一、正科（兽医科）32期；二、蹄铁科12期；三、畜牧科8期；四、兽医简易班23期；五、兽医补习班10期；六、兽医深造班3期；七、兽医训练班；八、兽医速成科1期；九、高级研究班4期。合计毕业生2800余人（含正科生1000余人）。

亲历者忆旧

陆军兽医学校毕业生丁泽沂回忆：

这是一所精研医术、军纪严明的学校。我是1939年考入陆军兽医学校简8期（二年制）兽医科

的。凡入校学生一律剃光头，戴军帽，着军服，腰束皮带，打绑腿，穿草鞋，然后进行3个月（原为6个月）入伍训练，由黄埔学长担任各队职，负责训练事宜，一切遵照陆军典范令行动，违犯者禁闭或开除。学习的兽医基础教程有牧马学、家禽学、解剖学、内外科学，中西药学等22部学课。每日8节课，星期日休息，一年无寒暑假，学习生活紧张有序。体育活动有足球、篮球等，环城墙赛跑以20分钟内到达终点为第一名。1940年贵州省运动会在安顺召开，凡省内有名篮球队皆云集安顺，决一雌雄。时陆军200师路过安顺，旋派该师“远征”篮球队参赛而夺冠。马拉松赛是以十字口为起点，终点为城南华严洞，全长7000米，围观万人，参与者众多，竞争激烈，名次取前十，我名列十三，甚为遗憾！文娱方面有学生成立的《牧人剧社》，逢节日、校庆演出抗日话剧、京剧、歌曲等。经常在地方举办兽医畜牧展览，向民众宣传普及家禽疾病防治措施。当时镇宁、关岭牲畜发生炭疽病，校方组织学生由教官率领前往注射防治，阻止兽疫蔓延。本校有兽医院，饲养英国纯种马、阿拉伯马、蒙古马及西南本地马约百匹，供实习教练。规定学生必需达到骑马娴熟，以便在战场上及时救死扶伤，不论人马。学生毕业由校部统一分发，

派到各部队充任兽医职务，正科生待遇为一等兽医佐（同上尉），简科生待遇为二等兽医佐（同中尉），各师均有骑兵团（营），每师设正兽医官1人，副兽医官2人，兽医长及兽医若干人。

张鸿祯，1924年生人，广西宾阳人，陆军兽医学校简易班毕业，曾任53军116师347团一等兽医佐（同上尉），参加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张鸿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是1940年从广西逃难到贵州安顺，投笔从军，考入陆军兽医学校简易班，学习二年毕业，分发53军116师347团，在运输队任一等兽医佐。1944年11月，53军同各军一同向日军展开总攻击。为了保障部队的弹药粮食供应，当战役开始之前，运输队总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白天运输队行军时，天上有敌机轰炸，前面有日军炮击，企图截断我军后援和输送。为了避免人员伤亡及粮草损失，运输队实施白天休息整顿，晚上摸黑行军。战斗打响后，我除了负责受伤军马、驴骡的治疗，还要协助军医扶救伤员，包扎伤口。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先随军部调往越南河内接受日本投降，之后，便解甲归田从事兽医工作了。

孙义修，1919年生，浙江宁波人，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毕业。孙义修回忆：

抗战初期，我在西安考入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4团（简称战干4团），后改叙为黄埔17期政治科毕业生。那个时候部队极度缺乏兽医人才，军训部长白崇禧训示：“马匹为抗战建军要素，以国军现在编制需要乘驮鞍马80万匹以上，现有者约20万匹，相差甚远，且体弱多病不堪服役者甚多，希望多培养兽医人才，为国军之‘无言战士’健康上作保障。”于是我被派到34集团军第78师骑兵团任一等兽医佐（同上尉）。骑兵团有马匹八百，可兽医官佐只有两名。1941年至1943年，78师骑兵团驻守潼关，此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驻山西运城之日军曾三次进犯，每次反攻都是骑兵团在步兵前面，以排山倒海之阵势先将敌击溃，还活捉了十几个日本鬼子。每取得战斗胜利，骑兵团都会付出百余军马伤亡的代价，我们两个兽医天天给军马动手术，忙得每天只睡3个小时，持续半个月才能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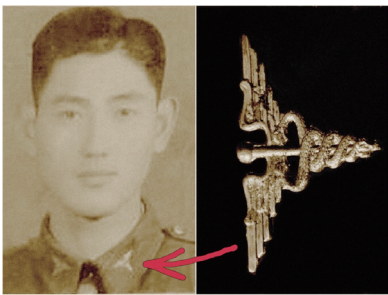
金仁越，1926年生，安徽金寨人。1944年告别父母，投笔从戎，考入中央军校20期骑兵科，赴甘肃天水陆军骑兵学校受训。1947年毕业分发傅作义部

骑兵12旅，先到张家口报到，后又调驻北平办事处服务。1949年落户北京西山南安河村。金仁越回忆：

1947年我在张家口服务期间，看到旅部马厩有几匹日本大洋马无人骑，感到很奇怪，就向王副官打听，他说这日本马认主人，生人骑不服管教，而且高大不耐用，不如中国马方便。我当时年轻好胜，心想日本鬼子都打跑了，堂堂黄埔生还制服不了一匹洋马，于是我就牵出一匹洋马备好鞍。当我一骑上之后，这洋马就飞快向村外树林奔去，专门钻树杈多地方，它目的是将我刮下来，没想到我使了一个鞍下藏身，任凭它钻来钻去，自受刮伤之疼，只要它一停，我就用马鞭使劲抽它，不钻都不行。最后，洋马被制服了。王副官看我骑马洋洋得意地回来，连连称赞说：“不愧是黄埔出身，真有一套。”后来，不知何因，这几匹洋马都死了，兽医将马解剖发现胃部有不少铁沙，原来接收前，日本人在饲料中掺入铁沙，洋马喂后铁沙沉在胃底，排泄不出，久之洋马绝食倒毙。

军医标志探源

公元前三千年之初，埃及信奉伊姆霍提普氏为医神，建塔修庙，永祀其功。等到希腊人主



/ 军医领章之两翼双蛇杖。

埃及王时，忽尊艾斯库雷彼斯氏为医神，所建庙式，与伊氏相同，后人只知道两氏皆为医神，而不知艾氏出自先代政治之权变矣。

艾氏之传说始于希腊塞萨利，人称之为地下神，身旁常有一条深居石缝之蛇及一根橄榄手杖。最初祀艾之礼甚简，类于露天或洞穴之内行之。经数世纪后，全希腊布满祀艾之庙，以在古镇埃皮达鲁斯最为著名，乃全民礼拜艾氏之中心。患者晚间入庙献祭，睡于殿前，则艾氏及其爱女海吉亚及其寸步不离之蛇杖顿皆入梦，于是患者亲沐艾氏之手触摩，之语垂询，或剖腹，或授药，有时叨蛇之惠，吮吸疮疡。翌晨，凡礼祀之患者，皆霍然随微曦而兴。诚所谓盲者得明，聋者后聪，跛者行而创者愈，斯所以为医神也。虽唯物观之雅典人，亦建庙祀之，竟崇信不移。

西欧医学肇源于彼，重视艾氏之蛇杖，盖尊艾氏为鼻祖，犹吾土之师神农者然。今国际医

学界公认蛇杖代表标志，其意义虽为纪念前贤，但亦别有说法。其一，上帝使者商神曾用橄榄手杖击双蛇之恶斗，使之同归于好，启和平博爱之思；其二，西人喻蛇为智慧，艾氏与蛇之不可离，亦若智慧与医家之不可离，故宜张表旗。

抗战初期，我国军医引用以蛇绕杖为标志，首倡者是“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其目的为取得与世界一致。1940年军医学校建议于蛇杖之外增添双翼，以示力图上进，乃渐臻具体。1943年空军军医奉准以双蛇绕杖加伸两翼，作为领章标志，则此制殆观成矣。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国防部颁定以双蛇绕杖平添双翼，为全国军医之标志。采用国际军医标志之因，乃由军医署如下解释：“一曰：学术不可分，学术无国界，世界奉之为圭臬，吾当标之为理想。二曰：双蛇绕杖，深具和平博爱之象征，足发达祖先师之智慧。三曰：平添双翼，则一派迈迈穆穆到处鹰扬，而奋力上进自强不息。然我国图案之特征，即双翼上端张之甚平，杖上冠青天白日徽，此有异于他国者。”空军所用者为金黄色，陆海军所用者银白色，更表现出我国军种之特色。军医标志不仅适于领章，凡无论车船、笈册、章证等于标志外饰国花皆有足采。■



1926年4月4日， 黄绍竑应邓演达之邀到黄埔军校参观

□ 贾晓明

1926年3月，黄绍竑代表新桂系赴广州，和国民政府共同制定完成了“两广统一案”，使广西统一于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广西军队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在广州期间，黄绍竑还和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等商讨了北伐问题。4月4日，又应邓演达的邀请，在李济深等人的陪同下到黄埔军校参观。黄绍竑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以政治谋略见长，但其影响却遍及民国时期的经济、教育、工业制造等领域，其诸多事迹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重视发展近代化教育

1925年8月起，黄绍竑任广西民政长。1926年6月，黄绍竑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广西省务会议主席。1926年6月下旬，李宗仁率军参加北伐，由桂林向湖南出发，黄绍竑留守广西。1927年5月，广西省政府改为委员制，黄绍竑任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厅长，至1929年蒋桂战争失败后离职出走。

黄绍竑自广西民政长任内起，便锐意经营广西，着手进行广西的近代化建设。在随后主政的3年多时间里，黄绍竑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新桂系的统治，积极致力于广西的建设工作，尤其在教育建设方面颇有建树。

黄绍竑认为，“社会之盛衰，与教育最有关系”，而广西教育素称落后，“就本省情形来讲，非从教育方面更加努力不可”。他在广西主政后不久，



/ 黄绍竑。

即狠抓教育方面的工作。他首先对原有学校加以整顿，并将原已停办的各种学校一律恢复，然后在此基础上创办新的学校。1926年，广西召开全省第一次教育会议，在会议上，黄绍竑决定举办教育行政人员养成所，将各县教育局长召集训练，通过提高教育行政基层干部的能力，促进地方教育的发展。

为了短时期内尽快改变广西教育落后的面貌，

黄绍竑从省财政收入中拨出相当数额的经费用于教育，但仍感觉颇有不足。考虑到“广西的田赋本来很轻，增加一部分，也并不觉得重，人民也乐于承担”，他在1926年主持召开全省第一次教育会议期间，决定“全省的田赋增加一倍，充作教育经费”，得到出席人员的一致赞成。

1927年9月，黄绍竑在省府会议提议创办广西大学。有人认为广西的中等教育尚未发达，似不宜办大学。但是黄绍竑认为：“一个省里面，没有一所大学，以领导促进文化的责任，总是一个缺憾。当时广西的学生要进大学，非到广东或北平、上海不可，既不经济，也不体面。”所以黄绍竑力排众议，决定在梧州创办广西大学，并成立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会，黄自任筹备委员长，委任教育、财政、建设各厅厅长及马君武等一批省内外桂籍有名望的人士为委员。黄绍竑还决定，由省政府即拨100万元为建设费，50万元为设备费，委托黄华表总理学校建筑。广西大学校址勘定在梧州三角嘴的蝴蝶山，因这里交通便利，本省学生皆可顺流而下，外籍的教授也可溯西江而直达。

1928年3月，黄绍竑亲自到梧州举行奠基典礼。9月，大部分建筑已竣工，设备添置趋于完成，遂聘马君武博士为校长，盘珠祁硕士为副校长，于9月13日举行开学典礼。马君武是著名教育家，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省长；副校长盘珠祁是黄绍竑的同乡，比黄绍竑年长十多岁，1914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硕士学位。黄绍竑钦佩盘珠祁的学识，多年来空闲无事时，就到盘珠祁处交谈教育、治学等话题。10月10日，广西大学（简称“西大”）正式开学，共有教授18人，助教6人。

黄绍竑认为，当时的广西经济贫瘠，“亟欲由农工矿之发展以救济其穷也”，因此，首批只录取理、农、工、矿4科预科一年级学生260人，分甲、乙、丙、丁、戊、己6组授课，旨在培养具备学术本领和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文法学院则欠缺

如”。

广西大学的建立，结束了广西没有近代化正规高等院校的历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该校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培养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该校以“勤恳朴实”为校训，提倡“生产教育、劳动教育”，“学工的要到工厂做工，学农的要到田间劳动，这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因此，广西大学的大学生往往一边读书，一边劳动，这在当时的中国高等院校中极为罕见。

建设军工企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黄绍竑临危受命，第二次前来主政浙江，并在浙江度过了整个抗战时期。随着杭州等地相继沦陷，黄绍竑将浙江省政府迁到云和，继续领导抗日。黄绍竑在搭建新的省府班子时，又雷厉风行地实施了一系列战时措施，并把从杭嘉湖撤退下来的省会警察队、内河水警队以及卫士营集中起来，加上绍兴、诸暨、余姚等地的民团，统一改编为省属的抗日自卫团，黄绍竑自兼总司令，配合第三战区驻浙部队（第10集团军刘建绪部），布防、除奸，展开敌后游击战。

当时，部队作战的武器弹药极度匮乏。黄绍竑认为，浙江省抗战必须解决武器自产的问题。为解决抗日自卫团队武器弹药的需要，他下令将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的铁工厂迁到云和大港头，成立了兵工厂。该厂为了保密，对外称浙江省铁工厂，由黄绍竑亲自出任董事长。为生产战斗急需的步枪、轻机枪、手榴弹、枪榴弹，黄绍竑特地把从杭州撤退出来的30台旧枪械生产设备交给该厂，并拨给一笔经费，派人到沪、闽、赣、港（香港）等地采购机器零部件及原材料。

1938年秋开始，工厂组织技术工人将外国较为先进的机枪、步枪和手榴弹拆解、研究，绘

制图形，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仿制。黄绍竑早在1925年广西统一时期就对兵器研究十分感兴趣，也有办兵工厂的经验。他在厂子附近住下，一有时间就到厂实验室，同工人们一起研究图纸，找窍门，改进设计，并十分注重研究吸收敌人武器的优点。经过两个月的摸索，步枪的仿制大体成功，但射击时准星却有些问题，前后调整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办法解决。工人们经过反复修改，又花费了一个多月加以改良，终于解决了步枪的准星问题，并且开始量产。黄绍竑便将这款仿制步枪命名为“七七式步枪”，也就是为纪念“七七事变”的意思。

后来，七七式步枪从1939年开始大规模生产，年产量高达1万支。在黄绍竑的领导下，浙铁工厂有着极大的发展，集兵器研究、设计、试验、制造于一体，曾一度拥有4000多名员工，机器总数超过1000台，包括步枪厂、子弹厂、轻机枪厂和手榴弹厂4个工厂，又成立了一个从事兵器研究与实验的实验室。其中，小顺工厂专造步枪。据统计，1942年春天，这些兵工厂每月可生产1000支步枪，50多挺轻机枪，五六万枚手榴弹、枪榴弹以及各种地雷的发火器及各种炸药等。

当时的浙江省，除了经常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日伪军还不断清乡扫荡，钢铁、黄铜等材料来源非常困难。对此，黄绍竑下令，将已经被日军控制的上海到杭州间的铁路破坏，将部分铁轨搬走，作为制造枪械的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周恩来在黄绍竑的陪同下到铁工厂视察，并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发表了演讲，赞扬“工人阶级顶天立地”。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海外侨胞慰问团来到小顺工厂看望工人们，希望铁工厂的工人多生产武器，支援前方。粟裕率浙南挺进师主力赴苏皖前线参加抗战，途经丽水，黄绍竑会晤粟裕并应邀到大港头检阅慰问部队，赠送子弹3万发。

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期间，黄绍竑把七七式步枪等武器带去展示，许多将领看后当场订货，被一些人认为黄是在“推销生意”。1941年国民党高层以“兵工统一”“制式统一”为由，将七七式步枪制造厂“收归中央”。1942年，由于日寇入侵，七七式步枪制造厂被迫外迁。

整个抗战期间，浙江省铁工厂为抗战输送了大量战备物资，有力支持了抗战，也成为国共合作的典范。单是七七式步枪，总产量就达5万左右，大部分装备浙江本地自卫团（1941年，浙江有21个自卫团，兵力2万多人）。在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南昌反击战和长沙会战中，浙军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其中几个师就是由原来的自卫团改编而来，使用的就是七七式步枪。而黄绍竑本人也勤于钻研，研发改进了无线电密码机等多种装置，还亲自研究生产水泥等战时紧缺物资。1940年，黄绍竑因发明各种地雷发火装置等装备获浙江省科学奖。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曾授予黄绍竑一等金质奖章一枚，以表彰他当初在大港头对研制性能优良的“七七式枪榴弹筒”的鼎力支持。抗战后，浙江省铁工厂得以保留的部分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为当地的近现代机械工业打下了基础。

做出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

黄绍竑一生中曾多次参加重大谈判，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当年，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立即发表声明，愿与共产党进行和谈。4月1日上午，由张治中、黄绍竑等组成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乘“空中行宫”号飞机由南京飞抵北平。

双方代表便按既定办法，首先进行个别交谈。根据安排，周恩来同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竑谈。为了推动和谈顺利进行，毛泽东也分别与南京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单独会谈。他邀请黄绍竑、刘斐到香山当面叙谈。当二人乘专车到达北平香山

时，毛泽东已站在屋门口等候他们了。两人下了车，毛泽东热情地迎上前握手，笑着说：“欢迎，欢迎两位和平使者的光临。”

毛泽东询问了黄绍竑、刘斐到北平的生活情况后，转入了和谈正题。当谈到和平协定方案时，毛泽东问：“这个协定你们觉得如何？李宗仁会同意吗？”黄、刘二人都表示尽自己最大努力做李宗仁的工作。随后，毛泽东留二人吃饭。席间，毛泽东笑着问黄绍竑：“听恩来说，季宽先生很会填词，我也是个好结识诗人词友的诗词爱好者，怎么样，我们不妨来一首？”黄绍竑回答说，他此前也曾拜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那种雄浑洒脱的风格，是当今诗坛中无人能与之相比的”，他自己却也曾填词“聊以寄怀”，并提议“待协定签字完了，定向主席讨教”。毛泽东爽快地回答说：“好，那我们一言为定！”

4月13日，和谈进入正式会谈阶段。会议结束后，南京代表团对《国内和平协定》连夜进行了研究讨论。黄绍竑认为，当时的局势是，“南京和了吃不消，不和更吃不消，两害相权取其轻，只有和了”。16日，南京政府代表团与中共终于拟定了和平协定的全部文本。张治中特派黄绍竑、屈武回南京说服李宗仁签字。

16日，黄绍竑和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文件乘专机前往南京。临行前，周恩来乘车赶到机场，专门会见黄绍竑和屈武，让黄绍竑和屈武感到特别意外。周恩来勉励他们努力完成这项使命，并对黄绍竑和屈武说：“请你们转告南京方面，协定签字，应该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

黄绍竑和屈武回到南京后，立即把和平协定文本交予李宗仁。李宗仁听了黄绍竑的报告，看了《国共和平协定》后，沉默不言。白崇禧在旁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谈不成就打！”黄绍竑反驳说：“能打得过共产党我们还用得着谈吗？”于是，李宗仁召集桂

系将领和亲信开会讨论。会上，黄绍竑再次谈了他的意见，他说：“有人认为《国内和平协定》是无条件投降的条件，这就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它。当前既不能在军事上保持均势，从而在政治上也不能取得绝对平等的地位。”同时，黄绍竑还传达了中共给予桂系的特殊优待条件。

李宗仁仍然犹豫不决，白崇禧态度强硬，其他桂系将领也莫衷一是。为了推卸不签和平协议的责任，李宗仁派飞机送《协定》到溪口交蒋介石过目。蒋介石看罢当即予以拒绝。李宗仁便召集黄绍竑、白崇禧等桂系将领再次开会，讨论决策。黄绍竑在会上强调，中共的条件对桂系特别有利，应该接受。但白崇禧仍顽固坚持“划江而治”的立场，李宗仁表示按蒋的意见办。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不欢而散。黄绍竑给在北平的代表团打电话后，即远避香港。

随着渡江战役打响，国民党统治即行崩溃，黄绍竑不避风险，在香港奔走，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在众多国民党在港立法委员、中央委员、高级将领中引起强烈响应。8月13日，黄绍竑等人举行港澳记者招待会，联合44名国民党人士，发表了名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政策，表示同蒋彻底决裂，“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后黄绍竑等人又联名发表了《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号召全体国民党将士弃暗投明，实现局部和平。这些举措得到众多响应和拥护。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开除黄绍竑等人党籍并加以通缉，甚至派特务到香港搞暗杀。中共秘密战线的特工华克之立即将黄绍竑转移，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动落空。

1949年9月，黄绍竑在中共驻港负责人的安排下，从香港秘密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